

《九龍城區風物志》

編撰委員會：

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單周堯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系馮錦榮副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系楊永安副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系名譽講師劉潤和博士

編撰小組：

劉潤和博士
馮錦榮副教授
高添強先生
周家建先生

第一部份

九龍城區的歷史及其意義

- 第一章 九龍城自南宋至英佔前的歷史風貌
- 第二章 九龍城寨在中英港現代史上的意義
- 第三章 九龍城區漁農及石礦業的發展與沒落
- 第四章 九龍城區城市化及工業發展的軌跡
- 第五章 樂善堂的建立及其貢獻
- 第六章 啟德機場的發展與香港經濟成長的面貌
- 第七章 賞拾九龍城區的文教風韻

第一章 九龍城自南宋至英佔前的歷史風貌

香港在中國歷史上，原來分屬不同的縣治，秦朝屬博羅縣，漢代屬番禺縣，晉朝屬寶安縣，至南宋時則屬東莞縣。由秦代至北宋，香港地區的歷史幾乎一無可考，被中原國人視為蠻荒之地。可是踏入南宋以還，雷擊電閃，歷史風貌數變，既指點朝代興亡，又旁觀災患相尋，萬民呼號，再體證國家勢弱，受盡外敵欺凌，其中卻又閃耀著民族的豪情，奮起自強，決不言棄。金朝元好問因感於金滅宋、元亡金皆了結於青城，慨嘆「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而在香港，始終見證著比青城更大更深的民族坎坷與滄桑的是九龍城。

南宋滅亡的史蹟與九龍城

九龍城的古名原叫官富場，是宋朝全國其中的一個鹽場，所以官富場實即官富鹽場。中國歷史上的食鹽，除很短的一段時期外，都是由政府專賣的。所謂專賣，即由政府監督控制由生產至行銷的整個過程，私人不得插手其中的意思。宋代的官富場佔地包括現在九龍尖沙咀、九龍城、土瓜灣以至將軍澳一帶，是當時廣東十大鹽場之一。既是鹽場，朝廷自然派駐鹽官專管，並有軍隊屯衛。

香港佛堂門現存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嚴益彰的摩崖題記，其中第一句是「古汴嚴益彰官是場」，可見「是場」是指官富場，而他就是負責管理這個鹽場的場官。題記出現兩年之後，天崩地坼的事終於爆發了。

南宋德佑二年，亦即景炎元年（1276 年），元朝軍隊攻陷南宋的首都臨安（杭州），末路王孫的益王昀及廣王昺都只是小孩子，但為了保命，又為了延續皇祚以待勤王之師，於是被逼出亡。這時西北方已無去路，只有向東南奔逃，浙江南接福建、廣東，順理成章的成了逃命的最佳路線。為了表示皇統尚存，益王昀由陳宜中、張世傑等大臣於福州擁立登上大位，改元景炎，就是歷史上的端宗，同時改封廣王昺為衛王。

元軍窮追不捨，揮軍入福建，端宗只有走泉州，再過廣東潮州、惠州。到下一年（1277 年）四月，逃抵官富場（九龍城），稍稍喘息，到九月，轉到香港的淺灣（荃灣）。十一月元軍追到，發兵擊荃灣，端宗勢孤力弱，蒼惶外逃，溺水幾絕，得了驚疾。幾番轉折之後，又回返荃灣。下一年（1278 年）三月，窮途末路之餘，再進駐碭州（有考證指即今大嶼山），到四月，端宗一病不起，畢命於大嶼山，年僅十二歲。

此時隨駕的群臣大多散去，只有陸秀夫一人，顯出勁風疾草、板蕩忠臣的本色，一士諤諤，以為南宋度宗尚有一子，豈可輕言放棄，於是與剩下諸臣，共同擁立衛王昺為帝，改元祥興，衛王就成了歷史上的祥興少帝。不久元軍又趕到，陸秀夫奉少帝移駐新會的崖山，但元兵

海陸兩軍雙雙夾擊，前後二路盡斷，陸秀夫萬般無奈，最後用白綾把祥興少帝縛在身上，蹈海赴死，少帝此時才八歲。從此，南宋正式宣告滅亡。

陪同陸秀夫和少帝一齊自沉的，據說還有數萬人，場景實在悲壯震撼，感人之極。末路王孫出亡於外，本已極易引人同情，何況稚齡奔逃，間關萬里，涉海犯難，最後竟無可逃於天地之間，一死以報宗廟，實是令人握腕長嘆，歌哭無端，百世吟唱不絕的題旨。因此自元代以來，文人墨客無不以宋末二帝之故事，反復賦入詩文，而只要一言及此，即連及九龍城官富場的古蹟古事，由此可見九龍城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有位置。

宋代的海上行朝，留駐官富場的時間較久，約有六個月，因此建立行宮的規模也較大。有關行宮的基址，到清代中葉尚存，位置約在現今九龍城寨公園之南，啟德機場舊址的西北方。元代時有人在此處山石上刻「宋王臺」三字作為紀念。到清朝，又有人在旁邊刻上「清嘉慶丁卯重修」七個小字，可惜世情常變，至今已面目全非。

破壞至巨的當然是戰火的摧殘，自二次世界大戰日軍侵港以來，第一個受攻擊的目標就是啟德機場，而機場正在九龍城之內，與宋王臺之石刻相近，難免殃及池魚，其後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更強行從宋王臺所在的聖山攫取沙土，致使大戰結束時，宋王臺石僅剩下部份殘跡。幸好有心人設法補救，最後把這塊石頭移置於原址西南的宋皇臺公園中。至於九龍城與宋代海上行朝有關的古蹟還有不少，例如二王殿的北帝廟、金夫人墓、侯王廟等等，其中有些尚存於世，有些則滄桑歷盡，塵影全消了。

元代的官富巡檢司

南宋覆亡之後，九龍城官富場亦走進另一個蛻變歷程。元朝代宋而興之後，官富鹽場產量越來越少，結果到 1297 年左右，朝廷撤消了這個鹽場，改設為官富巡檢司，原來的鹽官衙署改成巡檢司的辦公地方。根據元代的制度，巡檢司的職能主要是維護轄區的社會治安，搜捕盜賊，而每個巡檢司設巡檢官一名，寨兵一百五十人。有元一代，香港及其鄰近地區共設三個巡檢司，但在 1297 年之前，只有屯門及固戍角兩個巡檢官，管轄的地區大約相等於深圳大部份地區和香港的全部。很明顯，屯門巡檢司負責整個香港地區，而管治深圳大部份地區的是固戍角巡檢司的責任。

由於 1297 年後官富鹽場被裁撤，香港多了一個官富巡檢司，轄地包括九龍尖沙咀、土瓜灣、九龍城及佛堂門一帶，屯門巡檢司的轄地便自然相應地減少了。到元朝末年，屯門和固戍兩個巡檢司被廢棄另組，只留下官富巡檢司，一直沿用至明中葉，包括九龍城在內的整個香港所屬縣治已經出現了變化。

新安縣治的建立

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 年）夏天，東莞附近發生大飢荒，飢民被逼四出搶掠糧食，秩序大亂，情勢危急之極。東莞縣治之內的南頭城，城內城外人口相當集中，受災荒影響，也開始出現小股飢民，四處搶掠米糧。南頭城離東莞縣城很遠，政府鞭長莫及，無法壓阻飢民，眼看搶劫官倉糧米之舉隨即爆發，亂勢失控似已無可避免。

南頭城中最有聲望的鄉紳吳祚，立刻發起其他鄉紳合力救災，各自捐出一定數量的米糧，結果把飢民的情緒安定了下來，令南頭城逃過一場災難。1561 年為辛酉年，歷史稱這場亂事為「辛酉之變」。隆慶二年（1568 年），南頭一帶再次發生飢荒，結果又是當地鄉紳出面解救，縣城由於相隔過遠，兩次都無法救助。先後七年而兩陷險境，令鄉紳十分不滿，他們於是紛紛要求在南頭設立縣治，可惜上請經年而一無結果。

隆慶六年（1572 年），劉穩出任廣東參政，兼提刑按察司副使，專責廣東的海防事務，即當時簡稱的「海道副使」。當劉穩因巡察全省海防而到達南頭時，吳祚等哭訴當年災劫的慘狀，並苦苦哀求在南頭城設立縣治。劉穩得到南海縣為母在家守孝的原左副都御史何維柏，及兩廣總督殷正茂的全力支持後，立即向朝廷申請立縣。這次朝廷很快便批准了立縣的請求，並賜名「新安」。萬曆元年（1573 年），新安縣正式設立（民國建立以後，國民政府以河南省已有新安縣為由，恢復新安縣的古名，改稱為寶安縣）。整個縣治範圍主要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分地區，及香港的全部和東莞市東部，與東南部的小部分地區。包括九龍城的香港全部土地約佔新安縣五分之二的面積。

清初《遷海令》與九龍烽火台

新安縣的「安」字原來有「去危為安」的意思，可惜由明入清之後，卻變成「去安就危」，遇到了打擊至巨的《遷海令》。清朝建國之初，反清力量仍然存在，特別是鄭成功的部隊。順治十八年（1661 年），鄭成功退守臺灣，並準備以此為反清復明的基地，成了清朝的心腹大患。

《遷海令》是於順治十八年（1661 年）八月正式頒佈的，用意是切斷鄭成功與沿海民眾的聯絡和支援。朝廷把沿海民眾全部遷移到內陸，再佈下重兵防守已遷移的地域，然後又把沿海所有大小船隻全部充公焚毀，貨物不許越界。如此一來，鄭成功的部隊便會失去支援和補充，最終必定難逃潰敗的命運。

《遷海令》的主要內容是 1)遷海範圍只限於江南、浙江、福建和廣東四省；2)沿海濱後撤若干里，如福建三十里，廣東五十里，居民必須遷移至界線之內，越界者皆處死。有關的細節，包括海岸線向內陸後撤五十里，然後在適當的位置插上一面旗幟，再在旗幟之間用繩拉成一條直線，靠海一邊的居民必須移向靠陸地的一邊，而臨海一邊的房屋全部燒毀剷平，並在界線上每隔一段距離便修築墩台一座，設重兵防守。

按照上述的界標，新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人口，都必須遷離。更悲慘的是第一次的《遷海令》並不成功，因為鄭成功的部隊活躍依然，結果招來了康熙三年（1664 年）第二次的《遷海令》。這次是更向內陸遷移三十里，以廣東省而言，兩次遷海實共後撤八十里。第一次遷海已劃去了新安縣三分二的土地，第二次的更幾乎把整個新安縣去掉，包括整個香港在內的土地大都成了界外之地，而整縣的人口也差不多被連根拔起，徹底非常。

對包括整個香港在內的新安縣民眾而言，這個《遷海令》簡直是催命符，男女幼童，賤價而沽；有些人為求活命而被逼入伍；有些自覺走投無路，或服毒、或投河、或闔家自盡等等，舉目皆是。人丁去盡之後，土地自然荒蕪不堪，房屋則敗落傾頹，經濟的損失，真是無法估計，而人命的犧牲，更是慘絕人寰，無法形容。九龍城官富巡檢司陷入這樣的一個慘境中，自然亦無法獨善其身，它的衙門結果被調去了離九龍城很遠的赤尾村，何況在遷海這段時期，包括香港在內的新安縣根本就不存在，與東莞合而為一。

新安縣民眾的遭遇實在太過悲慘，令人不忍卒睹及卒聞，因此廣東官員如總督周有德和巡撫王來任等無不痛陳遷海之弊，紛紛要求復界而免除遷海的法令。到康熙八年（1669 年），請求終於獲准，新安縣恢復原來的建制。可是劫後居民的數目實在太少了，新安縣於第二次遷海之時，共遷移居民四千人，剩下大約二千人（這是有關遷海劃界官員盡力開脫的結果，否則連這二千人也不保）。到康熙十一年（1672 年），即新安縣復界第三年，人口才回復至大約三千七百人，三年來回遷的居民只有約一千七百人。

新安縣原住民回遷的數目雖然很少，可是由其他地區移遷過來，特別是客家民系的卻佔了大多數。根據乾隆三十八年至嘉慶二十三年（1773 至 1818 年）間的人口數字二十三萬九千一百一十五人看，大多數是由外地移入的墾荒農民。當時新增的村莊有三百六十六個，屬於客籍的有三百四十五個，非客籍的則有二十一一個，可證客籍人仕遷入的情況。

在遷海一役中，原來的官富巡檢司治所被調往赤尾村，九龍城原地則變成九龍台，是一個負責見敵示警的烽火台，由一個把總率領七十三名兵丁駐守。稍後因應形勢而有所裁減，剩下三十名兵員看守九龍台。這種情況一直維持至 1810 年而無所改變，其後的變化是因應當地海盜猖獗而來的。清廷自康熙以後，國家大體比較安定下來，武備逐漸廢弛，而沿海隘口亦疏於

防範，令新安縣一帶的張保仔有機可乘。嘉慶十五年（1810 年）前，張保仔以香港的水域和海島為他的根據地，四出騷擾，令清廷十分頭痛。

建置九龍寨炮台

嘉慶十三年（1808 年）的一場海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年七月虎門鎮林國良，率師剿捕海盜，在今天香港索罟群島中的孖洲，被張保仔佯敗設伏，林國良身陷其中，苦戰整日，最後壯烈殉職。林是鎮守虎門的將軍，竟兵敗身死於張保仔手上，令朝廷大吃一驚，於是決定整頓當地的武備。

所謂整頓，並無增加武備資源，而只是重加整編而已。林國良兵敗之後的下一年，嘉慶帝派百齡出任兩廣總督，其中的一個任務就是處理當地海盜的問題。百齡十分得力，以剿撫兼施的方法，制服了張保仔及其盜眾。他一方面把鹽運由海路轉陸路，令海盜無所施其技，同時又徹底切斷了民間以糧米接濟海盜的路線。另一方面他又以官職誘使他們歸降，一般賊眾可以隨意回鄉耕田，而頭目則可給予把總、千總、副將等官職。結果張保仔等賊眾同意一體歸降。

其實降與不降，都與武備設置是否妥當有關。當日若能早為之計，在九龍城設定炮台，必可完全控制了由鯉魚門入港，經九龍灣，紅磡至尖沙咀的所有船隻。如此一來，海盜決不能肆無忌憚的以香港的水域和海島作根據地，令官軍束手無策。與九龍城遙對的佛堂門本有一個炮台，可惜一來孤懸海外，無橋樑可通，二來島上並無村莊，缺乏民眾的支援。何況這座炮台直屬於大鵬營，相距二百里，調控又如何得力？因此當時的廣東水師提督錢夢虎，向兩廣總督百齡建議撤消佛堂門炮台，把它移建於九龍寨。百齡同意並令新安縣勸捐修建。

九龍寨炮台的建成已經是九龍城官富場第四次的職能轉變。第一次是南宋時的官富鹽場，第二次是元朝的官富巡檢司，第三次是康熙初年的九龍墩台（原來的官富巡檢司衙門移到南頭城附近的赤尾村），現在則變成炮台，仍歸大鵬營管轄，內設把總一員，外委一人，分防兵三十八名及撥防兵十人。

第一次鴉片戰爭

九龍寨炮台建於 1810 年，二十九年之後的 1839 年，鴉片戰爭爆發。由開仗一刻開始，九龍寨就發揮了無比的作用與威力。開戰之先，林則徐得到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的首肯，把駐守在大鵬灣大鵬城內的參將賴恩爵，調駐九龍寨，並把大鵬營內的軍隊和船艦，都調到九龍寨附近的海域，防備英國海軍偷襲。

1839 年 7 月，英國水兵在九龍尖沙咀酗酒打死村民林維喜，英國駐華商務監督查理 義律（Charles Elliot）先是拒絕交出凶手，之後又阻止英商具結，用意是反抗禁煙。林則徐於是下令驅逐廣州和澳門的英商，並斷絕食物的供應。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 年 9 月 4 日），英國商人出動向鄉民購買食物，但為中國巡船阻止。義律突然率領五艘英船駛往九龍灣，向九龍寨炮台發動襲擊。

賴恩爵率領部隊奮起迎戰，雙方接仗前後五個時辰共十小時，義律終被擊退。此後多日，交戰繼續，單以官涌一處，十日之內，大小接仗六次，俱是全勝。以上所有戰役，不論大小都由賴恩爵指揮，因此朝廷論功行賞，把他升為副將。按照清代武官制度，參將負責管營級、副將專管協級單位。之前賴恩爵是大鵬營的主管官員，現在升為副將，照例應該他調。林則徐由於九龍寨地位特別重要，為了留下賴恩爵主持大局，決定把九龍寨升格為大鵬協。

由九龍寨炮台開始燃起的鴉片戰爭之火（一般以為鴉片戰爭由 1839 年 11 月 3 日的穿鼻海戰正式開始，可是由上面所述，此戰清方的第一炮實由九龍寨炮台發出的），最終讓英國人借故強佔了香港。到 1843 年，新形勢出現了新政策，那就是從香港以帆船走私洋貨到內地的問題。清廷為了處理緝私事宜，兩廣總督耆英決定把已遷往南頭城赤尾村的官富巡檢司，改為九龍巡檢司（簡稱九龍司），並把它的治所遷回九龍寨駐守。這種調動顯出了九龍寨的特殊地位。

一寨之內同時駐有一文一武的官員，又一齊超越了本來職位的職能。九龍寨的武官原本是一名把總，受大鵬營節制，但現在不只由一名副將坐鎮，還升格為大鵬協，直接向全省武官第一把手廣東水師提督負責。九龍巡檢司原也不過是一個小官，只向新安知縣負責，但由於形勢特殊，也直接向全省文官第一把手廣東巡撫負責。所謂形勢特殊，就是眼前強佔香港的大敵英國人，若然稍一不慎，立生事端，必須全力以赴。

興建九龍城寨

這時的九龍寨還只是一個寨，並沒有城，所以不論是大鵬協的副將，還是九龍巡檢司都是租借民居作衙門之用，這只能是一時之權宜，絕非長久之計。更何況大敵當前，豈可隨便租住民居，以作衙署兵房。耆英因此向道光帝上奏，表示駐守兵員無險可守，因此提議添建寨城，用石砌築，環列炮台，多安炮位，佈設衙署兵房，可以屯兵定期演練，以壯聲威，更可藉以牽制英人，對海防實在大有裨益。結果皇帝同意了，而九龍寨城（也稱九龍城寨）於 1846 年 9 月後正式動工建築。

城寨於 1847 年 5 月初（道光二十七年農曆三月）建成，正門嵌有一塊石刻，上書直排：

道光二十七年季春吉旦

廣東巡撫部院黃

太子少保兩廣部堂宗保耆

全省提督軍門呼爾察圖巴圖魯賴

耆英是兩廣總督，官職最大，所以佔了正中的位置；廣東巡撫黃恩彤雖為正二品官，論官階比從一品的提督低，但朝廷一向以文官為重，以文管武，因此排在耆英「以左為大」的左面；右面則為獲封呼爾察圖巴圖魯勇士銜的廣東水師提督賴恩爵。

九龍寨城內建有衙署，方便大鵬協副將與九龍巡檢司辦公，其內並設有兵房。另外為了秉承建城必移民實邊的政策，又建成了一座龍津義學，用意是吸引文士而來，以便開發這個新建之城。可惜建城十三年之後，九龍寨城又被逼再見證一次民族的屈辱。

第二次鴉片戰爭

這就是由《亞羅號》(Arrow)引發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亞羅號》的船主是香港洋行買辦方亞明，他僱用了一個英國人肯尼迪(Thomas Kennedy)為船長，定期航行香港、澳門、廣州及汕頭，掛名運貨，其實是與海盜勾結，專作接贓之事。1856年10月初，《亞羅號》停泊在廣州珠海炮台附近的碼頭，廣東水師登船拘捕了十二名華人水手，因為有人舉報他們是海盜。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rs)立即提出交涉，以為該船在香港註冊，是英國船，應受英國保護，中國官兵無權上船捕人，所以必須立刻放人，並向英國賠禮道歉。巴夏禮的態度十分橫蠻，橫蠻之處不在強調《亞羅號》應受英國保護的論點，而在10月底當兩廣總督葉名琛不願深究，逆來順受，把全部人犯送回廣州領事館時，巴夏禮竟拒而不受。

與此同時，駐港海軍司令西摩(Sir Michael Seymour)奉命從香港率領艦隻向廣州進發，並炮轟廣州，激發廣州軍民奮起還擊，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此爆發。其後英軍兩次攻入廣州，由於民眾反擊和兵力薄弱，兩次都退出等待援兵。這時中國民眾仇英情緒十分濃厚，到1857年7月前，至少兩次在民航客輪上襲擊外籍船長和護航英兵。至此英國聯同法國決定出兵中國。

1857年12月英法聯軍入侵廣州，到月底廣州城破，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廣東巡撫柏貴、廣州將軍穆克德納等投降，自此起，廣州被英法聯軍佔領了三年多。1858年5月，英法聯軍揮軍北上，攻陷大沽炮台，京師不穩，清廷只有被逼簽署城下之盟：《天津條約》，但當中並無割讓九龍的條款。

割讓九龍半島

下一年 6 月，英國借換約為名，再率艦隊抵達大沽口，卻拒絕清廷指定由陸路進京的要求，硬要經大沽口溯白河上京。當地駐軍自然反抗，英法聯軍於是炮轟大沽口，守軍堅決還擊，英法聯軍受創頗大，退守上海。1860 年 2 月，英法援軍開到，於是直指北京，沿途殺掠，先後攻破北塘、塘沽、大沽、天津等地，到 10 月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而咸豐帝早已逃往熱河。至此，只好再簽城下之盟，先交換《天津條約》，繼而又與英法分別簽署新訂立的《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的內容中新增了割讓九龍半島的條款。

英國政府於 1861 年正式接收九龍半島，而根據測量數字，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的部分，當時面積為 1,774 英畝，大約 7.18 平方公里，再加同時割讓的昂船洲，面積 0.75 平方公里，合計略少於 8 平方公里。九龍寨城之所以興建，全是為了防敵拒敵，特別是英國人，可是旦夕之間，城寨南門一帶的地方竟變成異域，英國人就在眼前。但這還不算是最諷刺最無奈的事情，更諷刺更無奈的是三十七年後《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簽訂。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是歐洲列強瓜分中國的最危險時刻。清廷於 1894 年在甲午之戰中連日本也敵不過，被逼簽訂《馬關條約》，割讓了臺灣、遼東半島等地給日本。1896 年，俄國與清廷簽訂《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取得中東鐵路的興建權，和戰時可以進入中國港口的特權。德國則於 1897 年以「巨野教案」為藉口，出兵強佔膠州灣。俄國又借口於膠州灣一事上協助清廷有功，出兵佔領了旅順及大連。到 1898 年法國因應上述事例，又要求清廷租借廣州灣。在如此的形勢下，英國亦以法國租借廣州灣為藉口，以防衛為理由，向清廷提出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

有關展拓界址的談判於 1898 年 4 月正式開始，雙方以英國駐華公使寶納樂(Claude M. Macdonald)與李鴻章為主要談判對手。弱國根本無外交，何況在國力懸殊之下，連不談也是不可能的。當時李鴻章表示願以九十九年期租借新界予英國，但力爭保留九龍寨城，令駐紮在內的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自由行走，卻「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防礙」。這項條文成了日後中英兩國爭吵不休之源，也奠下了中英港三方以後為九龍寨城那互不相讓，角力到底的真正基礎。

第一章參考資料

文獻資料

- 文慶：《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毛鴻賓：《廣東圖說》，揚州：廣陵古籍，1993年。
- 史澄：《廣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
-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上海：上海古籍書店複印，1980年。
- 阮元：《廣東通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 屈大均：《廣東新語》，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 郭棐：《粵大記》，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
- 陳鏞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兩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 黃淳：《崖山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
- 舒懋官：《新安縣志（清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香港：黃承業重刊本，1992年。
- 靳文謨：《新安縣志（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出版地缺：出版者缺，1688年。
- 盧坤等修：《廣東海防彙覽》，出版地缺：出版者缺，出版年缺。

其他史著

- 余繩武：《割佔香港島》，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
- 林天蔚，蕭國健：《香港前代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 葉靈鳳：《葉靈鳳文集第三卷：香港掌故》，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 劉存寬：《租借新界》，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
- 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
-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
- 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
- 蕭國健：《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1982年。
- 簡又文：《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年。
- 羅香林：《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國學社，1959年。
- 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年。

第二章 九龍城寨在中英港現代史上的意義

租借新界而保留九龍城寨的原因

一如上述，當初興建九龍寨炮台和九龍城寨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為了拒敵防敵以保衛國土。1861 年英國強佔九龍界限街以南的土地後，情況變得頗為無奈，因為要拒要防的外敵，忽然間就在眼前，變得好像有些防不勝防、拒無可拒的境地。到 1898 年英國強租新界之後，情況更為無奈，因為香港全境已由英國管治，只剩下彈丸之地的九龍城寨，恍似汪洋孤舟，大有隨時沒頂之虞。何以有此一？到底作用何在？

清末之時，國勢弱不堪言，英國要求租借新界之議，是在日本強佔臺灣等地，俄國豪奪大連、旅順，德國硬取膠州灣和法國巧借廣州灣之後，清廷對此可說是沒有討價餘地的，唯一可談的是提出一點小條件，勉作平衡之用。為甚麼以九龍城寨作條件呢？這有先例可援。

當年租借旅順港予俄國之時，清廷也是保留了金州城的主權，而向光緒帝的進言，是在中國租借地中留一個據點，令朝廷軍隊、商人及船隻等能夠名正言順的出入此城，藉此發揮軍事和經濟上的影響力，從而得到一定的利益。李鴻章在租借九龍城一事上，也持同一的理據向光緒帝進言，結果皇帝也同意批准了。

不能防礙保衛香港武備的條款

可惜這個原本不錯的主意，被英國人放進了一隻棋子。英國同意清廷保留九龍城寨的主權，城內駐紮的官員仍可各司其事，也同意九龍通向新安的陸路，中國官民可以照常行走，甚至同意可以保留九龍城原來舊碼頭一區，方便中國兵商各船任便往來停泊，但以上一切必須符合一個先決條件，即不能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

李鴻章並無反對這個先決條件，也沒有商討界定甚麼才算是妨礙保衛香港武備的條件，給了英國人一個可以隨意發揮以符己意的機會，成了日後受制於人的隱患。從現已公開的歷史檔案而觀，這個先決條件只能算是外交談判內的應有之義，不能說是英國人的陰謀陷阱。可惜歷史的發展，總是不如人意，逐步的向下陷落，如果真的要抱怨，或者只可說是國運不振，內憂外患接踵而來，處處受制。

首先，由於外交的誤會與疏忽，英國於 1899 年以清廷違反條約訂下的先決條件為借口，派兵攻佔了九龍城寨。李鴻章及總理衙門（相等於其他國家的外交部），不斷為此交涉，死纏不放，但下一年卻爆發了義和團之亂，再無餘力顧及，交涉被逼終止。接著 1930 年代，乘 北伐

革命之洪流，希望順勢恢復九龍城寨的主權，角力正酣之際，爆發了抗日之戰，交涉再一度停止。

抗戰勝利之後，中國地位如日方中，而民情鼎沸，要求回復城寨的主權，英國自覺勢不可侮，準備作出前此未有的讓步，可是國共內戰爆發，外交談判又一次停頓下來。其間形勢的微妙與錯綜複雜，每一次的功敗垂成，恍如天意早定，命不可違似的。九龍城寨與現代中國的國運互相扭在一起，不可分割，見證了現代中國對其命運種種的掙扎與無奈。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這些的掙扎與無奈。

民眾抗擊英軍接收新界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於 1898 年 6 月 9 日在北京簽署，但英國並無即時接管新界。接管行動由下一年 1 月開始，卻遭到新界民眾的強烈反抗。到 3 月，港府警察司梅含理(Francis May)到大埔選址興建警署，為當地民眾反對，他只好回報港督卜力(Sir Henry Arthur Blake)。稍後港府宣佈擬於 4 月 17 日下午一時，在大埔舉行接收儀式。當梅含理返回大埔檢視正在修建中的警署席棚時，村民再向他抗議，說警署選址有礙風水，要求遷移。梅含理拒絕接受，因而激起民憤，被群眾圍攻，梅寡不敵眾，雖經港府派兵增援，仍無法突圍。

4 月 16 日，卜力再派出的援兵趕到，隨即以猛烈炮火轟擊村民的陣地，並以步兵展開衝鋒，村民無法抵擋，被逼撤退。乘此空隙，輔政司駱克(Sir James S. Lockhart)急忙舉行升旗禮，先由英軍數百人列隊進場，鳴放禮炮，再由駱克宣讀《樞密院令》，宣佈正式接管新界，較原定的日期早了一天。儀式完畢後，英軍繼續向林村進發，當步入林村山谷時，村民居高臨下，以彈和石如雨般攻擊英軍，英軍無可奈何，只有退出林村山谷，再接戰一個多小時後，雙方都不能取得優勢，暫時撤退。

抗擊英軍的最後一役在上村爆發。4 月 18 日下午約二時，來自屏山、廈村、橫洲和深圳、沙頭及東莞縣大約二千六百人的隊伍，向駐於上村附近石頭圍的英軍發起反攻。英軍採用埋伏戰術，隱於一條乾涸的河床內，待抗英隊伍走近至三百碼範圍內，才集中火力出擊，村民中伏被逼且戰且退，最終被擊潰。為了耀武揚威，英軍把錦田吉慶圍的鐵門拆去，直到 1925 年才物歸原主。

兩廣總督維持地方的舉措

與此同時，港督卜力向兩廣總督譚鍾麟抗議，要求他維持地方治安。譚鍾麟因此派駐了九百名官兵於新界，其中六百名是維持地方治安的，另外三百名則負責保護稅廠。譚的做法本

來沒有錯，因為一方面是應卜力之請，另一方面是香港境內還有中國的稅關，為保安全，自然要駐兵保護。

問題出在他沒有通知卜力，只是自行其事，英國人自然非常不滿，因為應邀派兵與暗地出兵到英方租借地，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英國人那有不強烈抗議的道理。可是雖屢經抗議，譚鍾麟仍是一意孤行，拒不撤兵。結果英國政府以為，這是絕對嚴重妨礙保衛香港的武備，於 5 月下令佔據九龍城寨，並驅趕所有中國官員離城。1899 年 12 月 27 日，英國制定樞密院令，把九龍城寨變成香港殖民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英國人來說，九龍城寨問題已經解決。

譚鍾麟堅持拒不撤兵，特別是保護稅關的做法其實是正確的。因為在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內，未有一字涉及清廷稅關在香港境內的地位，他要保護港境的稅關，以地方大吏身份而言，是份內事，否則便是失職。問題出在他沒有要求清廷負責外交事務的總理衙門出面，而港督卜力也應負上同樣的責任，因為他亦沒有向英國外交部說明稅關的問題，雙方只是對幹，最後讓英國人找到借口，吞併了九龍城寨。

對李鴻章與總理衙門的官員而言，九龍城寨的問題還遠遠未有解決。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是無法向光緒帝交代。清廷保留九龍城寨的主權，是為了維護本身的軍事和經濟利益，現在利益尚未到手，九龍城寨卻先失掉了。如果俄國在旅順採用同一手法，金州城豈非也是早晚不保。為了避免陷入這個絕境，李鴻章對英國的交涉，可說是死纏爛打，決不放手。當知道英國絕不讓步之後，他甚至要求只恢復城寨名義上的管治權，只要主權表面上仍然在手的話，其他租借地就不能隨便引作先例，其中的無奈與悲苦，實不足為外人道。

當李鴻章與總理衙門用盡種種途徑抗議英國違反條約時，國運又出現了幾乎無可挽回的波瀾。1900 年爆發了舉世震驚的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直闖北京，光緒帝與慈禧太后被逼西狩出亡。李鴻章為了與八國訂定《辛丑條約》，再無力堅持城寨的交涉，更不幸的是，李因往返擲折，心勞力絀，竟以身殉。此後，清朝亦臨末路，煙消雲散就在眼前。最終，九龍寨的主治權無法恢復，連在港境內的所有稅關也要遷出。

民國建立後至 1930 年代的九龍城寨

1911 年以後，國家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到 1926 年，國民黨誓師北伐，革命浪潮高漲，而國內各地的反英情緒亦與日俱增，先後收回漢口、九江、鎮江及廈門等英屬租界。適逢其會地香港政府也推出了發展九龍的新政策。

九龍城寨到 1904 年之時，其實已經荒蕪不堪，寨內無人居住，幾乎一無所有。踏入 1920 年代，港府開始在區內大規模填海，連接九龍城與旺角及油麻地的公路亦正在興建，而到 1930 年，寨內的舊有官署和衙門及散落的幾尊大炮，仍點綴 城寨的荒涼。就在同一年，九龍塘城市花園的計劃宣告完成，這個計劃一方面吸收與城市化了部分九龍城的村落，但從其他地區遷移到九龍城的寮屋居民也逐日增多。

1933 年 6 月，港府為了改善當地的衛生情況，宣佈以換地賠屋的辦法，要九龍城寨的全部居民，遷往狗虱嶺(今天慈雲山山腳一帶)，並以 1934 年 12 月末為限，之後九龍城寨的原址會改建成為一個公園。由於狗虱嶺離九龍城頗遠，居民不願遷往，於是成了一個拉扯談判的局面。這個局面由 1933 年至 1937 年拖拉了前後四年，都不成功。

由於港府讓步所致，事件發展至 1936 年，本來已有成功之望。香港政府同意狗虱嶺路程太遠不便，批准居民遷往隔坑，而城寨六十五戶居民中的三十九戶已同意遷往。另外港府又同意不願遷往隔坑的居民，可以安排他們遷往九龍城、侯王廟附近和竹園等地，又為他們設立街喉供應食水，並容許豬農興建豬寮。因此遷離城寨的居民至此已有四十七戶，剩下的十八戶，其中的十七戶亦已答應遷出，只待城寨以外的土地平整妥當，建成房屋，便即遷往。可是仍剩下一戶，堅決不肯接受港府換地賠屋的辦法。

另外還有城寨非原居民的問題。港府的換地賠屋辦法本來並不適用於這類居民，但為了恐怕以武力驅趕他們，會破壞重建城寨整個計劃，所以為了換取他們的合作，港府提供距城寨西北約四分一哩的土地，讓他們興建居屋，並給予搬遷費。這類居民共有十二戶，只有一戶拒絕搬出。

可見除了兩戶居民之外，其餘的城寨民眾都已同意遷出，城寨問題似乎大有可能得到解決。可是時日一久，又起變數，部分已經答允遷出的居民，推翻原來的決定，留下不走。拒絕遷出的住戶最後達到二十多戶，這批住戶不但拒絕遷移，而且為了抗衡港府的威嚇，還直接向國民政府投訴。本來兩廣外交特派專員甘介侯和外交部一直關注城寨居民遷移的問題，但當地居民似乎樂於與港府合作，所以並無出現激烈的申辯與批駁。現在情況有變，居民投訴大增，中國政府於是全面介入城寨的問題，再一次拉開了城寨主權爭拗的序幕。

1936 年後有關九龍城寨的交涉

負責交涉的是代替甘介侯的新任駐兩廣外交特派專員刁作謙。刁作謙作風非常果斷，也很激烈，他一面向外交部匯報情況，另一方面又立刻派秘書凌士芬到九龍城寨實地調查。凌

是自 1899 年以來，進入九龍城寨的第一個中國官員，突顯了城寨主權在中國的事實。城寨居民受到這種鼓舞，更多人推翻了原先同意遷出城寨的承諾。

當時的港督郝德傑(Sir Andrew Caldecott)對刁作謙的作風非常反感，特別是他不經通報，自行其事的派出官員到城寨調查一事，完全踐踏了港督的管治權力。再加上刁作謙的言辭舉止比較不客氣，令郝德傑十分不快。其中一例，就是於 1936 年 11 月當刁以特派員身份，陪同廣東省主席和廣州市長訪港，在港督面前居然不談有關城寨之事，卻與署理華民政務司論及此案，並且非正式提議，把城寨改建為一個由中國管治的公園，同時又免了港府對居民的賠償。

英國政府對城寨的立場，與當年一樣，毫無改變。由於 1899 年中國軍隊嚴重防礙了香港的防衛武備，城寨被併入香港全境之內，並完全由英國派出的香港總督全權管轄。英國政府以為這個立場不能稍有改動，否則新界的管治權最終也必會失落，後退一步，敗局即現。問題是應如何處理當下的局面呢？

1937 年 7 月，英國殖民地部決定授權港督以武力驅趕城寨的拒遷居民。同月 7 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中國命運再一次蒙上可怕的陰影。民族為求生存，只能以血肉築起長城，以無比毅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如此一來，城寨問題只好又一次放下來，以待另一時機。

香港總督雖獲授權動武，卻並無即時執行，等到 1940 年才付之行動。當年港府以武力拆遷城寨，把寨內民居夷為平地，只保留龍津義校、一間安老院，和一間曾姓的古老大屋。

1941 年 12 月以後，日治時期開始，香港與國家苦難同嚐，而在戰亂之中，城寨只有顯得加倍的荒涼，更加的令人不堪回首。到 1943 年，日軍為了擴建啟德機場，索性把城寨的城牆拆掉，因此時至今天，原來城牆的正確位置已變得幾乎無從考究。城寨雖然沒有了城牆，卻仍然冷眼看滄桑，閱盡世情。

抗戰勝利後九龍城寨的風雲

中國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最後終於降服頑敵，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一時之間，國家被列入強國之林，多年屈辱，一朝消磨淨盡。香港本在中國戰區之內，論理應由中國統帥受降，可是英國卻不顧中國的反對，以第一時間搶先接收香港，等於向世界宣示繼續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中國民眾為此氣憤異常，對英國的舊恨新仇，到了蓄勢待發的地步。九龍城寨的老問題又一次成了中英港三方角力的焦點。

1946 年 9 月，由於香港警察在執勤的時候，踢死了一名九龍城的華人小販，引起居民抗議，舉行示威。港府毫不姑息，以武力鎮壓。城寨居民為此向南京國民政府投訴，國民政府於是向英國提出抗議，聲明指出新界雖有租約存在，中國卻仍擁有城寨的主權。9 月中，港府回

應說九龍城已成為香港的一部分，主權隸屬於英國。為了挑戰這個說法，中國兩廣外交特派專員郭德華，隨即向港督楊慕琦(Sir Mark Young)表明，國民政府將派員進入九龍城寨。緊隨其後，寶安縣政府亦聲明恢復在九龍城寨內設立縣治代表單位。就在寶安縣政府發表聲明的同一天，中國外交部更清楚指出，中國從未放棄對九龍城寨的治權。

就英國政府而言，堅持城寨的主權是必須而至關重要的，因為若稍一不慎，恐怕新界的租借權也會不保。就港督而言，更非堅持城寨主權不可，否則整個香港管治的基礎即會動搖，香港居民對港府管治的信心亦會崩潰。

為了堅持這個原則，港府以行動證明本身的決心。1947年11月17日，港府限令城寨居民於兩星期內拆去所有屋宇，自行遷出。為了表示依法行事，港府再重申在城寨內享有管治權。1948年1月，港府兩次派出大批警察進入城寨，強行拆屋，破毀民居三十多間。居民起而反對，軍警開槍鎮壓，傷及二十多人。

一石擊起千重浪，廣州學生激於義憤，於1月12日放火焚燒沙面的英國領事館。此時全國民族情緒已臨沸點，紛紛聲討英國，巨浪滔天，氣勢極度澎湃。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葉公超親赴香港與當時的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交涉，寶安縣長王啟俊則親往城寨慰問，另外又向英國駐華大使提出抗議。後來城寨居民見港府再無後續行動，紛紛回去重建他們已被拆掉的房屋。

其實中英雙方仍在外交層面上繼續較量，一直沒有停止過。由於中國反英浪潮極度高漲，對局勢最感憂慮的是英國駐華使節，特別是英國駐廣州領事，因為身陷險境，見聞真切，猶有餘悸。他們紛向英國政府進言，以為國共內戰逐步踏入決戰階段，如果局勢失控，英國在華的一切利益，恐怕不保。因此他們贊成向中國作出最大的讓步，令局面盡快穩定下來。

反對讓步最力的是港督葛量洪。因為只要後退一小步，他的管治威信就立即受到挑戰，最終可能令港府無法有效管治香港，港督寧願城寨維持現狀不變，也拒絕讓步。所以當中國提出在城寨建置外交機構時，英國政府立即拒絕；寶安縣要求設立縣治代表單位時，英國也不考慮。到中國要求在城寨興建一個紀念公園，共同管治時，基於中國反英壓力太大，英國政府再無法拒絕，把多年以來一直堅持單獨擁有城寨主權的原則，變成願意與中國共同管治的新政策。中國最初堅持管理公園董事人數要比英方多，由最初的七比二，四比三，至三比二，英國都堅決拒絕。最後雙方同意各派一人管理，顯示兩造都作出了一定的讓步。

這時中國內戰已逐漸由共產黨取得優勢，國民政府既無餘力顧及城寨問題，英國亦自然樂得靜觀其變，先前雙方達成的共識就當然束之高閣，而荒蕪已久的九龍城寨便只好冷然繼續閱它的古今了。

現狀不變與沉淪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建立之後，以為香港包括九龍城寨和澳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將在適當的時機給予解決，目前只能維持現狀。可是港府卻總希望有所動作，也許是真的基於當地的衛生問題，又或許是港督對城寨主權誰屬耿耿於懷，非要一試其底線不可。

1962 年 3 月，港府派人到九龍城寨張貼通告，宣佈撤除城寨外圍的數條街道，要求居民先行登記，以便日後遷移他處，受影響的民房約一百座，和居民約二千五百人。這些居民當然反對遷出，以為城寨主權在中國，港府無權干預城寨事務。他們還組成“九龍城寨居民反對拆遷委員會”，決定抗爭到底。

根據港府行政局一份 1962 年 11 月 2 日的備忘錄，內容述及東頭村徙置區第二期計劃中，確有涉及清拆部分城寨的步驟，日期是由 1963 年 2 月 12 至 20 日。剩下的城寨部分，亦留作兩年後公共房屋設施之用。由此可見，港府的確部署了清拆整個城寨的計劃。

1963 年 1 月，中國外交部為此發出一份聲明，指出清拆九龍城寨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事。據港督柏立基(Sir Robert Black)在與英國外交部討論此事的文件中，直言給聲明內的強硬措辭嚇了一跳。他因此提議把有關重建、徙置城寨及其居民的計劃從此擱置起來。

自此之後，九龍城寨進入了一個真正維持現狀期，英國不想為它刺激中國，港府不敢因此挑戰強鄰，而中國由於未遇到適當的時機，也不急於解決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至此城寨的確確變成了一個「三不管地帶」。藏污納垢，衛生惡劣，環境頹敗就真真正正成了城寨此時此地的寫照。

問題最後的解決

世上或許沒有絕對沉淪不起的事，到了 1970 年代末期，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歷史契機出現了。首先中英談判開始，經過了二十二輪的艱苦談判，兩國終於在 1984 年 9 月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宣告中國政府決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英國政府將於同日把香港交還中國。

香港問題既已解決，其中九龍城寨的問題亦應一筆勾消。中英兩國由 1986 年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到 1987 年得到完滿解決。1987 年 1 月 14 日，港府宣佈三年內全面清拆九龍城寨，於原地改建一個公園，自即日起，香港法律也適用於九龍城寨。同日，中國亦發表聲明說，從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出發，對於港府以妥善措施清拆九龍城寨，並在原地上興建公園的決定，表示了充份的理解。

九龍城寨一百多年來歷練的滄桑，閱盡的古今，及嚐透的冷暖，現在都到了終點。從形體而言，城寨雖已不存在，煙雲消散，風流皆盡，可是它在這段風起雲湧、國邦多難的時代裏，閃爍於其中的光芒，卻必會長留人間，見於史冊而永不磨滅。

第二章參考資料

檔案文獻資料

英國政府歷史檔案

- CO129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 Hong Kong, 1842-1951, Serial Nos. 290-291, CO129/295, 302, 503, 544, 546, 552, 556, 595, 609.
- CO537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 supplementary, Serial No. 3706.
- FO17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and Other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efore 1906, China 1815-1905, Serial Nos. 1359-1360, 1362-1364, 1371, 1374, 1376, 1378-1381.
- FO228 Foreign Office: Consulates and Legation, Chin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I, 1834-1930, Serial Nos. 1321, 2100, 2104, 2108, 2112, 2115.
- FO371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 – 1966, Serial Nos. 6646, 16196, 17133, 20990, 53637-53638, 69578, 69580, 75931, 83484, 170651.

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檔案

- HKRS163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iles (Confidential), Serial Nos. 158, 271-273, 1573, 2536-2539, 2977.

其他史著

- 王紹坊：《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 1840-191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
- 余繩武, 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
- 余繩武, 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年。
- 李宏：《香港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
- 杭立武：《國民政府時代之中英關係 1927-195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袁求實：《香港回歸大事記 1979-1997》，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 袁繼成：《近代中國租界史稿》，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
- 梁炳華：《城寨與中英外交》，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
- 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
- 蕭國健：《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1982年。
-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esley-Smith, Peter. *Unequal Treaty 1898-1997: China, Great Britain, and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三章 九龍城區漁農及石礦業的發展與沒落

九龍城區在 1920 年代之前，基本上是一個漁農和開採石礦的社會，這與當時香港整體經濟型態相符，並無不同之處。根據 1841 年 5 月《轅門報》(即後來的《香港政府憲報》)所載，香港島上居民可分為三大類，即漁民、農民和打石工人。與港島一水之隔的九龍半島，此三大分類自然亦無分別，一體並存。兩者稍有不同的，是港島的城市化步伐較快，起步較早，而九龍的則起步較晚，要到 1920 年代之後才稍具規模。

歷史上的製鹽業

當然歷史上九龍是官富鹽場的所在地，因此製鹽業也是九龍城區的一個重要行業，只不過因為清初的遷界政策，製鹽業才被逼完全停頓，最後從香港近代史上消失得幾乎全無蹤影。幸好從考古發現了大量與製鹽有關的殼灰窯遺址，和其他相關遺物，證明這個行業的確曾在此地蓬勃發展過。

所謂殼灰窯，是以蠔殼和其他貝殼為原料燒灰而成的窯爐。類似的窯爐，在大嶼山、港島和九龍半島等地大小海灣的沙堤上，都有遺址發現。殼灰的用途，主要是用來塗抹加固以竹篾織成的牢盤，防止漏水，用作盛載鹵水。這是製鹽三種方法其中的一種，把鹵水放在以竹織成的牢盤內，外面以殼灰嚴絲密縫，然後再煮煉成鹽。九龍城區與其他香港地區都大量發現了不少此類的灰窯，足證製鹽業的發達。

宋代的官富場，是史籍中明確記載香港地區的製鹽場所，地域包括九龍城、土瓜灣、尖沙咀和將軍澳一帶。新安縣共有四大鹽場，除官富場外，其他三個是東莞、歸德和黃田。這四個鹽場加上廣東省沿海其他鹽場，產量驚人。據有關史料所記，全省的每年鹽課所得，只需撥出四成，便足夠當年廣東省各州縣的開支。到了明代，官富場的產鹽量有所減少，但仍是與東莞、歸德、黃田並列的四大鹽場之一，直至遇上清朝初年的遷海政策，官富場的製鹽業務才正式宣告終結。

農業的發展

發展農業當然涉及耕地，而以面積而論，大部分集中在新界，港島和九龍半島的耕地面積與之相較，就顯得有些不成比例了。其實到了明清二代，新界耕地大半已經開墾完成。因此新界各個大族，先後向港島、九龍半島和大嶼山等地擴充發展。到 1841 年英國人佔領香港之時，其中的好些土地，都被這些大族所擁有。例如錦田鄧族擁有黃泥涌、香港仔和薄扶林的土地，上水廖族擁有掃桿埔一些土地，新安縣南頭黃族擁有赤柱、深水灣、淺水灣等處的部分土地。

無論是新界或是港島與九龍，農戶種植的農作物，都以稻米為主，一年可以兩熟或甚至三熟。除稻米外，也包括番薯、蔬菜和時果的種植在內。以九龍城區而言，農業的發展當與衙前圍村及其聯盟七約等村落的農耕活動有關。

衙前圍是九龍半島地區歷史最悠久的村落，但它的「圍」卻與新界一般的圍村如錦田吉慶圍不同。新界的圍村是在村外建成一道獨立的防禦外牆，但衙前圍的「圍」卻是由村屋的外牆相連而成。根據當地氏族的族譜資料，可知衙前圍建成的時間，當在 1570 至 1574 年之間，至今已經歷超過四百年的滄桑。

到十九世紀的中後期，九龍城區一帶已建成了數目不少的村落，除衙前圍外，其他如衙前壟、馬頭圍、馬頭涌、衙右頭、二王殿、九龍仔、東頭、西頭、鶴(福)佬、靠背壟、交杯石等村。為了自保，當時的一些村落又組成

聯盟，例如「九龍七約(或七保)」。所謂七約，其實數目多於七個，至少應包括九條村落：衙前圍、衙前墾、馬頭圍、馬頭涌、靠背壟、打鼓嶺、大磡、隔坑、沙埔。從現今的選區劃界範圍而言，部份上述村落已經越出了九龍城區之外。

漁業活動的開拓

香港是一個漁港，所以捕魚作業也是它傳統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項目。九龍城區佔了由紅磡至九龍灣的水道，所以東九龍一帶的捕魚行業亦自然在香港佔一席位。可惜自從九龍城區落實城市化政策之後，即由 1916 年九龍灣開始大規模填海以來，本區的漁業已是一蹶不起，無復當年之勇了。

據 1930 年代末期漁業協會的調查，全港漁民共有七萬四千多人，主要分佈在長洲、香港仔、筲箕灣三處，各有約一萬五千人，而他處如荃灣、大埔、赤柱、西貢、大澳、吉澳等地，各有數千至數百人不等。九龍城區在這次調查中，已不被點名提起，可見在本業之中，即使未全被淘汰，亦已無關痛癢了。

採石業的繁衍

本區還有另一項採石的傳統經濟活動。根據 1846 年的資料所見，香港的大宗出口，是每月大約一百隻由七十至一百噸重的船艇，滿載由新界開採而來的石材離港，前往大陸，目的地是廣州和西江一帶。至於由東九龍的石礦場開採而來的石頭，則專供本地之用。這裏指的是位於東九龍牛頭角、白鶴山和土瓜灣一帶的石礦場，牛頭角村就因成為採石工匠聚居之地而有名。

當九龍城寨於 1846 年始建之時，城牆所用的巨大石頭，全部來自這些石礦場，先是白鶴山、土瓜灣、牛頭角，最後甚至有遠至尖沙咀採石的。清廷法律嚴禁私採石礦，只容許官批開辦，所以建築九龍城寨時所用的石頭，必須以公文公佈臨時開禁，又三令五申私自開採的禁令。其中一份寫於 1847 年 1 月 26 日的公文，標題是「封山祝文稿」，用意申明公用之石頭開採已經完成，此後重又封山，禁止民間開採，並以祭典儀式出之，以表隆重之意。英國接管香港之後，也禁止私開石礦，但以發牌制度加以規管，成了官批開辦的另一番的景象。

九龍街市集的出現

本區的採辦石礦業務一如它的漁農業，在 1920 年代之後亦逐步走向衰亡，而真正能夠完整地勾勒出這個歷程的，是區內九龍街的興衰。九龍街不是街名，而是一個商品集散地的墟市。香港地區內最早的墟市，是明代開墟的元朗墟，次早的是清朝乾隆年間出現的大埔墟。到嘉慶年間，新安縣內有墟市三十六處，每個墟市的平均人口大約六千三百人。這些墟市位於現今港境之內的，約有一半，平均人口也在六千人之數，全部都是由官府認可的。

九龍街卻不是由官府認可的墟市，所以不見於官書文獻之中，只散見於本區原居民的族譜內。這個墟市的範圍由白鶴山山腳近東頭村處開始，一直延展至九龍灣海濱，但不包括九龍城寨。九龍街是由實際環境所催生的，因為往來於閩粵的船舶途經香港時，以由西至東的航程來說，一般都著意避開港島南部的狂風勁浪，而改由汲水門，經尖沙咀、九龍灣、鯉魚門及佛堂門等處航向外洋。由於水流和潮汐等問題，船隻無法連續通過汲水和鯉魚二門，而必須在維多利亞港內稍作勾留，以待水流出航之便。勾留期間，九龍灣就成了最佳的停泊處，停泊之時，不免上岸添補新鮮蔬菜、食水、柴薪及繩索之類，日子一久，市集規模於是成形。

九龍街市集的興衰

大約到十八世紀後期，九龍街已經發展至一定的規模，而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其規模更加可觀，這點可從道光二年（1822 年）九龍城侯王廟重建後有關的碑文中可見。在碑記中列名的捐助者，除個人外，還有超過一百個的商號名稱，其中除去少數位於赤柱、大埔、深圳和石灣的商號外，大部分都沒有注明地區出處，以一般習慣而論，應是位於廟宇附近的商號，因為傳統上，這些商號都是以侯王為供奉對象的。

二十多年後，清廷興建九龍城寨，有關的公文談及白鶴山一帶時，說此地五里以內沿海地帶，店舖民房數百餘戶。以這個戶數與 1841 年時港島不同地區的人口相比都要多，可見九龍街興旺的一般情況。可是若以這種規模與大埔等處相較，九龍街仍是有所不如。前往九龍街做買賣的，以漁民和居於九龍半島以外的鄉民為主。鄉民出售的，多是剩餘的農產品及野外獵得的鳥獸。此外還有柴薪、乾草及生草藥等，這些都是漁民需求最大的商品。

有買必有賣，鄉民另一方面亦需要購入他們的主糧（因為不能自給自足）、副食品和雜糧（如食油、鹹魚、糖果及餅食）及其他日用品（如衣服、鞋履、農具及其他鐵器工具）。另外九龍街又聚集了各行各業的工匠（如裁縫、建屋工匠、各種維修技工等等），只要有所需要，大致都可在九龍街找到。到十九世紀中晚期，九龍街更發展出本身的飲食娛樂業，如茶樓、酒舖、甚至鴉片煙館等等。

九龍街的蓬勃發展至十九世紀後期，已悄悄的起了變化。首先是陸路交通出現了較大的發展，與九龍塘、何文田、土瓜灣、紅磡、深水埗、旺角、油麻地、尖沙咀、牛池灣及鯉魚門等地聯繫起來，再不是一隅之地了。九龍城對外交通的路線有以下幾條：

1. 經風門坳（約現今的東寶庭道近九龍仔公園處）、九龍仔（現今牛津道及蘭開夏道一帶）及九龍塘至深水埗。
2. 經馬頭圍、何文田至旺角及油麻地。
3. 經宋王臺、馬頭角、土瓜灣、紅磡至尖沙咀。
4. 經海濱一帶至牛池灣及牛頭角、茶果嶺及鯉魚門一帶。

其次在水路發展方面也頗為發達。在 1875 年，長六十尺、寬六尺、橋柱共二十一條的龍津石橋落成，第一代九龍城碼頭出現了。龍津石橋的碼頭設施既容許較大型的船隻泊岸，自然促進了水路運輸交通的開展。當時一間名為南國的輪船公司，便因此開辦往來九龍城至澳門和廣州的渡輪服務。

陸路交通的發展，令本區或他區鄉民多了不少選擇，例如他區的鄉民可以不必到九龍街作買賣，而改往深水埗、旺角或油麻地等區的新關墟市，那裏的商機可能比九龍街的還要來得充實與蓬勃。同樣地，水路交通的改善也令貨物流通較以前暢順和向度增多，令本區鄉民更方便的前往他區作買賣，這些對九龍街而言，都做成一定的衝擊。

九龍街市集的消亡

然而更大的衝擊卻來自 1910 年代以後的發展。首先是 1910 年九廣鐵路英段的完成，加上先後於 1910 及 1920 年代完成的大埔道與青山道，把新界及大陸的農產與日用品，以較大的數量和較低廉的價錢運抵九龍，九龍街的地位從此受到了最沉重的打擊。

影響更大的是由 1916 年起開始的九龍灣填海，和隨之而來的啟德濱發展計劃。這個地區在城市化發展政策之下，到 1920 年代末期已變得面目全非，不堪相認。地區的徹底城市化等於農耕土地大量減少，而海灣填土，天然海港的消失亦等於漁業乾涸，造成九龍城區漁農業最終的沒落。同樣地，本區原來頗為發達的石礦業，於 1920 年九龍灣填海剛開始不久，整區（包括紅磡、馬頭角、九龍灣、九龍塘及九龍仔等）的石礦場面積已萎縮至 21.66 英

畝。到 1925 年計劃大約完成過半時，面積變得只有 8.2 英畝，再到 1929 年計劃大致完成時，整個地區石礦場的面積更只剩下 3.08 英畝。

九龍城區漁農及石礦業的沒落，與九龍街衰敗的歷史幾乎同步而行，互相體認印證，默默相扶無語。1928 年港府把九龍城的龍津石橋拆去，等於宣告了九龍街歷史任務的完結，以後的朝暉晚晴，再也找不到九龍街的昔日繁華，它亦無從俯仰以後人間的今古了。

第三章參考資料

官書文獻資料

陳鏹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兩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年。

舒懋官：《新安縣志〔清嘉慶二十四年〔公元 1819 年〕〕》，香港：黃承業重刊本，1992 年。

靳文謨：《新安縣志〔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 1688 年〕〕》，出版地缺：出版者缺，1688 年。

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Noronha & Co., Government Printers, 1899.

Eastern No. 88,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Kowloon-Canton Railway. London: Colonial Office, 1907.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s 1909-1940.

Hong Kong Blue Books 1871-1940.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y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Noronha & Co., Government Printers, 1900.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y for the Year 1900.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7 August 1901.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y for the Year 1901.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2 May 1902.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y for the Year 1902.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7 August 1903.

Stewart Lockhart, J.H.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y at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8 April 1899, pp.535-552.

Orme, G. N.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y for the Years 1899 to 1912*. Hong Kong: Noronha & Co., Government Printers, 1912.

其他史著

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 年。

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第一冊》，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 年。

張曉輝：《香港近代經濟史(1840-194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

劉蜀永主編：《20 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書店，2004 年。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88 年。

黎晉偉主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 年。

盧受采，盧冬 著：《香港經濟史》，香港：三聯書店，2002 年。

Hayes, Jam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Archon Books, 1977.

Hayes, James.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第四章 九龍城區城市化及其工業發展的軌跡

自 1920 年代開始，九龍城區以採石和漁農為業的社會就逐漸步向式微，緊隨而至的是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加大，最終改變了整個區域的面貌。

當時港島的城市發展已頗見規模，但因此也有點無以為繼，如果要保持和擴大香港城市的發展，規劃九龍就成了惟一的選擇。1905 年，港府開始鋪設彌敦道，首先連貫了九龍半島的南北通道。更為重要的是 1909 年，中華電力公司(China Light & Power Co., Ltd.)出售在廣州的發電廠，轉往九龍繼續發展，在紅磡鶴園海濱建成一座發電廠，從此九龍有了電力供應，標誌著本區城市化的真正來臨。

緊接著於 1912 年港府又開發接壤界限街的深水埗，把九龍市區與它銜接起來。此外還有大角咀、芒(旺)角、油麻地、尖沙咀等地，結果令原來的農村一去不返，無復原貌。面對同一情況而緊隨其後的是九龍城區。

九龍塘花園城市的規劃

1922 年，港府推出九龍的城市規劃方案，並同時批出九龍塘花園城市的計劃。這個城市規劃方案，是香港第一次以城市規劃原則，應用於發展城市研究之上，所以意義特別重大。在此方案之內，整個九龍半島都經過周詳的調查、研究，又作了仔細的地圖紀錄，列出種種發展的需要及藍圖，規範了整個九龍半島的發展方向。九龍塘花園城市計劃就是其中一個主要的發展藍圖。

花園城市這個概念原由英國建築師艾實力薩 侯偉德(Ebenezer Howard)所創，用意在建立一個交通便捷、自給自足的中型工商業市鎮，既接近農業區，但又把工商業與居屋分隔開來，讓居民盡享休憩及社交活動的生活空間。

1922 年政府批准的花園城市計劃，由一間私人公司“九龍塘及新界發展公司”(Kowloon Tong and New Territories Development Co.)興建，負責人為義德(C. Montague Ede)。原來的構想是希望在九龍塘建成多幢獨立或半獨立、附有小花園的兩層高平房，其中有學校、遊樂場等設施，並且靠近火車站。當時預計在 80 英畝的土地上建成二百五十所平房，後來由於反應奇佳，發展商提出在馬頭圍、九龍仔、啟德、油麻地及旺角等地推出類似的計劃。其中馬頭圍的計劃還帶有相當濃厚的中國農村色彩，但最終因不符原有的城市規劃而被政府否決了。

由於計劃的對象是以中上階層的市民為主，不受勞工團體歡迎自是意料中事，而他們的批評也不很客氣，加上平整土地工程未能如期完成，發展計劃因此受阻而有所拖延。港府在工程技術上，其實有不少問題必須首先解決，例如在九龍塘山挖泥造地，於區內東面興建明渠，然後再與區內北面的小溪相連，又需要興築排污渠、雨水渠及興建道路等等，單是這些工程的費用就超過一百萬元。

最初負責這些工程的是李興兄弟公司(Li Hing & Bros.)，可惜未能如期完成。港府被逼於 1929 年 11 月再與敬德昌公司(Keng Tak Cheong)簽約，繼續未完的工程。可是整個計劃的進度並不理想，加上地產價格日走下坡，最終經政府財政支援後，計劃才能於 1930 年完成。

九龍塘城市花園規劃的落差

計劃雖是完成了，卻與英國的花園城市不大相同。建成後的九龍塘住宅區，並不符合原先城市花園的構思，發展既不平衡，區內設施多元化又不足，有失花園城市自給自足的原來概念。這個成果最多只能算是與地產市場掛的高尚花園洋房區，不能算是花園城市。

由於最初的規劃是以英式的花園城市為藍本的，九龍塘區的整體環境都洋溢著一種英國的鄉村韻味，連街道名字也是如此，例如多實街(Dorset Crescent)、根德道(Kent Road)、對衡道(Durham Road)、羅福道(Norfolk Road)、劍橋道(Cambridge Road)、牛津道(Oxford Road)及德雲道(Devon Road)等等。

九龍城區另一處受城市化影響最深遠的是九龍灣附近的啟德機場一帶。當年興建機場其實是由建造一個市郊華人住宅區的計劃開始的，由定例局(立法局)議員何啟爵士與華商區德合組的啟德土地公司提出，目的是在九龍灣填海 230 英畝，預計興建四十七座高尚住宅單位，並以華人為銷售的對象。後來因為情況有變，需要港府介入才能完成填海工程。由於第六章是專談啟德機場的種種建設的，這裏暫時擱下不論。

工業發展的步伐

九龍城區城市化還有另外的一重意義，那就是工業發展步伐的來臨。香港從開埠以來，一直是一個自由港和商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它的主要經濟活動，是與中國大陸進行轉口貿易。由西方和日本輸入石油、橡膠及其他工業用品，然後轉運往內地。另一方面則自內地輸入原料等產品，經加工和包裝後，再輸出到鄰近地區如馬來亞和其他西方國家。在轉口的過程中，香港還提供了優良的金融、船務、保險和倉庫等商業服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的工業發展其實並未生根。港府於 1935 年評估 1930 年代商業衰退的原因時，談到香港的工業，特別指出香港並非發展重工業的適當地方，但造船及船隻維修業則是例外。其中一個如此的例外就見諸九龍城區的紅磡。

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只有一些簡單的家庭手工業，或「山寨」式工業，主要供應本地市場，如一些簡單的食品加工、製造啤酒、汽水、香煙及肥皂等工業。從九龍樂善堂有關公選總理的名單資料看，九龍城區就有類似的例子。例如從事大型漂染紡織業的祥益染房、東華布廠、南興布廠、華藝織廠等，從事醬料加工的冠珍醬園和美珍醬園。

另外九龍城區歷史比較長久的工廠，還可舉出一些例子，如建置於 1881 年的紅磡同茂皮廠，其出品商標以象牌為記；位在九龍城而創於 1927 年的元興電機織染廠；成立於 1931 年的香港樹膠製造廠有限公司，製成品為樹膠鞋、單車內外胎及其他樹膠製品，所用的商標是錨嘜；創於 1933 年的土瓜灣捷和鋼鐵廠，以生產軍需品為主，如鋼盔、防毒面具、刺刀及其他軍用鋼製器材用品等；總店設於砵甸乍街的人興牛奶公司，其消毒工廠及畜牧場分別設於九龍城道和鑽石山；最後是成立於 1934 年的三鳳粉莊，廠房設在北帝街，以孖金錢為註冊商標，主要出品有面粉、海棠粉、牡丹粉和西施粉等。

造船及維修船隻工業

香港造船及維修船隻這些稍具規模工業的出現，完全是與港口的服務有關。1843 年香港建成了一艘重八十噸的船，由於港口服務擴大的需要，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本港已先後成立了太古、香港黃埔和海軍船塢三大造船廠。以規模而論，首推成立於 1863 年的香港黃埔船塢公司(Hong Kong & Whampoa Dock Co. Ltd.)。

這間公司是由怡和洋行與大英輪船公司及德忌利士輪船公司合併而來，資本二十四萬元，收買了由英國人最早在廣東建立的高柏(黃埔)船塢(Couper Dock)及阿巴甸船塢(Aberdeen Dock)。1865 年它又收購了林蒙船塢(由 Captain John Lamont 擁有)和賀普早塢(Hope Dock)。1870 年再收購於仁(聯合)船塢公司(Union Dock Co.)，並把資本提高至一百萬元，十年之後的 1880 年，它又與大角咀的四海船塢公司(Cosmopolitan Dock Co.)合併，實力更是雄

厚。1888 年，香港黃埔船塢公司在英國海軍部的協助下，於紅磡建立一個可以容納英國海軍最大船艦的新船塢，令紅磡地區開始受人注目。

到十九世紀末，它僱用的工人總數約三千五百至四千五百，擁有紅磡、大角咀及石排灣三個船塢，共九座造船台，起重架吊裝拉力為 100 噸，能夠建造 700 英尺長的船體。根據資料紀錄，1899 年它建造了二十一艘船舶，而 1900 年僱用工人數目為四千五百一十。其後，它不斷擴張，1910 年時的資本額為三百萬元，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香港黃埔船塢公司的資本更增至七百三十萬元。這間公司當時的業務，已不限於到港商船，而是擴展至整個遠東海面上的大小船隻，為它們提供必須的維修服務。

生產英泥的工業

九龍紅磡除造船及船隻維修業外，還有製造英泥的工業。這家公司叫青洲英泥公司(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於 1890 年在澳門的青洲開業，資本二十五萬元，由德資瑞記洋行(Arnhold, Karberg & Co.)管理。1899 年，這間公司在香港九龍的紅磡，開辦了另一間規模及設施更大更完善的工廠，但管理則改由旗昌洋行(Shewan, Tomes & Co.)負責。

青洲英泥公司在紅磡的廠房到 1908 年時，面積已擴展至一百萬平方英尺，產量每月達八千噸，而與此同時，澳門同名的水泥廠亦月產二千噸，令每年總產量共約十二萬噸。其中製造水泥的黏土來自珠江三角洲，石灰石則來自廣州附近一帶。青洲水泥若與最好的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相比，質量都被認為不相上下，可堪匹敵。很多英國海軍工程師甚至認為，它的水泥擴張強度極好，選之為修建填海地區船塢的專用水泥。

日治時期及戰後工業的面貌

進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期，由於日軍侵華戰事逐步蔓延，當時很多內地的金融家和企業家為避戰火，南下香港，先後把資金投在本地的工商業內。例如在 1939 年，上海的內地企業家在九龍開辦了六家大工廠，有合成氮氣廠、織緞廠及廣告印刷廠等等。

根據香港《大公報》1940 年 10 月 21 日的報道，為走避戰火南來已註冊或未註冊的大小工廠共四百三十二家。其中以織造業的最多，手電筒業次之，食品業又次之，其他輕工業和化工廠的也不少，廠址則以九龍城、深水埗及荔枝角一帶佔多。例如織造業中，八達電機棉織廠原是廣州的紡紗廠，於 1938 年因廣州淪陷而遷來香港九龍城蒲崗村。友仁織帶製尺廠在廣州淪陷後，則在 1939 年由廣州移至九龍亞皆老街。

二次大戰之後的六、七十年代，九龍城區的土瓜灣更被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區。前面談過的香港元興電機織染廠就是其中一例，另外是製造燈塔牌手電筒的香港捷和製造廠(1947)有限公司、專業漂染各種布匹的禎昌染布廠、製造火水燈的立泰製造廠有限公司、製造機器的新聯機器廠等等。

由上述而觀，可見九龍城區工業發展的軌跡，也可略顯九龍城區在香港工商業擴張中的一般地位。時至今日，土瓜灣工業區和黃埔船塢公司及青洲英泥生產工地等已經消失，舊跡杳茫，似乎不堪聞問，遑論其他臨時托寄棲身、候變而動的工廠了。從地區的規劃而言，九龍城區更非復工業發展之地，逐步讓位與觀塘、荃灣甚至大埔等之區域。

首先，黃埔船塢於 1988 年改建成為現在的黃埔花園，之後他遷的是青洲英泥生產工地，到 1991 年，中華電力公司的鶴園發電站亦被拆卸而成今天的海逸豪園，甚至連建於 1907 年的馬頭角牛房，也於 1999 年中遷往上水屠房。

今天九龍城區由何文田、九龍塘、紅磡，至馬頭角、馬頭涌、土瓜灣及九龍城等分區，都已徹底城市化，並蛻變而成城市居所之地，真正回應了二十世紀初期城市規劃的宏願。

第四章參考資料

官書文獻資料

- 《香港工業》，無出版機構名字，出版地缺：出版者缺，1953年。
- 王楚瑩編：《香港工廠調查》，香港：南僑新聞企業公司，1947年。
-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 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 許晚城編：《香港工商通訊錄》，上海：龍文，1940年。
- 陳真等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全四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至1961年。
- 陳祖澤，梁培藻編：《九龍樂善堂特刊》重刊本，香港：九龍樂善堂，1986年。
- 聶寶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1840至189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 經濟導報社編：《香港商業手冊》，香港：香港經濟導報社，1960年。
- 麗的呼聲日報編：《香港工商業概覽》，香港：麗的呼聲日報，1959年。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ol. 45, 1901.
-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s 1927-1930.
- “The Industrial Wealth of South China---The Future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Daily Press ed., Anniversary Supplement 1857-1917*.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1917.
-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Enquire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Present Trade Depression in Hong Kong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Existing Position an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rade of the Colony,”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 1935.

其他史著

- 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 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
-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年。
- 張曉輝：《香港近代經濟史(1840-194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
- 黃光域：《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 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書店，2004年。
- 盧受采，盧冬 著：《香港經濟史》，香港：三聯書店，2002年。
- Benham, F.C., “The Growth of Manufacturing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tober, 1956: pp.456-463.
- Endacott, G.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Faure, David, Lee, Pui-ta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Econom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Friedman, Irving S.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 Szczepanik, Edwar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第五章 樂善堂的建立及其貢獻

樂善堂與傳統鄉治的關係

九龍城區樂善堂的出現，與清代的鄉村基層建制有關。有清一代，在鄉村推行牌甲制，或稱保甲制，用意是加強地方的治安。方法是按戶口編定牌甲，凡州縣城鄉，每十戶立一牌，設牌長一名，每十牌立一甲，設甲長一名，每十甲立一保，設保長一名。每戶派予一張印信紙牌，稱為門牌，上寫人戶姓名、丁男數量，出外則寫明去處，以便稽查。外地來客亦以此牌審查其來處，如來歷不明的，當即勒令離開，不得稍留。

牌甲之內，無事時互相稽查，有事則互相救助。可見日常稽查是常例，但互相照應救助也是應有之義。在中國傳統制度中，救濟扶持老弱的機構一般叫養濟院。清代的養濟院，負責收養鰥寡孤獨，老弱殘疾，窮而無告者，由政府每年供給銀米，冬天則發放棉衣。除了政府的救助之外，它還動員社會力量，鼓勵自願捐獻，扶貧醫病，然後由政府嘉獎表揚，功在桑梓，傳之地方。

這種半官方或非官方的救濟機構，常見於晚清之際，十分普遍，例如廣州廣仁善堂、佛山萬善堂、汕頭同濟善堂、江門明善堂、北海普善堂、上海仁濟善堂等等，而在香港九龍城類似的一間，叫樂善堂。

樂善堂的始建

樂善堂始建於 1880 年，雖有一說較早於此年，惟資料不足以佐證，仍以 1880 年為佳。這時英國已佔領了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但新界則尚屬於新安縣，由清廷管治，因此鄉治和救濟老弱的制度仍為牌甲制與民辦養濟院式的。當時樂善堂代表了原來九龍村落的公益，以九龍城為核心，由此向東西北等周邊伸延，包括現今九龍城一帶、蠔涌、荃灣及沙田等四約二十三村的地域。

這個區域其實涉地甚廣，可以遠至鑽石山及西貢井欄樹的，例如 1894 年港島太平山區爆發鼠疫，樂善堂除在九龍城打鐵街堂址設廠施藥之外，還於鑽石山建置臨時墳場及義莊寄厝，又在西貢井欄樹設立義塚，由此足見四約二十三村互相扶持的緊密程度了。

經辦慈善事業非財不行，那麼樂善堂的經費從何而出呢？這與龍津石橋有密切的關係。時維 1880 年之際，九龍城因港島及九龍半島先後被佔，已經成為中國與英國相接的前線大門，再加上與英佔之地的商貿關係轉密，清廷遂有擴建九龍城龍津石橋之議。

龍津石橋原本建於 1873 年，是九龍半島割與英國後，中國官員由水路進入城寨的必經通道，突顯了龍津石橋在政務上的重要意義。1871 年之後，為了遏止鴉片走私，清廷粵海關分別於汲水門、長洲、佛頭洲及九龍城外設立四個稅關，對鴉片等貨物徵收進口稅。由於地理環境的因素，九龍城稅關當以龍津石橋為基地，向有關船隻徵稅。擴建之後的龍津石橋，對稅關徵稅的活動只會來得更加方便與周詳，再突顯了這座石橋在國家稅務中的地位。

另外，擴建後的龍津石橋還加重了它本來的經濟意義。碼頭規模對貨物的交流及貿易量，起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九龍街由於龍津石橋的功能，成了當地一個規模很大的墟集。墟集是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而貨物在碼頭交收時，經過「公秤」制度的認可是必不可少的步驟。每次秤量都必須繳費，而這種費用就成了樂善堂經費的主要來源。

由上而觀，樂善堂的經費主要以「公秤」所得而來，輔之以國家關稅撥款的資助，再加上在國家鄉治制度的前提下，九龍城寨官員自然全力支持。這三點因素令樂善堂得以盡力推動公益，行善於地方。可惜不足二十年，到 1898 年樂善堂的公益事務就第一次被逼結束了。

英國強租新界是以 1898 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為基礎的，新界地方以九十九年期租與英國，成了英國香港殖民地的主要部分。1899 年初，英國正式接管新界，同年稍後，又以九龍城寨駐兵有礙香港防務為理由，遣兵進入城寨，用武力驅趕清軍，政治形勢從此大變。

樂善堂業務發展的轉折

樂善堂的開辦，全靠官員的支持，關稅的撥款支助，與「公秤」收入的維持，現在政治身份轉變，首先整個清廷鄉治制度牌甲制，及民辦養濟院式的公益制度頓時消失，官員的支持落空了。加上粵海關設立的九龍城稅關，因為城寨清兵被趕，連帶稅關官員也被逐，關稅的撥款資助自然亦落空了。即使「公秤」收入一時之間仍可繼續，也因前景不明，顯得有些無以為繼。

停辦五年之後的 1904 年，樂善堂再次恢復堂務。其中最大的不同處，是堂務只限於九龍城區的地域，以前沙田、蠔涌及荃灣等四約二十三村並不包括在內。在英國治權之下，牌甲制是不存在了，但由於田土轉制的關係，令樂善堂多了一大筆不動產。

新界原來的田土制度大致上是永業田的，由田主永久擁有土地，可是英國田土制度一般只有租用權，法律只容許土地租借使用，期滿之後政府有權收回土地，另作處置。由 1899 年至大約 1903 年這段時間，港府就正忙於處理新界土地轉制的問題，向村民另外發出新的土地契約。

當時九龍城區一批熱心公益的人士，為了免卻土地轉契的種種繁複手續，索性把產業捐予樂善堂。另外，香港政府為了表示支持公益活動，也為了籠絡華人社區，亦把本堂原址打鐵街三十二號的業權交予樂善堂簽收。如此一來，加上本區居民的捐獻，樂善堂一下子擁有八處房產的業權，成了復堂的最大本錢。

這八項業權包括了九龍城打鐵街三十二號樂善堂堂址、九龍城大街二十八號石屋一間、沙浦道十六號小屋一間、東頭村東門 5432 地段小屋一間、橫街八號石屋一間、石鼓壟道五十六號平房一間、舊大街四十五至五十一號兩層石屋一間及同街四十五號另一地段兩層石屋一間。除本堂堂址外，其他業權的租銀成了 1904 年樂善堂復堂後的主要收入。

這亦成了以後樂善堂的特色，以前它的收入是關稅的撥款加「公秤」收入，現在是靠堂友的捐輸和「公秤」費用，而以捐輸為最重要的財政來源。可惜也正由於金錢名位利益的爭持不下，到 1923 年，樂善堂又第二次被逼停辦，與第一次的相隔也是不足二十年。

停辦六年之後的 1929 年，譚傑生出任樂善堂的首值理，全力振興本堂的堂務，加上於 1930 年代引進東華三院以顏成坤等總理為首的助力，全力改革整頓堂務，從此樂善堂的堂務進入正軌，除去了內外之憂，得以穩定向前發展。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樂善堂的組織

樂善堂穩定下來之後，整個組織都變得上下有序，分工精細。堂務總負責人是正首總理，輔以兩位副首總理，兩位正副司理，及司庫和核數各一人。這七位就是樂善堂的常務職員，另外在處理本堂發展及對外公關等事

務上，又附設五名資深顧問的職位。這五位顧問是樂善堂的當然總理，雖不過問堂內的一般雜務，地位卻很超然。在此架構之內，還有樂善堂公選出來的總理，數目一般可以超過一百人。

公選總理的人數其實是沒有定額的，主要是按每年捐輸多寡而定，他們與管理層的七名常務職員的性質有所分別，但卻非全無關連。公選總理任期一般為二年，任滿則重新選舉，之後即從公選總理名單內再選任本堂的常務幹事。在眾多的公選總理中，出任顧問的公選總理至為重要。

這與樂善堂以往的不幸歷史有關。樂善堂早年因為內部出現複雜的人事糾紛，在至緊關頭卻缺乏資深元老，出面消爭解難，令局勢往往不可收拾，玉碎收場。因此之故，資深顧問的職位便乘時而生。

其實顧問也分二種，一是九龍城本區客籍土生的善長，他們對樂善堂的歷史掌故體驗深切，閱歷廣闊，代表了傳統鄉治建制的鄉紳力量，專責調解糾紛。另一種是非原區的外來商人，受九龍城的商機所吸引，前來發展，最後加入了樂善堂，這類顧問對樂善堂的日常堂務運作，起的作用很大，是它的決策核心所在。

以組織而言，1899 年以前的樂善堂是四約二十三村的代表，英國強租新界之後，樂善堂已失去此種代表性，但並非全無連繫。根據 1996 年度樂善堂總理就職典禮中，在「鄉村代表」一欄內，還列有荃灣、西貢、蠔涌、井欄樹、將軍澳、衙前圍村等代表各一人，但看來只不過是略顯昔日四約二十三村精神之意，並不涉及堂內實際的工作。

樂善堂興辦的教育事業

樂善堂於 1880 年建立以來，主要的功能是民辦養濟院式的，即負責收養鰥寡孤獨，老弱殘疾及窮而無告者，但這些善業大概因事而興，事了即停，並無長遠的救濟計劃。所以不論是贈醫、助殮或甚至辦學，無不以此為基礎。前面談到的 1894 年香港鼠疫爆發，就是最好的例子。鼠疫襲港，令樂善堂一方面贈醫施藥，但由於死人無數，亦同時增辦殮葬設施，於鑽石山、井欄樹等地建置義墳、義莊、義塚等。鼠疫過後，功德即算完滿。

當英國佔領新界之後，統一了全港管治架構，傳統的衛生觀念受到一定的衝擊，中醫中藥不免為政府所疑，希望能夠全權監管，這對樂善堂贈醫施藥的活動自然不能沒有限制。結果令它的善業發展，逐步走進開辦義學的方向去。

十九世紀以來，港府的教育政策集中於興辦官立學校，至於鄉村學校則由宗教和慈善團體負責，政府只在名義上略加資助。到 1909 年即英國佔領新界後十年，港府教育署直接管轄的學校共十四所，學生二千六百三十六人，而接受資助的學校共五十八所，學生五千六百四十六人。以學校數目而論，1909 年的七十二所與 1881 年相同，可是學生卻於約三十年內，增加接近一倍，可見學校數目明顯偏低。再據 1914 年的數字顯示，平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適齡兒童能夠入學就讀。從這個角度來看，樂善堂舉辦義學的貢獻就非常可觀了。

以九龍城區義學的發展看，龍津義學的歷史最為悠久，早在 1847 年便已設置，後來因城寨官員於 1899 年被逼撤走，學校一度廢棄。到民國以後，舊址改為九龍城公立高等及初等兩所義學。至 1920 年代，由戴若瀾及劉永福創辦的坤成女義學成立，是當時為失學女童提供普及教育的第一所學校。後來因為經費困難，由樂善堂接辦，數年間變成一所共二百多人的男女義學。到 1939 年，開辦於九龍城的專上院校、中、小學、專科學校及義學共有五十多所，如南華大學（校董為王寵惠、張君勳等；校址設於九龍城獅子石道）、仿林中學九龍分校（九龍城公園道二號至四號）、香港法文專修學校（九龍城太子道四三三號）、九龍孔聖會義學（九龍城宋街卅二號）；其中女校佔二十多所，約近一半之數，如中華聖公會女校（九龍城侯王道二九號）、明藝女書院（九龍城衙前圍道三八號）。

其實樂善堂舉辦的義學，財政一向很吃力，盈少虧多，虧欠部分只能由樂善堂撥款補貼。以發展情況而言，當 1920 年代樂善堂接辦女義學初期，校舍位於善堂の後屋，共收容女生二十人。稍後另闢新樓以增辦男義學，男女總人數增至八十多人。至 1938 年，學生人數再增至一百九十人，最後基於能力所限，把人數定為一百七十八人。

單就 1939 年的數字來看，每月女校所收堂費為七十八元，以每人每月堂費五毫計算，女義學的人數當為一百五十六人。男義學堂費所得為四十一元，以上述同一比例計算，男學生人數為八十二人，總計超過二百人，高於上述一百七十八人的基數，可見樂善堂營辦義學的艱困與苦心。

樂善堂自 1880 年始建以來，幾經衝擊，可說內憂外患。先是新界治權轉移，原來制度瞬間消失，無所依托，繼而內爭耗費，損害至巨。可是基於以善業為先，不計得失，終能重回正軌，令堂務向前推展，造福地方。特別在興辦教育方面，既開風氣，又替社會栽培人材，眼光宏闊，貢獻不小。更堪贊賞的，是堅持開放，與時俱進，不斷接受挑戰，由鄉村而城市化，由傳統而接受西風洗禮，成了整個九龍城區現代化的最佳標誌。

第五章參考資料

官書文獻資料

乾隆官修：《清朝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s 1894-1940.

其他史著

九龍樂善堂：《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香港：聯藝印刷有限公司，1981 年。

林天蔚，蕭國健：《香港前代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陳祖澤，梁培藻編：《九龍樂善堂特刊》重刊本，香港：九龍樂善堂，1986 年。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 年。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第六章 啟德機場的發展與香港經濟成長的面貌

九龍城區的啟德機場是區內一個最顯赫的地標，其後的發展卻令這個地標變為香港最令人矚目的象徵，成了香港現代化和國際化的耀目標。其實啟德機場的出現，原來是九龍城區城市化的意外成果，其中隱含了一段曲折而坎坷的歷程。

興建九龍灣華人高尚住宅區

前面第四章談過 1920 年代九龍半島的城市規劃，當時在九龍城區建立的花園城市其實有二，一個在九龍塘（參看第四章），另一個則在九龍灣，而在九龍灣興建的是一個專為華人而設的高尚住宅區。

這個建屋計劃由一間叫「啟德營業有限公司」(The 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mpany Ltd.)負責。這間公司很有特色，主要的股東都是香港赫赫有名的華人，例如佔「啟德」其中一字的何啟，於 1910 年受封為爵士，並出任香港定例局（即立法局）的議員前後共十八年。可惜何啟於公司成立的 1914 年便因病去世，因此實際業務營運的工作，就落在佔另一個「德」字的區德身上。

區德由 1914 年開始出任啟德公司董事局的主席，直到 1920 年去世為止。他是百貨店昭泰隆的東主，以售賣攝影器材、珠寶飾物及傢具等入口貨品而聞名港九。在他死後出任公司主席的是張心湖，張也是富商，先後擔任保良局及華商總會的總理。

此外還有韋玉爵士，是香港定例局（立法局）的華人代表，又是保良局的創辦成員之一；周壽臣爵士除是定例局的成員外，更於 1927 年成為本港首位華人議政局（即行政局）議員；曹善允博士是潔淨局（市政局前身）和定例局議員，是啟德公司的代表律師。何啟去世後，全力負責與政府磋商有關填海的事宜；伍廷芳的兒子伍朝樞在國民政府內歷任要職，也是啟德公司的重要股東等等。

啟德公司向港府解釋自己的建築計劃時，提出了兩個目標，一是由於國內清朝覆滅，局勢動盪，有必要為大批南下香港的富有華人，提供舒適的住所；二是希望藉此舒泰的居住環境，令他們長留香港，投資發展本地的經濟。

填海工程的反覆

在九龍灣興建住宅區，首先必須填海。發動此事的人是何啟，時間是 1912 年。經過勘察的工程後，他正式於 1914 年向政府提交計劃的建議書。可惜英國政府正考慮在香港興建無線電通訊站，九龍灣是選址之一，因此一直沒有回覆。同年 5 月，由於選定昂船洲之故，政府於是回覆何氏，說明準備研究他提出的建議書。同年 7 月，何啟急病逝世，計劃一度受阻。到 11 月，啟德公司才再次提出。一年後，英國正式批准這個建屋計劃。

啟德公司填海的計劃，準備由九龍灣沿岸（現在太子道東及觀塘道一帶），向南填海約 200 畝。新的海岸線西起約由現今尚存的啟德機場控制塔，東至今天的麗晶花園及啟業村，全部工程共分三期進行。

第一期的工程於 1916 年開始，到 1920 年完成，之後立即動工興建房屋。這個被稱為「啟德濱」的地域共分七條街道和七個地段，四條橫貫東西而由海邊北向的，依次為啟德道、啟仁路、長安街和啟義路。縱連南北走向，依次由西至東的則有一德路、二德路及三德路。

啟德濱完工之後，為了吸引住客，啟德公司曾經化了不少心思。由於交通不便，當地的交通運輸只靠人力車前往紅磡，與不定期的小渡輪船前往港島。為此啟德公司於 1923 年特別成立了啟德汽車有限公司，為居民提供來

往啟德濱及尖沙咀天星碼頭，與油麻地碼頭的巴士服務。後來因為形勢逆轉，這間公司先於 1928 年被電車公司收購，但仍以原名營運，至 1933 年它更被九龍巴士公司全面收購，啟德汽車公司的名字正式消失，成了歷史名詞。

1920 年九龍灣第一期填海工程完成以後，照計劃應該繼續進行第二期工程，可惜卻無甚進展。當時連續數年的香港年報對相關的報導都是負面的，1922 及 1923 年是工程在進行中，1924 及 1925 年是進度欠佳，1926 年是工程停頓，最後到 1927 年是填海工程被政府接管。

由此可知啟德公司第一期以後的填海計劃，明顯是胎死腹中，無以為繼，而這與當時香港的政經形勢關係密切。先是 1920 年，太古船塢、皇家海軍船塢、香港電燈公司與電車公司等機構發生工潮，工人為爭取加薪而罷工。接著而來的是 1922 年的海員大罷工，更多行業支持海員的行動，結果嚴重影響了香港的經濟活動，只靠英軍維持起碼的基本服務。1925 年，更加波瀾壯闊的罷工浪潮出現了，歷史上稱為省港大罷工。

當時正是國民軍北伐號角全面響起的時候，民族情緒至為昂揚，起因是上海和廣州分別發生了五卅和沙基慘案，事件中英國軍警向示威者開火，死傷數目不少，激起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反英浪潮。廣東工人為此號召罷工抗議，本港二十五萬工人及其家屬於是投入運動，展開了共十五個月的大罷工。

經濟當然大受衝擊，令省港的貿易全面停頓，總額損失達五億元，數以千計的大小公司被逼倒閉。面對如此惡劣的營商環境，加上地價全面下滑，房屋銷售情況之壞自亦在意料之中，啟德公司所有的填海工程結果全部停頓。

興建機場的選址與落實

對英國而言，省港大罷工帶來的是經濟損失，而當時中國北伐卻引起另一種的政治損失，因為中國各地民眾借北伐的形勢衝擊英租界，令國民政府得以收回漢口、九江、鎮江和廈門等地的英租界。英國恐怕影響香港的安全，也為了防衛的問題，遂興起了在香港建造一個空軍基地自保的念頭。

尋找適當的機場選址是第一個應當考慮的問題，而環顧香港，也只有九龍灣一帶最有如此的條件。香港山多而平地少，大幅平地除元朗一帶平原外，只有啟德的新填海區了。它還有另一特點，那就是靠近維多利亞港，更能切合水、陸兩種飛機的需求，因為當時水上飛機在航空上佔 相當重要的地位；在當時來說，這樣的有利位置可說世界罕見。1925 年的香港政經形勢，更突顯了選擇啟德填海區的有利條件，因為啟德公司正面臨重大的財政難題。

為了興建機場，政府面臨兩大問題，接收啟德填海區和籌措資金。最初港府提出以一百萬元向啟德公司收購填海區，幾經交涉後於 1927 年 12 月以一百萬零一千二百五十元完成交易。第一個難題是解決了，但籌集足夠的資金卻有些棘手。1926 年初有關的經費預算原是一百七十三萬八千元，其中一百萬元用作收購啟德填海區，餘下的則為完成第三期的工程費用。可是到 1927 年初，預算上升至二百零三萬六千五百元，除非英國政府撥款協助，否則港府無法獨力應付。

英國政府對此一直不肯慷慨承擔，到最後也只願意撥款十萬英鎊（約九十九萬港元），而到了 1929 年初，經費預算已上升至二百七十萬元。面對如此困境，港府惟有自求多福，由定例局（立法局）於《公共工程(1927)貸款》（The Public Works (1927) Loan）內撥出約一百零八萬元，與原先的撥款合共一百七十萬元，正式動工興建機場。

機場的基本工程於 1930 年完成，整個機場的面積約二百畝。這個機場被冠以「啟德」之名，就現存的史料所知，是以啟德濱和啟德公司九龍灣填海之地而得名，即因應地方名字而稱之，並非如一般所傳，是紀念何啟和區德兩人而賜以嘉名的。

啟德機場原是皇家空軍的駐地，於 1927 年 3 月便已進駐，因此當 1941 年 12 月 8 日香港受日軍入侵之時，它成了第一個受攻擊的目標。當日早上 7 時多，十二架隸屬日本第二十三軍四十五飛行戰隊的九八式輕型轟炸機，在另外三十六架九七式戰鬥機掩護下，向啟德機場發動攻擊，還誤中了九龍城的民居。日本空軍的迅速攻勢，一下子幾乎擊潰了整個駐港的皇家空軍，自此令日軍佔盡了空中優勢。

日治時期啟德機場的變化

香港進入日治時期之後，九龍城與啟德機場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由於香港航空運輸日見頻繁，日軍決定擴建啟德機場以適應新形勢。他們準備興建兩條跑道，第一條與原先舊跑道的設計相若，另一條則與第一條幾乎成一直角。為進行擴建工程，原來的航空大樓被夷為平地，啟德濱及九龍城寨以南的民居，加上附近的二十條村落，如蒲崗、部分大磡、隔坑、馬頭涌及玟杯石等，全被剷平。亂世苟存，村民只好和淚揮別家園，既無賠償，也不容申訴，只此而已。

更令人悲憤填胸的，是日軍為求多取沙石，不惜拆去九龍城寨的石牆，還把宋王臺炸掉。這兩個古蹟，一被視為國恥待雪象徵的城寨，一被視為「聖山」的宋王臺，既含歷史意義，亦存民俗姿采，轉眼即成灰燼，痛心疾首之情，筆墨實難描於萬一。由 1942 年 8 月以還，九龍城驟然失去三個象徵意義非比尋常的地標，啟德濱、九龍城寨城牆和宋王臺，天地同怒，人物相愁，真正無奈之極。

啟德機場既是香港對外空運的主要基地，盟軍為了反擊日軍，那有不以全力打擊之理。於是由 1942 年 10 月開始，美國飛機不斷轟炸啟德機場及它的鄰近設施如紅磡的黃埔船塢等處。越到二次大戰後期，類似的轟炸就變得越頻密，而且也來得更加的猛烈，從 1942 年 10 月到 1945 年 6 月，美機前後共空襲了香港大約四十五次。

啟德機場民航事業的興辦

啟德機場於 1930 年建成之後，即時成了九龍城的地標，但一路發展下來，又成了香港的象徵，標誌 香港向世界敞開懷抱，更快更頻密地與國際接觸，更融和地與不同的民族交流。在整個的歷程中，當然亦同時引發出經濟的元素，令香港變得更繁榮與昌盛。

1930 年 12 月，啟德機場完成了飛往廣州的首次旅程，接著於 1936 年 3 月第一次迎來了帝國航空公司(Imperial Airways)「多拉多」號(Dorado)貨運航機，從此每周定期由香港前往檳城。同年 10 月，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ways)亦初航抵港，開闢了太平洋航線。11 月，中國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開始派機前往廣州及上海，到 1938 年，其航線已遍及河內、重慶和漢口等地。至日軍侵港之 1941 年，啟德機場已設有中國航空、法國航空、泛美航空、歐亞航空和帝國航空等五家公司的業務，航線擴展伸延至世界的各大商埠。

第二次大戰之後，香港航空事業發展得更快，自 1946 年開始，新公司不斷增加，來往內地的航線，有中國、中央、大華三大航空公司，航線直達上海、廣州、重慶、海口、廈門、青島、武漢及桂林等地。到 1947 年 6 月，全港共有大小中外航空公司約十四家，經營全球的航線。之後更不斷發展，成就了目前國際知名的空港。

由啟德機場推動的經濟活動

與航空客運發展的同時，香港的航空運輸業也大步向前，替香港的經濟事業創出了同樣驕人的成就。在 1997 年啟德機場遷離九龍城之前，香港空運服務業的出口額是三百四十億港元，佔全港服務業出口總額百份之十一點五。旅遊業的收益則為九百億，佔香港生產總值百份之八。另外由啟德機場處理的本港出口、轉口及進口貨品，以價值計算，分別約為百份之三十三、十五和二十二。

香港機場於 1998 年中遷離舊址之後，在全球的機場中，以國際載貨量而言排名第一，載客量則排名第五。簡單回顧啟德機場在香港經濟中的意義，由 1970 年代經濟騰飛起計，以每五年的數字作單位，直至遷離前的 1995 年，它的空運出口佔本地出口總額比例如下：

1975 是百份之二十四點二

1980 是百份之二十五點一

1985 是百份之二十六點一

1990 是百份之二十九

1995 是百份之三十二點六

佔本地轉口總額比例為：

1975 年是百份之三十四點八

1980 年是百份之二十七點四

1985 年是百份之十六點六

1990 年是百份之十六

1995 年是百份之十五點一

佔本地進口總額比例為：

1975 年是百份之十四點四

1980 年是百份之十八點六

1985 年是百份之十九點八

1990 年是百份之十九點六

1995 年是百份之二十二點一

如果撇除轉口數字，單以進出口而論，香港空運貿易佔進出口總額比例為：

1975 年是百份之十九點八

1980 年是百份之二十二

1985 年是百份之二十點八

1990 年是百份之二十點三

1995 年是百份之二十點二

從以上數字可知，啟德機場的航空貨運量在過去的二十年來，都佔本港進出口總額百份之二十以上，即以啟德一隅之地，它的進出口總額就佔了香港整體的五分之一以上，意義不能說不重大。

啟德機場的出現只能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如果不是啟德公司投資失利，如果不是 1920 年代中國政治形勢改變，驅使英國急於在香港建立一個空軍基地防衛自保，香港根本不可能有如此的一個機場，即使有也不可能在九

龍灣畔。因為有了啟德機場，日軍先發制人強攻守軍，之後又被盟軍連番轟炸；因為擴建啟德機場，日軍夷平啟德濱，拆掉九龍城寨城牆，毀去宋王臺；雖然如此，九龍城卻因而多了一個地標，香港鑄就了一個向世界開放的象徵，同時又提昇了全港的經濟價值。如此崎嶇坎坷的路途，裹藏在如此渺然難測的歷史偶然之內，恐怕只有天公才能解讀其中玄妙之意了。

第六章參考資料

檔案文獻資料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香港 長沙作戰》，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 年。
《香港 1997》，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97 年。

CO129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 Hong Kong, 1842-1951, Serial Nos. 413, 418, 498, 502, 508, 511, 514.

Despatch by Major-General C. W. Maltby on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from 8th to 25th December 1941, Supplement to *The London Gazette*, 27th January 1948.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16.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22-1927.

Hong Kong Dollar Direc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Dollar Directory Co., 1923-1925.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916.

The Chinese Commercial Directory 1930. Hong Kong: The Chinese Commercial Directory Co., 1930.

The Directory and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etc.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1912-1930.

其他史著

《香港商務店名錄》，香港：合眾廣告公司，1930 年。

王廣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 年。

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 年。

吳醒濂編：《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出版社，1937 年。

宋軒麟：《香港航空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3 年。

張安民等：《中國航空貨運：香港、上海、北京》，香港：匯智出版，2004 年。

張曉輝：《香港近代經濟史(1840-194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

鄭紫燦編：《香港商務交通錄》，香港：香港華商會，1915 年。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88 年。

Choa, G.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Davis, Mike. *Hong Kong Buses Vol. 2: The Kowloon Motor Bus Company (1933) Limited: From 1933*. Surrey: DTS Publishing, 1995.

Dunnaway, Cliff (ed.). *Wings over Hong Kong: An Aviation History 1891-1998*. Hong Kong: Pacific Century Publishers, 1998.

第七章 賞拾九龍城區的文教風韻

文化紐帶與歷史因素

九龍城區自南宋以來，就與中原文化開始了連綿不絕的關係，見證了宋帝在此建立海上行朝，及之後的自沉殉難，令人心魄搖動，不能自已。至晚清失去香港、九龍及新界等地，最後連九龍城寨寸土也為英人所侵奪，遺老北望，更加的愴然哀怨。即使不以遺老自居的熱血之士，目睹國土淪亡，恨恥刻骨，又豈能免於怒氣填膺，有淚如傾的苦境。

種種抑鬱哀愁，無可宣洩，最後都記之以長歌當哭的詩文。其中悼宋帝以憶忠臣，移情代入，自許為忠。另有則哀城寨以望天闕，自覺皇恩未報，愧對先帝，但時移勢易，力不能挽，只好臨風一哭，聊借詩文告罪於萬一。更有熱血盈腔，恨不拔刀而起，立決生死，也發而為但求山河可復，雖死無憾的豪言壯語。

以上直舒胸臆如決堤而出的詩文，再加上有關的竹枝詞，鐫刻的碑文、銘文等等都造成九龍城區的蔚然文風，甚有可供細味賞拾的價值。（相關的竹枝詞及碑、銘文可參看本書第四部分）更加珍貴的，是與此相關的並非盡是舊體詩文，也有現代語體的，令九龍城在文人筆下，既涵養傳統的韻味，亦散發現代的氣息，無法不令人刮目相看。

宋臺吟唱

以專集吟唱宋王臺，既憑吊山河，又感慨興亡的，現有 1917 年出版的《宋臺秋唱》和 1920 年代的《宋臺集》。若以各家散見於不同詩集有關香港的文字而論，大略超過一百三十家，共六百多首，而涉及九龍城風物的，約有五十首。（參看本書第四部分）

其中出現較早的是侯琚和鄧孕元的《官富懷古》，兩首都存錄於清嘉慶舒懋官《新安縣志》之內，僅稱兩位詩家為明朝人，具體生卒年不詳，內容除感嘆興亡之外，也對當時明知不可而捨身赴難的忠義之士，敬佩悼念不已。侯琚的詩是七絕：

草舍離宮一壘圯，夕陽高照舊碣州；許多忠魂歸何處？黃葉蘆花冷淡秋。

鄧孕元的卻是一首七律：

野岸維舟日已晡，故宮風色亂蘼蕪。

百年天地留殘運，半壁江山入戰圖。

鳥起荒臺驚夢醒，龍吟滄海覺愁孤。

豪華終古俱陳跡，剩有忠良說丈夫。

踏入晚清以後，這種感慨興亡的喟嘆，逐步為憤言怒語所替代，例如陳徵文，他曾經自光緒十八年（1892 年）起出任九龍巡檢司，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陞遷新會縣丞。他的詩《嗟九龍》就有以下的文字：

己亥歲仲春，租界許英關。嗟我九龍民，一朝隸異籍。……事雖小大殊，理豈中西別。胡為逞跋扈，喧賓奪主席。……寨城如斗大，畀我自守職。可憐雷池外，半步不能越。……一一託空言，無乃惡作劇。試繙萬國法，何有此程式。曩余司權務，六載此寄跡。宋王臺畔遊，俯仰感今昔。鼓棹鯉魚門，沈沙尋折戟。緬懷林文

忠，浩歌裂金石。……廟謨真廣大，淵默非易測。區區越句踐，猶足破讎敵。堂堂我大清，豈終為弱國。（全詩參看本書第四部分）

這首五古，文字不能算好，只是情真志實，令人讀出滿腔憤怨而已。

遺老之音

這時清朝還未覆亡，一旦沉淪，遺老之音便自然出來了。例如陳伯陶，他是廣東東莞人，光緒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的進士，殿試一甲三名探花，其後逐步陞遷，清亡之前出任廣東教育總會長，民國後避居香港九龍城。他的《宋行宮遺瓦歌並序》就有以下數句：

……淒涼故國哭杜鵑，零落舊巢悲海燕。手揩此瓦重摩挲，惆悵遺基淚如霰。……

如果這還不足以顯遺老之音，他的《登九龍城放歌》結尾數句就應該很清楚了：……回看直北是神州，墮地弓髯萬人哭。城邊野老長苦饑，我亦寓公歌式微。內蛇外蛇鬥未已，橫流滄海吾安歸。吁嗟乎，橫流滄海吾安歸。（上述兩詩參看本書第四部分）

另外類似的遺老還可舉賴際熙和何藻翔為例。賴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進士，授庶吉士入翰林院。滿清覆亡後僑居香港，受聘於香港大學為中文講師。他的《登宋王臺作》第二首的結尾有：……殘山今屬周原外，塊肉曾無趙氏遺。我亦當年謝皋羽，西臺慟哭只編詩。（全詩參看本書第四部分）

何藻翔與陳伯陶是同年，光緒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進士，曾經做過外務部主事，轉員外郎，充幫總辦。清朝亡後，在香港執教，曾任漢文師範、湘父學校及學海書樓等教席。他的《登宋王臺》結句說：……傷春吊古此登臺，興亡豈為昔人哀。金主墳荒成祆寺，楊侯廟破委蒿萊。登高四望非吾土，二王村有漁樵來。（全詩參看本書第四部分）

民族革命的呼號

除遺老之外，也有熱血革命之士，其中的詩文格調就變得很不同了。例如于右任，他是反清分子，鼓吹革命，言辭激烈，為清廷所緝拿，長期潛逃在外。民國之後，他歷任要職，如國民軍駐陝總司令、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監察院院長等。他的詩作《重逢劉小雲同遊九龍歸小雲以詩見贈因次原韻》：

盡日偕遊不計程，宋王臺下聽潮聲。憐余奔走身將老，話舊淒涼草已生。避世安能知避亂，談詩未罷轉談兵。歸來更荷瓊瑤贈，棄甲于思有淚橫。

又例如薛一鶚，他是讀經濟的，長期在金融界工作，曾任南京市銀行副經理，抗戰爆發之後暫居香港，他的《登九龍城》：

流人初上九龍城，莽莽蒼蒼百感生。

數畝荒畦栽白菜，一頭病豕睡涼棚。

問名猶是中華土，拱衛何須外國兵。

壘塊難銷辛丑恨，滿腔應貯海濤聲。

于右任和薛一鶚的詩作，雖同是以七律出之，可是其中拳拳在心的是關繫國家之情，而非一朝一姓興亡的感喟，格局自然有所不同。

連現代文名極大的郭沫若，於1937年在香港《大眾日報》也發表了五首五言絕詩。當時抗日之戰剛起，他心有所感的借宋王臺舒洩胸懷，其中第四及第五首如下：

寇焰愈猖狂，我情愈悲壯。縱使退蘭州，依然要抵抗。

遠望宋王臺，煙雲了不開。亡秦賴三戶，何用遽心灰。

史學大師陳寅恪寓居九龍城

史學大師陳寅恪(1890-1969)一家約於 1937 年歲末自廣西梧州乘內河輪船經虎門抵達香港。1938 年春節過後，陳氏必須趕回已遷校至雲南蒙自市的西南聯合大學上課，遂決定自己一人先行取道越南海防回雲南。陳寅恪夫人唐筼與三位女兒(陳流求、陳小彭及陳美延)搬至九龍城福佬村道。同年 7、8 月陳寅恪回香港探親。1939 年春，陳寅恪被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漢學教授。同年 8 月，陳氏在香港候船。適值歐戰爆發，地中海不能通航。同年九月，陳寅恪獨自回雲南。1940 年 7 月，陳寅恪再赴港等待赴英國之機，時陳氏一家已遷至九龍城英皇太子道三六九號三樓。1940 年 8 月，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聘陳寅恪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此後，陳寅恪在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先後開設 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 和 唐詩證史 三門課，向中文系師生展示了當時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嶄新領域。當時中文系學生，計有劉殿爵、金應熙、賴恬昌、徐家祥、李衍鎡、伍冬瓊、鄺象祖、董梅真、黃瑤等。陳寅恪在其主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原題為「唐代政治史略稿」，為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 1940-1941 年度上學期 唐史 課講稿)的手寫本序文末即署有「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1941 年 8 月 4 日，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許地山(1893-1941)逝世。同年 8 月 20 日，香港大學聘陳寅恪為中國文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同年 12 月 25 日香港為日本軍佔領而淪陷。12 月 28 日，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由「大日本軍民政部」接收，交由「大日本陸軍軍蒐集第四班」管理。陳寅恪堅持不與日人合作，遂困居九龍城英皇太子道寓所，直至 1942 年 5 月 5 日，始由香港取道海防返回內地。

現代文學中的九龍城

前面已經說過，涉及九龍城的文字，並不單是舊體詩文，語體式的新文學中，也屢有談及。其中最顯著的是新文學派別創造社成員葉靈鳳的著作。葉以特有的文學觸覺，書寫香港的種種事物與掌故，把枯燥的史料舊聞，變成生動可讀。以掌故而論，他的著作主要包括《香港的失落》、《殖民地舊聞》及《港島滄桑》等書。涉及九龍城區的部分，可見於《香港的失落》中的「九龍城寨的主權問題」，及《港島滄桑》中的「官富山與梅蔚山」、「官富場與官富山」、「宋王臺巨石的滄桑」、「港九的南宋史蹟」與「南宋二帝陵之謎」等篇章。

另一位新文學的健將穆時英也於 1938 年在《宇宙風》六十一期內發表了一篇「英帝國的前哨：香港」。這篇文章寫得十分有趣，像是披露香港秘聞，又像是文學創作的隨意揮灑，其中談到啟德機場與英國駐港空軍的事物，更充滿詭異的味道。

他提到香港的啟德機場，「設備很考究，可以停陸機，也可以停水機，而且日夜可以使用。」他認為啟德機場因為完全暴露於外，在防守上是一個致命的缺點，但奇怪的是機場上又看不到一架軍用飛機。接著他便給這個缺點找來答案。他說：「可是每天晚上總有四小隊以上的驅逐機轟炸機，在多雲的夜空下，在探照燈的青光裏翱翔著。『這些飛機從什麼地方起飛的呢？』——正是使日本的特務人員痛苦地皺起眉毛來的謎。」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繼續發揮想像力，把事情扯到九龍半島腹部的銀禧水塘去。他引用當地的農民說：「.....農民天天看見很多飛機從水塘底下飛出來。原來陸軍部的工程師把水塘下面的岩石挖空了，造成一座極端穩固的

格納庫（地下飛機庫）。據說在九龍半島上至少還有三處秘密飛機場。一個啟德飛機場附設的遠東航空學校的學生告訴我說，如果戰事發生，馬上會有三百架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型最新銳的第一線驅逐機出現在青空。」

研究過日軍侵港歷史的人都知道，當時英國駐港的空軍連十架也說不上，何來三百架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型最新型軍機。不要說沒有三百架，就算是他前面說的四小隊以上的軍機也沒有。因此閱看這篇文章的內容時，除了欣賞穆時英文學想像力的揮灑之外，其他是當不得真的。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小說家黃谷柳由 1948 年開始，出版了一本三冊的《蝦球傳》，即《春風秋雨》、《白雲珠海》及《山長水遠》，在《春風秋雨》中寫了一段相當感人而涉及九龍城的插曲。他描寫主角蝦球和牛仔，眺望獅子山以尋找中國的情節：

他們又往前走，走過土瓜灣，向九龍城方向走去。蝦球望著九龍城背後的那座獅子山，……蝦球道：「（這）是獅子山，我上去砍過柴。蘿蔔頭日本鬼在香港時，我爬山去過新界。再走不遠就是中國地了。」牛仔問：“你到過中國地界嗎？”蝦球道：“沒有，我到過沙田。再走不遠就是中國，我現在想回中國去。……”

蝦球尋找中國，也許正是當時或以後香港很多中國人的心聲，但在描述裏，中國好像就在眼前，卻其實離我們很遠。可是要到中國，第一件事似乎先應穿過獅子山，而獅子山正是香港的象徵。獅子山在九龍城的背後，從蝦球來說，要看獅子山最好在九龍城，要爬獅子山也最好由九龍城開始，之後就是中國地界了。此處既是最接近中國歷史動人心脈之源，亦是與它最纏扭不開的地方。其中的象徵意義可說是無窮的。

教育事業的回顧

九龍城教育事業的風貌，也是十分可觀的，前面第五章談過的龍津義學就是一個很特出的例子。可是在 1860 年及 1898 年以後，整個九龍城區已在英國管治之下，有關教育事業的發展自然無法越出它的教育政策範圍之外。

問題是香港的教育政策並不是由英國移植過來的，因為當時英國本身也沒有一套學制或教育體系可供參考。香港的教育體系其實是中英兩種文化互相觸碰，互相結合融和而來的。香港自 1840 年開埠至 1860 年這段時期，是這兩種文化開始接觸，互相探索的日子。所以當時的香港沒有所謂學校體系，但卻有三類不同的學校同時存在：中國傳統的私塾、西方教會開辦的學校和港府負責的官立學校。

到 1913 年，由於前兩年的辛亥革命，港府決定管制學校內的政治活動，因而制定了 1913 年的《教育法例》，這是大英帝國歷史上，第一次立法規限地方上的全部學校必須向政府登記的舉措。

香港這時期的教育現象，是幾種不同的教育模式一體並存，互不干涉，既有官立學校，也有教會學校和私塾。起了變化的反而是私塾，它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一是改良私塾，加進了部分的現代課程，另一是全無改動的傳統私塾。

踏入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香港的教育情況又略有變動，政府容許一些本地英國團體開辦種族分流的學校，專為英童而設的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幸好政府沒有徹底推行這個政策，大多數的教會和官立學校還是華人、歐亞混血人仕、葡萄牙及印度裔與歐籍學生一同上課，未被硬性分流入學。

官立和政府補助的教會學校，教學內容為英文、西方歷史及地理、數學和科學等科目，教學語言則以英語為主，僅輔以必修的中文和中國傳統典籍。此時與這些學校分庭抗禮的是新式的中文學校，它們採用的是國內模仿美國模式的四-二-三-三制，即四年初小，兩年高小，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

至於小學教育方面，到二次大戰之後的五十年代中期，發展達到高峰，以校舍而論，平均每十七天就有一座新校舍完成，每座校舍可以應付半日制的上、下午及夜校三所學校的需求。這種發展到 1960 年代末期終於趕上了

小學教育的需求。因此到了 1971 年，港府可以正式推行全民六歲至十二歲的義務教育政策。1970/1971 學年的小學生總數達到七十二萬人，若與 1947/48 年度的八萬人相比，增幅為九倍。由於小學教育的擴展，傳統私塾的教學形式終於被淘汰了。

以經費來源而論，香港學校可分為「官、津、補、私」四大類。官立學校直接由教育司署官員管理，經費是署內預算的一部分。津貼學校由政府津貼它每年支出的固定比率。補助學校則每年制定自己的預算，提交教育司署，學費收入和教會撥款不足之數，由政府補足。私立學校一如其名，政府完全不予資助，經費純由學費及私人捐贈等而來。自 1950 年代以來，學校發展的主流，逐漸走向津貼模式，最常見的是由政府策劃及建立校舍，然後交予志願團體以津貼形式辦學。

到 1977 年，港府正式宣佈由 1978/79 至 1981/82 學年，四年內逐步把免費教育從六至十二歲延長至十五歲，香港九年免費教育政策終於落實完成。亦同在 1981 年，一直佔先的私校學生人數，第一次落後於公費支持的學校。由 1976 年私校二十六萬比公費學校的八萬，變成 1981 年公費學校二十三萬比私校二十一萬的比率。

九龍城區的教育事業就是在以上的教育背景中開展的，到現在已有幼稚園及中小學二百多間。其中有不少名氣很大而歷史深遠的學校，這裏略舉數例以說明九龍城區在作育人材方面的貢獻。

由基督教會主持的資深中英文學校

以中文教學而又具備基督教會背景的，可以先舉培正中學為例。這間學校是廣州浸信會教友於 1889 年在廣州開辦的，初名培正書院，後於 1933 年以「私立廣州培正中學香港分校」之名義在香港辦學。到 1950 年，正式改名為香港培正中學至今。

另一間女子中學是香港培道中學。它是美南浸會女傳道聯會於 1888 年為廣州婦女開設的一所學校，到 1938 年因抗戰而遷到香港。戰後原本預備回遷廣州，最後決定在九龍城區於 1952 年自建新校辦學至今。

同樣有基督教會背景卻以英文教學的，九龍城區以拔萃男書院的歷史較長。它正式建校於 1869 年，當時的名字叫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是一間由政府補助的學校。建校之初，收生原本不分男女，而是兼容並蓄，但到了 1913 年，由於校內再無女學生，於是正名為拔萃男書院至今。

協恩中學是一間女子學校，由建於 1886 年的飛利女中和建於 1887 年的維多利亞女校合併而成，辦學歷史可以上溯至 1936 年，而學校經費模式是由政府補助的基督教中學。

英華書院在香港於 1914 年建校，雖然它原由倫敦傳道會的馬禮遜牧師於 1818 年首建於馬六甲。最初它在香港的校舍屢經遷移，由港島堅道、般含道，到 1927 年的旺角弼街，最後於 1962 年遷至現在的牛津道。

帶有天主教背景而又歷史相當的學校，區內可以瑪利諾修院學校和喇沙書院為代表。瑪利諾修院學校初建於 1925 年，校址在柯士甸道，到 1931 年先遷往太子道，後於 1937 年再遷往窩打老道與界限街交界的校舍，辦學至今。

喇沙書院正式建校於 1932 年，其後則屢歷坎坷。先是於 1939 年被香港政府徵用為拘留營，稍後又改為醫院。日軍佔港之時，校舍再變而為貯藏倉庫。二次大戰之後的 1947 年，又一次被陸軍當局徵用為軍用醫院。直到 1959 年，經過多年流徙之後，喇沙書院才在原址復校繼續辦學。

資深的私立和種族分流學校

以私立學校而論，區內以民生書院的歷史較長。早在 1916 年，當時曹善允博士就希望在九龍城中辦學。到 1920 年，區澤民（即區德，是啟德公司九龍灣填海計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及莫幹生，各捐一萬元助其建校的計劃。為了紀念這兩位善士，於是各取其姓名一字為校名，曰民生書院。民生書院於 1926 年正式辦學，逐漸發展，可惜到 1941 年日軍佔港期間，全校為日軍所佔用，校務只好停頓下來。二次大戰之後，日軍撤走，英軍又到，直至 1947 年中，學校才正式被交還。復校之後，民生書院向政府註冊成為一間非牟利的私立學校。到 1961 年開始，民生書院改為私立受助的學校類別，繼續辦學至今。

九龍城區內還有一間甚有特色的學校，那就是當時獨有的種族分流英童學校：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幸好當時政府並無徹底執行分流的教育政策，而且這是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所以這間學校的地位就變得頗為特殊了。佐治英皇五世學校正式建立於 1936 年，但它的小學部分早在 1894 年便開始運作。

最初的校名叫九龍英童書院(The Kowloon British College)，校址在金巴利道，後來政府於 1900 年同意在彌敦道撥地興建新校。新校的名字改為九龍英童學校(The Kowloon British School)。到 1923 年，由於它是全港只收歐籍學生入讀的學校，所以再正名為中央英童學校(The Central British School)。發展至 1930 年代，學生人數越來越多，為了解決擠逼的問題，學校終搬到九龍城區何文田現址。新學校啟用之年為 1936 年。

二次大戰之後的 1947 年，學校的收生政策大變，任何國籍的學生皆可入讀，於是又有更改名字的必要，這就是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名稱的來由。這間學校的類別一直是官立學校，所有教師都是公務員，與他們的待遇和福利一樣。1979 年之後，英皇佐治五世學校變成一間由政府補助的學校，也成為英基學校協會(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的一分子。

大學教育巡禮

除此之外，區內還有兩間大學，它們的出現都是政府於 1990 年代特為發展專上教育而來的結果。其中一間是由專上學院升格而成的香港浸會大學，另一間是由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升格而成的香港公開進修大學。

成立於 1956 年的香港浸會大學，原名為香港浸會書院。到 1972 年首先得到政府認可，改名為香港浸會學院。發展至 1979 年，它開始接受政府的經濟資助，而到 1984 年，政府為學院訂立的《香港浸會學院條例》正式生效，成為一間有法律效力的學府。之後到 1989 年，學院開始向政府徵詢升格為大學的意見。四年之後，浸會學院提出一系列有關學院條例的修改，為草擬《香港浸會大學條例》而鋪路。1994 年的 11 月，立法局三讀通過有關的修訂，學院的名稱正式改為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公開進修大學原名叫香港公開進修學院，成立於 1989 年，專門為在職人士提供學位程度的業餘進修課程。香港公開進修學院於 1997 年升格成為大學，最初校舍原在九龍城區外，於 1996 年遷往區內現址。大學的課程是以學分制度為基礎，由學生自由選讀，極富彈性，不論時地，讓他們逐漸積累學分，最後達到學位的要求。

九龍城區的教育事業，就像是整個香港教育事業的縮影。政府發展推行種種的教育政策，都在九龍城區不同程度的學校中得以反映，而且反映得更真切，因為區內一些教育機構，歷史深遠，名氣不少，足以綜觀其整個發展的過程，深刻地顯出了個中的強弱、適宜或偏差的地方。

第七章參考資料

文獻資料

郭沫若：詩五首 載《大眾日報》，1937年12月6日。

陳步墀：《宋臺集》香港：繡絲樓，出版年缺。

舒懋官：《新安縣志（清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香港：黃承業重刊本，1992年。

黃谷柳：《蝦球傳》第一部之 春風秋雨，香港：三聯書店，1958年。

葉靈鳳：《葉靈鳳文集第三卷：香港掌故》，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盧瑋鑾：《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至一九四一》，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

穆時英：英帝國的前哨：香港 載《宇宙風》61期，1938年2月21日。

蘇澤東：《宋臺秋唱》，香港：刊本，1917年。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30 years in Hong Kong 1967-1997*. Hong Kong: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s, 1997.

其他史著

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年。

馮錦榮：關於陳寅恪先生對年代學的認識 - - 兼論繆勒教授(Professor 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 1863-1930) 年代學的研究 - -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編：《21世紀世界與中國：當代中國發展熱點問題》，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黃嫣梨：《香港浸會大學校史》，香港：香港浸會大學，1996年。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weeting, Anthony Edward. *A Phoenix Transform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Post-War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weeting, Anthony Edwar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941-2001: Visions and Revi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Sweeting, Anthony Edwar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互聯網頁

英華書院：《英華歷史》，網址：<http://info.yingwa.edu.hk/history.php>，[瀏覽日期：2004年11月26日]。

香港公開大學：《歷史背景》，網址：
http://www.ouhk.edu.hk/WCM/?FUELAP_TEMPLATENAME=tcSingPage&ITEMID=CCPAUCONTENT_84612&lang=chi，[瀏覽日期：2004年11月26日]。

香港培正中學：《本校簡史》，網址：<http://www.puiching.edu.hk/>，[瀏覽日期：2004年11月13日]。

香港培道中學：《學校歷史》，網址：http://www.pooito.edu.hk/index_1.htm，[瀏覽日期：2004年11月27日]。

Diocesan Boys' School. *School Information: Origin.* Website:
<http://www.dbs.edu.hk/index.php?section=aboutdbs&sub=origin> Accessed date: 24 November 2004.

Heep Yunn School. *School History*. Website: <http://www.hys.edu.hk/> Accessed date: 21 November 2004.

La Salle College. *School History*. Website: <http://lasalle.school.net.hk/> Accessed date: 2 December 2004.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School History*. Website: http://www.mcs.edu.hk/mcs_homepage/aboutus/about2.htm
Accessed date: 24 November 2004.

Munsang College. *History of Munsang College*. Website: <http://munsang.edu.hk/secondary/info/history/history.php>
Accessed date: 24 November 2004.

第二部份

九龍城區名勝古蹟巡禮

1. 九龍司衙門與九龍寨城公園
2. 宋皇臺公園
3. 宗教建築
4. 軍事遺蹟
5. 特色民居
6. 其他

1. 九龍司衙門與九龍寨城公園

十九世紀末的九龍城寨，除城牆外，重要的建築物原有三座：龍津義學、大鵬協副將府及九龍巡檢司(或稱九龍司)衙門，可惜今天只有後者保存下來。

九龍巡檢司衙門的確實建築年代尚不清楚，不過估計為十九世紀中後期。衙門為傳統的三進式，大門兩旁建有樓高兩層的望樓，內進天階，兩旁再建耳房數間，供衛兵駐留。正中為衙門公堂，公堂後為另一天階，階後為守將官邸。二十世紀初，聖一堂把城寨內的三聖廟改為教堂，名天國救道堂，並租下九龍司衙門作老人院，名廣蔭院，今天衙門入口處門額上的ALMSHOUSE(即濟貧院之意)英文字樣，就是在這段時期刻上的。其後老人院轉交中華基督教聯會管理，1971年改作老人中心。至1991年，衙門一直為中華傳道會的恩光園所在地。除老人服務中心外，尚設有恩光幼稚園、城砦中心、兒童福利中心會及救世軍診所等福利機構。

自清官員於1899年遭英人逐走後，寨城附近一帶漸成民居。不過大量寮屋的出現，其實主要始自1920年代，這要拜當時九龍城的開發及附近道路建設之賜；此外，因內地多次變亂，亦令遷入城寨者日眾。城寨主權因屬中國，故一直以來港府沒法認真管理，致令衛生環境日差。原大鵬協水師副將府亦一度由居民自行改作防疫藥局。其後在英國殖民地部同意下，港府於1925年至1933年期間正式接管該藥局。當時港督司徒拔(或譯史塔士，Sir Reginald Stubbs)清楚申明，除作公共用途外，港府絕無意發展該幅地段之意。自1919年以來，港府多次通令城內居民遷徙，不過最後都因居民及中國外交部的反對而未能完滿解決問題，期間還為中英政府帶來外交磨擦。經過1936年的清拆後，城寨內只剩下九龍司衙門、龍津義學及民居一間。

1943年，日軍為擴建機場，把城寨部分城牆拆去，石塊用以建築環繞機場的大渠。拆去城牆後，城寨的界線也變得模糊。1945年戰爭結束後，原來的城寨居民陸續返回；另外，亦有大批內地移民湧入，密密麻麻的寮屋紛紛堆建在城寨內，多場的大火仍不能改變這一面貌。至1960年代，城寨人口已躍升至二萬多人，並成為各種不法活動的溫床，要到1970年代後期警方積極干預才有所收斂。1982年，城砦福利會作了一次人口和戶數抽樣調查統計，發現當時城寨人口已急升至四萬多人。

1987年初，港府宣佈遷拆城寨的屋宇，並計畫將該地闢建公園；城寨作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終於獲得解決。1993年，遷拆工程完成，從是年秋天至翌年夏天，考古發掘隨即展開，期間尋獲南門門額、部分城牆遺址及部分舊石板街道。公園於1996年底正式開放，這也是香港唯一的歷史園林公園。園內的[原城寨南門遺蹟](#)及[衙門](#)其後被宣佈為法定古蹟，成為九龍半島為數不多、受法例保護的歷史遺蹟。

2. 宋皇臺公園

1959年底，宋皇臺公園正式落成，這塊數百年來飽經風雨、更於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幾乎為

日軍所毀的巨石，終於得到一處安身之所。

宋王臺原位於馬頭角一處海濱小丘上，這座海拔只有一百一十四呎的「聖山」(該名字最早見於十九世紀英人所繪的地圖，中國古籍及紀錄中則未見記載)，傳說即為宋帝「石殿」之遺蹟，二次大戰以前，宋王臺一直被視為香港境內最重要的古蹟。根據前清探花陳伯陶的考據，因石刻稱「宋王」而非「宋皇」，元史以帝昀、帝昺為二王紀，故可斷定非刻於宋代，而是元代。「宋王臺」三字右旁還刻有「嘉慶丁卯年重修」七字，根據簡又文《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一文記述，石刻乃是由廣東水陸路提督錢夢虎命新安營遊擊林孫、新安縣知事李維瑜及官富巡檢胡宏昭等於嘉慶十二年(1807 年)重刻的，在此之前，估計宋王臺曾經多次修葺，可惜具體情況現已不可考。

至清末，宋王臺及其附近一帶已變得相當殘破，亦有居民在聖山採石。1898 年，時任定例局(立法局舊稱)議員的何啟在一批九龍居民的支持下，建議訂制律例，把宋王臺永久保留，禁止該地興建樓宇，以作日後考據古蹟之用。何啟這一建議，獲得護督布力少將(Major General Wilson Black)和議，翌年通過《保存宋王臺勝蹟條例》，並豎立碑誌，禁止採石。然而十七年後(1915 年)，工務局卻擬將宋王臺地段出售。這計劃為建築商人李瑞琴得知，即走告當時任教香港大學的另一名前清翰林賴際熙，並聯同港大校長伊里鸚爵士(Sir Charles Eliot)，籲請港督梅軒利爵士(Sir Henry May)收回成命。港府考慮後，同意保留宋王臺，不過範圍不能過廣，並劃定聖山界限。後李瑞琴更捐款修築石垣、牌坊、小亭，以便遊人登覽。何啟、李瑞琴及賴際熙等人的美意，可惜只能為宋王臺帶來短暫的安逸。

1943 年，香港踏入日治的第二年，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宋王臺一帶被劃入徵地範圍，聖山部分被毀，山上原刻有大字的巨石裂而為三，幸「宋王臺」及其旁七字完整如故，戰後得以關公園誌念。為表示尊重，港府更把原來的「王」字改作「皇」，並由簡又文撰寫《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立於園內。

二十世紀以前，除宋王臺外，該地還有一座晉國公主墓塚，以紀念帝昺的妹妹。墓塚原設於宋王臺西北不遠的小丘上，並建有一座大牌，後因興建聖三一堂而給湮沒。陳伯陶在 1917 年刊行的《宋臺秋唱》提及此墓塚「十年前碑址尚存，近因牧師築教堂於上，遺蹟湮沒矣。」

3. 宗教建築

上帝古廟

位於露明道公園內的上帝古廟，原建於歷史悠久的馬頭圍(舊稱古瑾圍)旁。根據近代學者的記載，廟內原刻有「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丙申仲冬吉旦重修古瑾圍信士某捐銀」字樣的石碑，可惜這塊石碑如廟內其他設置一

樣，已不復見。本廟原奉祀北帝，因又稱「北極玄天上帝」，故簡稱「上帝」。北帝相傳是商朝的一名王子。商朝末年，助玉帝討伐魔王，獲封為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具有消災化厄之神力，在珠江三角洲一帶各地均建有北帝廟。

據說本廟元代原是一座小廟，內置男女神像，狀如帝王與皇后，據說此即該村趙氏之祖。至清初，小廟只剩下基址柱石。乾隆年間，村民把廟基改建北帝廟。嘉慶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十八勝蹟略載「丁丑年（1277 年）四月，帝舟次於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石猶存。今土人將其址改建北帝廟。」至 1920 年代，隨 城市的擴展，馬頭圍被拆，本廟亦變成頽垣敗瓦，只剩下中門石基、石刻門聯及門額。至 1962 年，港府因應市民及學者的建議，把上帝古廟的遺址築成露明道公園，並邀得學者饒宗頤為公園撰「九龍古瑾圍上帝古廟遺址闢建公園記」石碑，詳述九龍的宋末史蹟。

舊何文田水月宮

九龍半島城市化以前，在何文田一處土名「大石鼓」（近今天亞皆老街和窩打老道交界處）的地方曾建有一座規模相當大的水月宮（觀音廟）。這座當地鄉民稱為「大石鼓廟」的水月宮原由芒（旺）角、何文田及其他附近的客籍鄉民倡建。廟宇曾於 1908 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重修，費用除由附近鄉民籌集外，一些油麻地的商戶亦大力支持有關工程。搬遷以前，該廟香火非常鼎盛，每年農曆二月十九日觀音誕均有「打醮」活動，並上演「神功戲」。至 1926 年，政府因開闢亞皆老街，廟宇被迫拆卸，並於次年在山東街現址重建。

土瓜灣天后廟

土瓜灣天后廟原位於土瓜灣村旁，該村早於 1819 年的《新安縣志》已有記載，是為數不多的九龍半島古村落之一。相對紅磡、九龍城等地而言，土瓜灣早年發展較慢，至 1920 年代才隨 市區的擴展而消失，同一時期拆卸的還有附近的馬頭圍、馬頭角和二王殿村等。

天后廟原由當地的客籍人士於 1885 年修建，並於三年後重修。廟宇屬南方典型建築，為三開間的兩進殿宇，兩旁有對稱的廂房，中間天井現已改建成拜殿，後進的屋脊則有魚尾形裝飾。廟宇現存刻於光緒十四年（1888 年）的門額，門聯為：「天恩廣布梯航穩，后澤覃敷海島寧。」廟內尚有光緒十一年（1885 年）鑄造銅鐘一口。除主祀天后外，廟內還配祀觀音、王母、龍母及列聖，神像下設有消災壇，祭祀無常和白虎。天后廟原位於海旁不遠處，面朝海心島，然而經過多次填海工程後，現在已成為內陸天后廟。天后廟現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直轄管理。

土瓜灣龍母廟與魚尾石

龍母相傳為秦時晉康（今廣東德慶縣）人，因豢養五龍，秦始皇曾派專使禮迎未果等傳說，為後人立廟紀念。龍母因本事非凡，能耕能織，能漁能牧，能醫能護，執仗護航，普濟蒼生，崇拜和信仰龍母因而成為一種民間習俗，影響更遍及珠江流域、港澳地區乃至海外華人地區。

土瓜灣海心島原設有「龍母」壇，往日參拜者以漁民和水上人居多。除善信外，海心廟從前還是九龍城區著名的旅遊勝地，島上的「魚尾石」更是有名的景緻。填海前小島對岸常設小艇，以接載遊客往返。1964 年，土

瓜灣進行填海工程，海心島自此與陸地相連，「龍母」壇亦被移至下鄉道天后廟旁續受善信的祭祀。此廟宇屬華人廟宇委員會直轄管理。

紅磡觀音廟

位於紅磡的觀音廟，是香港市區內規模最大的一座觀音廟。該廟原由附近「三約」（紅磡、鶴園和土瓜灣）的居民於 1873 年籌建，並於 1889 及 1910 年兩度重修。廟宇主祀觀音，配祀列聖及太歲。整座建築物共分三座：正座為觀音廟，左為「公所」（現用作中醫診所）；右為「書院」（現用作街坊會衛生部）。石刻門聯為：「座上蓮花，饒有西湖三月景；瓶中楊柳，分來南海一枝春」。廟宇的瓦脊、簷飾等均非常絢麗，反映了早年該區顯著的經濟發展。

一直以來，這座觀音廟香火非常鼎盛，二次大戰期間，由於附近設置船塢，該地遭受盟軍的空襲，然而觀音廟卻絲毫無損，因而被善信認為這是觀音顯靈之故，使廟宇更加聲名鵲起。每年農曆正月二十六日，俗傳「觀音開庫」，善信前往「借庫」，絡繹不絕，熱鬧非常。

紅磡北帝廟

北帝廟原位於今天青洲街東端與馬頭圍道交界的小丘上（當時稱為鶴園山）。廟宇建於 1876 年，與附近的觀音廟幾乎同期建成。1921 年政府因開闢道路，北帝廟被迫拆卸，神像暫置於譚公道。至 1929 年，在坊眾協助下，北帝廟得以在離原址不遠處的北拱街重建。

北帝廟屬二進式建築，正門後設有「擋中」，有擋煞的風水作用。門聯：「位鎮坎方聖本佑民而錫爵，權欽北極帝惟真德以居尊。」前進的屋脊上有魚尾形裝飾。北帝廟主祀玄天上帝，配祀觀音、華光、佛祖、太歲、門官、虎神、財帛星君。廟內尚存一口光緒十九年（1893 年）鑄造銅鐘；另還設一座小型玉虛宮。廟前供奉的土地壇，本位於機利士道，據說歷史超過一百年，1960 年因發展而遷至現址。

農曆三月初三，是北帝誕辰，有很多善男信女到北帝廟參拜。此廟宇屬華人廟宇委員會直轄管理。該廟宇又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三級歷史建築。

福德祠

福德其實就是人們常稱的土地公公，正式名稱是「福德正神」，客家人稱「伯公」或「福神」，是土地的守護神，也是華人最普遍拜祭的一種自然神祇。一般被稱為土地公，又稱為社稷、大王爺、大伯公、后土等。

紅磡寶其利街的福德古廟，與尖沙咀海防道的福德古廟並列為市區內最大的同類廟宇。古廟以鐵柱為牆，鋅鐵為瓦，髹上紅色。廟內有一副對聯：「福蔭街坊安康樂，德澤綿長慶昇平。」福德祠初建年代已不可考，不過可能早於香港開埠前已由當地鄉民設置。

二次大戰前，本廟廣受紅磡居民及黃埔船塢員工的供奉。戰後，黃埔地區進行發展，發展商曾要求搬遷廟宇，惟因街坊反對，福德祠得以保留。1944 年大戰期間，紅磡觀音廟旁的義學曾遭盟軍誤炸，造成大量學童死亡，其後親屬把殉難學生的骨灰安放至福德祠旁供奉，故福德祠亦具有公墓的性質。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紅磡三約潮僑友誼會在紅磡蕪湖街球場舉行福德寶誕，期間包括巡遊、潮劇神功戲、上香等祈福活動。

聖德肋撒堂

聖德肋撒堂是現今九龍城區歷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堂。該堂興建以前，九龍原只有尖沙咀的玫瑰堂。自 1920 年代初開始，隨著何文田和九龍塘區的開發，信奉天主教的葡裔居民數目日漸增加，加上其他居於九龍的信徒，教區和教友均認為有需要在當地興建教堂，成立一個新堂區以應需要。1924 年，一群中外教友更上書主教，承諾協助籌募建堂經費，並提議興建一間較大的聖堂，以免日後需要重建。不過由於計劃龐大，籌劃需時。1931 年 9 月，恩理覺主教與美安建築公司正式簽署建堂合約；建築師一職則由任教於北京輔仁大學建築系的基斯尼神父出任，再由美安建築公司的比利時籍建築師、對興建教堂經驗非常豐富的威力先生製成細圖。1932 年 12 月，恩主教為這座宏偉的聖德肋撒堂主持隆重的祝聖及開幕典禮。

聖三一堂

聖三一堂的歷史可追溯至 1890 年，為香港聖公會在九龍區最早建立的聖堂。當時西差會的宣教士開始在九龍城各鄉探訪及傳道，並在九龍城初設佈道所及在鶴佬村開辦研究班。後傳教工作漸漸擴展至土瓜灣、鶴園、紅磡一帶。1902 年，港府提供宋王臺一地段作建堂之用。次年，港府為遵守不侵犯宋王臺之約，收回地段，另給新址，並補償損失。剛建成的新堂因而被迫拆毀，再另行建堂於維多利亞女校側的一座小丘上(原址約為今天亞皆老街兒童遊樂場)。1905 年，新堂建成，由霍約瑟會督主持開幕典禮。至 1930 年代，港府再次要求取回堂址，於小丘下另給地段並資以款項重建。1938 年，第三座聖三一堂終於在現址建成，由何明華會督率同各堂牧師行獻堂禮，各處來賓，濟濟一堂，極一時之盛典。值得一提的是教堂明顯地呈現中國建築的特色，這很可能是受當時內地及香港教會推動的「自養、自傳、自治」風氣所影響。聖三一堂歷史雖然不算悠久，卻標誌著文化與宗教的一種結合。

伯特利神學院

伯特利神學院(初名伯特利聖經學院)原由基督教美以美會(衛理公會前身)宣教師胡遵理教士和女醫生石美玉女士於 1925 年在上海創辦。學院原設有神學院、中學、小學、護士學校、醫院、孤兒院、印務所和佈道隊。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孤兒院被迫轉移內陸，神學院則於次年遷至香港，一方面租用嘉林邊道四十五號之居址，另一方面購置其旁的四十七號地段繼續發展事工。1941 年 12 月，日軍攻佔香港，神學院無法繼續上課。次年，伯特利師生分批撤離香港至貴州畢節地區繼續事工。戰後，伯特利神學院遷回香港，並於 1947 年恢復上課。其後學院開辦免費平民小學，再於 1950 年開設中學。1995 年 [伯特利中學](#)遷入元朗新校舍，現院址內除[伯特利神學院](#)外，還設[伯特利幼稚園](#)、[幼兒園](#)和[遵理堂](#)。

4. 軍事遺蹟

防空洞

香港雖然到了 1941 年 12 月才直接捲入戰爭，然而早自廣州失陷後(1938 年 10 月)，香港其實一直都受到日軍的威脅。面對當時的形勢，港府及軍方自 1939 年起便積極備戰，除增建防禦工事外，還在港九人口稠密地區築起大量的防空洞。當時紅磡及土瓜灣因建了不少工業設施，故開戰前已成為華人在九龍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從 1940

年中至開戰為止，港府在大環山、鶴園山、漆咸道、馬頭角、宋王臺等地興建了一座座的防空洞，其中鶴園山和漆咸道的防空洞至今尚在。此外，由於當時紅磡集中了不少屬戰略設施的機構如卑利船廠、青洲英泥廠、鶴園發電廠、紅磡政府無線電站等，所有這些地點在開戰前均成為「國防範圍」和「警衛區」，外人一概不得擅自出入。

前亞皆老街及馬頭涌戰俘營

從日軍佔領廣州至 1941 年底戰爭爆發的三年間，礙於英日尚未宣戰，為遵循國際有關規定以避免日軍借故生事，港府對因逃避日軍追擊抵港的國軍作出拘留，並徵用位於亞皆老街(今香港眼科醫院一帶)的土地作拘留營之用。至戰爭爆發，這處被當時居民稱為「孤軍營」的特別集中營前後共拘留了約六百名與國民政府有關的軍事人員。香港淪陷後，該處繼續被日軍徵用為戰俘營，用以囚禁香港保衛戰中被俘的守軍軍官(大部分其他非軍官戰俘則囚於深水及北角的戰俘營)。另一方面，被俘的印籍守軍則囚於離亞皆老街營不遠的馬頭涌戰俘營(今馬頭圍一帶)。由於日人希望利用印籍軍人的反英情緒以供其驅使，大部分印籍戰俘在日治期間均被釋放。至大戰結束時，馬頭涌戰俘營只剩下三名印籍軍人。從戰後直至 1980 年代，亞皆老街營先後被徵用為英軍軍營及越南難民營。1992 年，香港眼科醫院在上址建成。

紅磡炮台與九龍船塢炮台

開埠三十年後，香港漸次發展成為華南的主要轉口港，為防範其他歐洲列強威脅，英軍自 1870 年代起即在維多利亞港兩旁修建炮台以防止列強佔領香港。由於當時英國尚未租借界限街以北的「新界」，紅磡遂成為海港防禦的重要地區。從 1878 至 1880 年起，英軍先在黃埔船塢的南端興建了一座「九龍船塢炮台」(置三門 9 吋口徑前膛炮)保衛港口，後於 1890 年代初在大環山上建成另一座「九龍炮台」(置一門先進的 9.2 吋後膛炮)以攻擊從鯉魚門入侵的敵艦。不過隨「新界」於 1898 年租借給英國，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九龍東部的海港防禦重點轉移到地理位置更佳的魔鬼山上。紅磡的炮台自此棄用。1988 年興建黃埔花園百合苑期間，工人在建築地盤內發現一門於 1872 年鑄造的 9 吋前膛炮，大炮的碑記雖說明該炮來自在黃埔船塢維修的一艘英艦，惟從其出土地點及大炮的型號來看，該炮屬「九龍船塢炮台」的可能性更高。若以上推斷屬實，該地附近或許仍埋有同炮台的另外兩門大炮。

5. 特色民居

九龍城各分區的發展先後有別，區內建築物的面貌自然十分多樣化，從花園洋房到舊式「唐樓」；從戰後初期的平房、徙置大廈到最新型的公共房屋，應有盡有，其中部分至今尚在。

戰前「洋房」

九龍塘「城市花園」建成之初，整體環境都洋溢著英國的鄉村風味，甚至連區內街道亦取自英國地區的名字。區內建築物大都為兩層的獨立平房，每戶均附有花園，又設有英式的學校及會所，以香港的標準來說，環境稱得上異常優美。經過大半個世紀的發展和戰火的洗禮，九龍塘至今仍能保持早年的一些風貌，多幢建於 1920 年

代的「花園洋房」至今尚在。除九龍塘外，亞皆老街、太子道、嘉林邊道、聯合道等亦留下一些戰前洋房，可供市民細味。

戰前「唐樓」

港府未大量興建公共房屋以前，除寮屋居民外，幾乎所有港人都是舊式「唐樓」的住戶。這些公寓式的「唐樓」一般都是三至五層高，建造在寬 4 至 4.5 米、長 12 至 13.5 米的狹長地段上，一層的住客人數可高達數十。不論從衛生以致社會的角度看，這些「唐樓」大部分雖然沒有什麼優點可言，不過卻是香港社會發展重要的風貌。由於九龍城區位處啟德機場附近，發展步伐較慢，直到今天，區內仍留下一些戰前「唐樓」。它們大部分都是 1936 年建築條例修改前已建成，樓齡七十年以上，成了活生生的「房屋博物館」。

平房區

二次大戰以後，由於大量難民及移民從內地抵港，帶來了重大的社會問題，其中尤以住屋為甚。出於實際需要，自 1951 年開始，港府在很多市區外圍的地區，批准一些志願或宗教團體興建了大量的「平房區」以安置這些人口。其中何文田成為九龍主要的平房集中地。計劃中政府只負責撥出及平整土地，有關的建築費用則全有志願或宗教團體負擔。早至 1959 年，何文田一帶便建有文華村、保民村、治民村、何文田新村、迦密村和信望村等平房區，總人口約二萬七千多人。從 1960 年代初至 1972 年，港府開始發展何文田並擴建道路，這些平房區在不到十年間便消失盡殆了。

公共房屋

自 1950 年代初起，除平房區外，港府亦透過志願團體如香港房屋協會，以及半獨立的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等，興建不同型式的廉租大廈以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1953 年石硤尾寮屋區大火後，政府乘時推出徙置政策，大量興建徙置大廈，以安置因天災又或政府收地而失去家園的寮屋居民。到了 1960 年代初，港府亦開展廉租屋計劃，為中下階層提供住所。所有這些早期的公共房屋，都可在九龍城區找到。值得一提的是早年紅磡區黃埔船塢及青洲英泥廠等工業機構，為吸引工人就業，往往向房屋協會租賃其轄下的屋 單位，以作工人宿舍之用。

以下為 1980 年以前於九龍城區落成的公共屋：

徙置事務處轄下屋：	首座落成年份
紅磡（大環山）	1956
何文田	1972
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轄下屋	首座落成年份
馬頭圍	1962
山谷道	1964
房屋(司)署轄下屋 *	首座落成年份
愛民	1974

*房屋司署於 1973 年由徙置事務處及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合併而成

香港房屋協會轄下屋	首座落成年份
紅磡 (馬頭圍道)#	1955
真善美	1965
樂民新 (初稱靠背壟道)	1970
#重建後改稱家維	

6. 其他

舊馬頭角牛房

1907 年建成的馬頭角牛房，九十多年來一直被用作牛畜檢疫站兼屠房。1999 年，屠房遷至上水，政府其後把建築群批予藝術工作者使用，後者把該地取名「牛棚藝術村」。由紅磚建成的馬頭角牛房，很有西方二十世紀初的市集特色，是香港僅存的此類歷史建築群，現已被古物古蹟辦事處列為三級歷史建築。

九龍塘三角花園

位於雅息士道及金巴倫道交界的三角花園，外牆上鑲嵌了一個 1922 年的石碑，紀念八十多年前倡議九龍塘花園城市計劃的義德(C. Montague Ede)。義德自 1913 年起至逝世為止，出任立法局議員凡十二年之久，並創辦「九龍塘及新界建築公司」(The Kowloon Tong and New Territories Development Company)發展九龍塘，可惜在他逝世(1925 年)不久，計劃即因多種原因停滯不前。一些已集資置業的人士為謀求保障他們的權利，在該年成立維持會，就是今天九龍塘會成立的因由。1929 年，公司被逼清盤，發展計劃最後由政府提供財務支援後才於次年完成。除石碑外，九龍塘北部亦有一條義德道，紀念這位時不我予的發展商。

九龍醫院

1960 年代以前，位於亞皆老街的九龍醫院是九龍設備最完善的醫院。醫院建於 1925 年，至 1935 年增設街症部，並建有候診室、診症室、眼科室、手術室、儀器室、消毒房、藥房及性病病房等。1938 年，醫院的手術室裝設了冷氣，更顯出了這間醫院先進的地位。戰後該院曾多次擴建，到了今天，歷史最悠久的 A 至 C 座仍在，惟 D 至 F 座及部分職工宿舍已拆掉重建。

中華電力公司總部大樓

中華電力公司總部大樓於 1940 年建成於亞皆老街。在此之前，電力公司的職員均在不同的辦事處和電力分站工作，總部的落成使公司可以集中處理本身的業務。大樓建成時，其實香港已經受到戰爭的威脅，該年歐籍婦孺更開始撤離香港，不過這卻反映當時電力公司管理層與香港共同進退的決心。次年 12 月，戰爭爆發，由於大樓為當地設施最佳的建築物，故在香港保衛戰期間，一支日軍部隊曾徵用大樓作指揮部之用。戰後至今，中華電力公司的總部仍在大樓之內。

石礦場遺址

早在開埠以前，九龍一帶已出產優質的花崗石。1894 年出版的《香港雜記》即指出「九龍山勢不高，草木不秀，地原礪瘠，惟石之產甚佳」這一事實。根據 1871 年的一份政府報告，英屬九龍當時共有八十一座石礦場，數目比整個港島的還要多。這些石礦場不少都位於大環山、土瓜灣乃至宋王臺一帶，其中部分更一直開採至二次大戰以後。到了今天，這些石礦場大部分已消失，惟在高山劇場旁，礦場的痕跡仍清楚可見；附近的石塘街更以名字去紀念這種對香港早期貢獻至大的產業。

參考資料

文獻資料

陳鐔勳：《香港雜記》，香港：中華印務總局，1894 年。
陳鐔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兩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年。
舒懋官：《新安縣志〔清嘉慶二十四年〔公元 1819 年〕〕》，香港：黃承業重刊本，1992 年。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Hong Kong: Noronha & C., Government Printers, 1932.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1954-1960.

其他史著

方國榮、陳：《昨日的家園》，香港：三聯書店，1993 年。
邢福增：《願 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 年。
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 年。
香港工商業彙報編：《香港建造業百年史》，香港：出版者缺，出版年缺。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史研究所學會編：《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 79 年(1990) 年。
梁美儀：《家：香港公屋四十五年》，香港：香港房屋委員會，1999 年。
陳祖澤、梁培藻編：《九龍樂善堂特刊》重刊本，香港：九龍樂善堂，1986 年。
陳瑞璋：《認識中國傳統節日和風俗》，香港：萬里書店，2001 年。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增訂版)，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6 年。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88 年。
黎晉偉主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 年。
蕭國健：《香港前代社會》，香港：中華書局，1990 年。
蕭國健：《關城與炮台》，香港：香港市政局，1997 年。
蕭國健、沈思：《香港市區文化之旅》，香港：萬里書店，2001 年。
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香港：三聯書店，1992 年。
簡又文：《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 年。
羅香林：《1842 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國學社，1959 年。
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 年。
Cameron, Nigel. *Power: The Story of China Light.*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Eitel, E.J..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5, 1983.
Empson, Hal.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1992.
Hayes, Jam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Archon Books, 1977.
Hutcheon, Robin. *High-rise Society: The First 50 Years of th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Rollo, Dennis. *The Guns and Gunner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unners' Roll of Hong Kong, 1992.
Smith, Carl.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5.
Ticozzi, Sergio.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Diocesan Archives, 1997.
Wesley-Smith, Peter. *Unequal Treaty 1898-1997.*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第三部份

九龍城區傳統習俗

1. 觀音開庫
2. 天后寶誕
3. 福德寶誕
4. 紅磡街市觀音誕花炮會
5. 盂蘭節

1. 觀音開庫

傳說每年正月廿六子時至亥時，是觀音大開金庫，借錢於民，助民致富的時刻。

這一夜，逾萬的市民湧到紅磡觀音廟，按照傳統習俗入廟祈福，向觀音借取財富和祈求財運亨通。

至於借多少錢，以及納多少息，則由求借者在觀音面前許願。觀音借庫是有一定方法的，首先準備觀音衣、香燭各一份；壽金和利是封五個。當一切準備妥當後，先上香燭，然後心中祈求。最後連同利是四封及衣紙一同火化。當衣紙火化後，添香油給廟祝，並索取一支財星令牌和一些福品。然後抽取借庫的「銀碼」，這些「銀碼」面額由最低的三百萬至最高的三億八千萬元不等。由於「借庫」者眾，紅磡觀音廟每年均需準備二至三萬張「銀碼」供善信「借庫」使用。

基於民間「有借有還」的觀念也適用於人神的溝通上，所以本年借庫，便應次年「還庫」，還庫過程很簡單，程序跟借庫類同，包括上香、化寶及敲鑼等。習慣上，向觀音「借錢」，一般都是當年借而次年還的。

每年觀音開庫，紅磡觀音廟都隆重之舉行，整個期間的人流晝夜川流不息，極為熱鬧。

2. 天后寶誕

九龍寨城天后古廟始建於清道光廿五年（1845 年），原為城內關帝廟遺址，原廟為兩進三間的建築，前有拜亭與廟相連。有門額「天后古廟」石刻，木聯「水德配天，香島慈航普濟，母儀稱后，龍城廟宇重光。」政府在 1987 年宣佈清拆九龍寨城，天后古廟亦列入清拆行列。

九龍寨城天后古廟原為九龍城潮籍人士的信仰中心。天后古廟拆遷後，九龍城街坊仍於每年農曆三月廿三日天后誕舉辦慶典。除設置神壇供街坊參拜和祈福外，並在亞皆老街遊樂場建棚籌演神功戲一連五天，分別上演潮劇和粵劇。

3. 福德寶誕

福德，即常見的土地公公，有消災化厄之神力，為土地的守護神，正式名稱是「福德正神」。土地神是華人最普遍拜祭的一種自然神祇。一般被稱為土地公，又稱為社稷、大王爺、大伯公、后土等。

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為福德寶誕辰，善信皆虔誠敬拜，祈求闔境平安。由於紅磡福德祠位於馬路旁，為避免引起交通不便，紅磡三約潮僑友誼會每年均在紅磡蕪湖街球場舉行為期三日兩夜的福德寶誕供奉儀式，期間並舉行巡遊藉以祈求福德保佑區內各人各處；此外，籌辦者還在神壇前搭建戲台，以潮劇神功戲慶祝神誕，酬謝功德。

4. 紅磡街市觀音誕花炮會

香港經歷了二次大戰的苦難後，供奉觀音娘娘的善信日漸增加。紅磡街市觀音誕花炮會要算是市區最有規模的同類組織。最初，花炮會是由街市的肉食檔戶發起，其後逐漸擴展至其他檔戶。街市商販及其家庭成員漸漸成為花炮會的核心成員。

每年觀音誕，紅磡街市觀音誕花炮會均組織巡遊、上香及舞獅等儀式和活動。除了保佑紅磡居民及社區平安外，這些活動亦促進當地社區的團結。隨 街市的遷移，花炮會規模雖然不及從前，它卻仍是香港少數以街市商販成員為中心的傳統宗教社團組織。

5. 盂蘭節

農曆七月十五日是盂蘭節又稱中元節和鬼節。「盂蘭」譯自梵語，原意為「救倒懸」，是來自民間「目連救母」的故事。佛教和道教的信眾都在這一天供奉先人和祭拜孤魂野鬼。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盂蘭節在香港非常盛行，主要原因是二次大戰後，不少海、陸豐和潮州人遷徙至香港，並把流行於家鄉的盂蘭節帶來，使原來在香港不太流行的盂蘭節發展至一個新階段。該節在九龍城、紅磡等鶴佬和潮州人士聚居的社區內特別盛行。

紅磡三約潮僑孟蘭友誼會每年均在節慶期間在紅磡舉辦大型的盂蘭勝會，並邀請潮州戲班演出神功戲，把功德給予先人的靈魂。會場內除設置神壇和戲壇外，亦置「大士台」，供奉巨大的「大士王」(又稱「鬼王」)，以看管小鬼及在焚燒祭品時維持陰界秩序。

每年盂蘭節期間，孟蘭友誼會都會派發「平安米」，意為替先人消災解難。

第三部分參考資料

文獻史著

白鶴鳴：《祈福習俗小錦囊》，香港：聚賢館，1996年。

陳守仁：《神功戲在香港：劇，潮劇及福佬劇》，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

陳瑞璋：《認識中國傳統節日和風俗》，香港：萬里書店，2001年。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香港：三聯書店，2000年。

魯金：《香港廟趣》，香港：次文化堂，1992年。

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陳偉波，2005年4月2日。訪問者：葉俊文、周家建，檔號：KC/CWB-01。

劉建海，2005年4月14日。訪問者：周家建，檔號：KC/LKH-01。

互聯網頁

成報 Sing Pao Daily News：《觀音廟開庫最高借 3.8 億：紅磡最熱鬧，料有兩萬人》，網址：<http://www.singpao.com/20050306/local/683215.html>，[瀏覽日期：2005年3月11日]。

第四部份

九龍城區的

民俗詩詞與相關文字

第一部份：詩詞韻文

第二部份：碑銘文字

第一部份：詩詞韻文

九龍城區是宋帝建立海上行朝之地，其後更自沉殉難，至晚清失去香港、九龍及新界等地，遺老北望，不免愴然哀怨。即使不以遺老自居的熱血之士，目睹國土淪亡，亦難免怒氣填膺，無法自己。因此相關的詩詞韻文數量特多，只是篇幅所限，不能不選擇刊出，被逼割愛，實非所願。

選入之詩詞韻文，除參考了各家的詩作結集之外，還參照了以下各書：

陳步墀《宋臺集》

蘇澤東《宋臺秋唱》

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詩詠香港》

胡從經《歷史的聲音：歷代詩人詠香港》

蔣英豪《近代詩人詠香港》

侯琚：廣東新安縣人，清嘉慶舒懋官、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十九〈人物志 隱逸〉的侯琚小傳，僅說他是明朝人，生卒年則不詳。

官富懷古

草舍離宮一壟圯，夕陽高照舊碣州；
許多忠魄歸何處？黃葉蘆花冷淡秋。

鄧孕元：明朝廣東新安縣人，生卒年不詳，詩作輯自清嘉慶舒懋官、王崇熙《新安縣志》。

官富懷古

野岸維舟日已晡，故宮風色亂蘼蕪。
百年天地留殘運，半壁江山入戰圖。
鳥起荒臺驚夢短，龍吟滄海覺愁孤。
豪華終古俱陳跡，剩有忠良說丈夫。

陳徵文：江蘇吳縣人，光緒十八年（1892）出任九龍巡檢司，著有《木蘭館詩鈔》。

嗟九龍

己亥歲仲春，租界許英關。嗟我九龍民，一朝隸異籍。我觀閭里屋，計錢賃旅客。歸我操縱權，還我管鑰責。我子暨我弟，悉秉我繩尺。一草與一木，我栽復我伐。事雖小大殊，理豈中西別。胡為逞跋扈，喧賓奪主席。易置我市廛，紊亂我阡陌。言利析秋毫，造律重鍰罰。設官治氓庶，新令布烜赫。水陸張軍威，詎止鴻溝畫。寨城如斗大，畀我自守職。可憐雷池外，半步不能越。豈不定租期，悠悠百載隔。

豈不議租值，細比蠅頭覓。一一託空言，無乃惡作劇。試繙萬國法，何有此程式。曩余司權務，六載此寄跡。宋王臺畔遊，俯仰感今昔。鼓棹鯉魚門，沈沙尋折戟。緬懷林文忠，浩歌裂金石。巉巖虎頭巖，陡立疑絕壁。五里上峰巔，手撥白雲積。其陰趨沙田，塗澤殊險僻。循州與寶安，行李可通達。其陽雉堞雄，協戎列戍卒。雖非金湯固，勢可障百粵。極目太平山，潑翠飛嵐色。下為香港地，商賈紛絡繹。回憶前卅年，已畏軒榻側。今茲藩籬撤，竟逼我內宅。哀哉中東役，我師屢敗績。和議輸鉅貲，司農告匱謁。海軍雖再整，奏效非旦夕。馬步饒精兵，地廣難遍歷。未聞倫敦主，篤好偶助力。乃合諸強鄰，乘間割疆域。朝廷重邦交，相見貴玉帛。廟謨真廣大，淵默非易測。區區越句踐，猶足破讎敵。堂堂我大清，豈終為弱國。

左秉隆：生於 1850 年，卒於 1924 年，漢軍正黃旗人，駐防廣州，曾任駐英使館的翻譯官(1878)及新加坡正領使官(1881)等外交職務，1916 年移居九龍，著有《勤勉堂詩鈔》。

遊九龍城

今代九龍地，宋時官富場。
我來尋勝蹟，亮節憶侯王。
廟古依鵝嶺，城堅負鶴崗。
登高一以眺，海口集番航。

吳道鎔：生於 1852 年，卒於 1936 年，原籍浙江會稽、寄籍廣東番禺人。光緒六年(1880)庚辰科進士，清亡之後以遺老自居，常往來於香港、廣州、澳門之間，著有《澹庵詩存》。

癸丑秋日偕九龍真逸張闇公伍登公賴智公 遊龍山訪宋季遺蹟感賦

宋王臺

中興成旅苦經營，憑弔荒臺淚漫傾。
百萬義師齊捲甲，傷心尚有庾蘭成。

陳伯陶：生於 1855 年，卒於 1930 年，廣東東莞人。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進士，以一甲三名探花入翰林院。清亡之後，避居香港九龍城，著有《瓜廬詩牘 文牘》。

宋行宮遺瓦歌 並序

官富場宋皇臺之東有村名二王殿，景炎行宮舊基地，新安縣志稱土人因其址建北帝廟即此，今廟後石礎猶存。其地耕人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堅如石，雖稍麤朴，然頗經久。考景炎自福州航海後，由泉而潮，而惠，顛沛至極。至二年二月，次廣之藍蔚山；四月，進次官富場。其時，張 孫復廣州；文天祥、趙時賞等由梅州分復吉贛諸縣，進圍贛州；張世傑討蒲壽庚，陳瓚應之，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亦謀殺王積翁以應世傑。兵勢頗振，故景炎得於其間繕治宮室，為久駐計。其後諸路皆潰，敵氛漸逼，遂敗走秀山、井澳間，至祥興之世，崖山不守，而宋亡矣。余獲其一瓦，因作歌以紀之。

官富場前宋行殿，荒村廢址青蕪。野人耕地得遺瓦，赭黝相兼餘碎片。赭如烈士歎赤血，黝似侍臣森鐵面。當時燔埴善陶甄，卻比範銅經冶鍊。憶昔南遷景炎帝，御舟次此誇形便。紹興家法遵簡約，崇政殿基亟營繕。槐樹陰成鴟尾出，茅茨易盡魚鱗見。但令風雨免漂搖，詎與雲霞爭藻綯。丞相忠肝泣上表，將軍鐵膽怒張拳。詔稱南海馬牛風，誓入中原龍虎戰。建炎中興運豈再，景德孤注事俄變。渡江泥馬不復神，赴海白鷗誰更唁。可憐宮瓦碎慈元，遑問故都杭與汴。君不見，漢代鴛鴦裁作枕，魏家銅雀鑄為硯。延年益壽辨當文，萬歲千秋感奔電。淒涼故國哭杜鵑，零落舊巢悲海燕。手揩此瓦重摩挲，惆悵遺基淚如霰。

登九龍城放歌 九龍砦，土人呼之曰城。

鯉魚風緊鮫人泣，鯉魚門開巨鯨入。飛雲蓋海駕轟濤，直拍九龍城下濕。九龍之山高插天，九龍城與山鉤連。龍頭龍嵴列戰格，下瞰激碧環深淵。清時置戍防海賊，海賊未平夷患亟。已悲堠卒化蟲沙，復見疆臣棄雞肋。石城何盤盤，憑眺慘我魂。千山鱗甲忽破碎，玄黃血濺群龍奔。迢迢南望銜艫舳，左走東瀛右西竺。回看直北是神州，墮地弓髯萬人哭。城邊野老長苦饑，我亦寓公歌式微。內蛇外蛇鬥未已，橫流滄海吾安歸。吁嗟乎，橫流滄海吾安歸。

尹燿：生於 1857 年，卒於 1930 年，廣東順德人。光緒年間畢業於廣東講武學堂，為近代著名文社南社社員。

秋日登宋臺

（臺在香港隔岸九龍城之陽高之巔，汲水門東佛堂門西）

群峰到海起衝霄，仗劍橫看山氣驕。
秋雨蕭疏臺畔路，寒濤嗚咽海門潮。
號風萬木何悲壯，照水孤花未寂寥。
宋室河山空已矣，千春荒島付漁樵。

汪兆鏞：生於 1861 年，卒於 1936 年，廣東番禺人。清亡之後，避住澳門，以遺老自居，著有《微尚齋詩》、《澳門雜詩》、《雨屋深燈詞》等。

壬戌六月蘇選樓屬題宋臺圖詠三首（選一）

八表同昏又一時，秋風黯澹二王祠。
避秦人誦桃源記，誰識滄桑異代悲。

賴際熙：生於 1865 年，卒於 1937 年，廣東增城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進士，曾任國史館總纂。清亡之後，僑寓香港，香港大學聘為中文講師，著有《荔垞文存》。

登宋王臺作

九州何更有埏垓，小絕朝廷此地開。

六璽螭龍潛海曲，百官牆壁倚山隈。
難憑天塹限胡越，為訪遺碑剔草萊。
宋道景炎明紹武，皇輿先後總南來。

登臨遠在水之湄，豈獨興亡異代悲。
大地已隨滄海盡，怒濤猶挾故宮移。
殘山今屬周原外，塊肉曾無趙氏遺。
我亦當年謝皋羽，西臺慟哭只編詩。

劉伯端：生於 1865 年，卒於 1963 年，原籍福建上杭、寄籍廣東番禺人。1913 年移居香港，日治時期避居廣西，二戰之後重返香港，著有《心影詞》、《滄海樓詞》等。

浣溪沙 宋王臺懷古

墜璽崖門事可哀，鯉魚吹起浪千堆。不堪故國首重回。
世換紅桑留片石，魂歸望帝憶荒臺。多情弔古且呼杯。

何藻翔：生於 1865 年，卒於 1930 年，廣東順德人。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進士，民國之後，棄官南歸，並於 1920 年赴香港執教，著有《鄒崖先生詩集》。

登宋皇臺

宋皇臺上嵯峨石，斷瓦零磚不可識。
一坏猶是漢江山，三字空留元筆跡。
回憶六龍南幸時，江潮失守更移師。
甲子浪高飄海艦，零丁洋渡懷孤兒。
官富鹽場一荒島，蒼黃猶稱行在所。
入幕參軍趙玉淵，毀家輸餉馬南寶。
小朝廷寄蛟螭窟，築臺瞭敵臨溟渤。
龍湫淘恨銷秋煙，鶴嶺招魂弔寒月。
傷春弔古此登臺，興亡豈為昔人哀。
金主墳荒成祆寺，楊侯廟破委蒿萊。
登高四望非吾土，二王村有漁樵來。

楊其光：生於同治初年(同治始於 1862 年)，卒年不詳，廣東番禺人，著有《花笑樓詞》。

丁巳春暮遊宋王臺

官富場荒王氣盡，海濱一石尚嵯峨。
留將遺址知華夏，利有寒濤咽暮朝。
臣自無能淪宋祚，天何曾醉絕中朝。

感今我更同懷古，夢欲隨魂未肯銷。

誰從行殿溯慈元，蒲日來遊樹色昏。
餘恨百年沉瘴海，傷心一樣弔崖門。
侯王廟近猶傳祀，聖女碑湮不可捫。
笑對斜陽問樵牧，幾人題句與臺存。

胡漢民：生於 1879 年，卒於 1936 年，廣東番禺人。1905 年開始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民國成立以後，歷任國民黨及國民政府要職，曾任立法院院長，著有《不匱室詩鈔》。

鶴亭海濱遊宋王臺有詩三疊杜韻和之

山河歷歷風景殊，新亭泣客心鬱紆。天下尚有乾淨土，帝子亡命來江湖。變夷用夏自有道，造化於此窮錘爐。古時避狄始亶父，悉索皮幣玉與珠。無君何患患無眾，如市之眾從之俱。以奠周基服萬國，故嘗走馬同瞻烏。方宋盛日講歲幣，積弱召侮無時無。老姦有堂半閑耳，丞相仆地顛不扶。臨安降表中夜出，高亭敗將無人誅。天驕狂虜莫敢抗，蠶食已盡中邊腴。僅餘趙氏一塊肉，太后不禁祈天呼。相傳竄走到此岸，石為屏蓋剛完軀。樹枯崖死臺不滅，歌風試馬羞雄圖。難得宋史與徵信，要為漢族哀遺孤。黃農虞夏孰云沒，後有繼者翼以于。¹昭王茅屋楚三戶，君歸好語吾大夫。

1. 尚書予翼以于往也

于右任：生於 1879 年，卒於 1964 年，陝西三原人。1905 年赴日本，加入同盟會，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民國成立以後，歷任國府要職，曾任監察院院長，著有《右任詩存》、《半哭半笑樓詩》等。

重逢劉小雲同遊九龍歸小雲以詩見贈因次原韻

盡日偕遊不計程，宋王臺下聽潮聲。憐余奔走身將老，話舊淒涼草已生。²
避世安能知避亂，談詩未罷轉談兵。歸來更荷瓊瑤贈，棄甲于思有淚橫。

2. 陳伯瀾世叔茹懷西學兄

陳樹人：生於 1883 年，卒於 1948 年，廣東番禺人。1905 年加入同盟會，正式參加反清的革命活動，民國建立之後，歷任國民黨及國府要職，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著有《寒綠吟草》、《春光堂詩集》等。

晚登九龍宋王臺同潘冷殘

臨江片石尚崔巍，七百年間認劫灰。
人共河山沉默裏，夕陽西下宋王臺。

鄧爾雅：生於 1884 年，卒於 1954 年，廣東東莞人。1905 年赴日本專攻美術，自成一家。於 1918 及 1919 年間，投身護法戰爭，至 1922 年移居香港，成為著名文社南社的一員，著有《綠綺園詩集》。

宋王臺

宋帝昺行宮之一，在九龍寨外濱海處，惟巨石刻三字，近始築圍圍之。

海隅山市廁荒臺，曾見官家警蹕來。牘水有門成定率，³過洋舊樂動悲哀。⁴
王姬下嫁家相近，⁵帝子蒙塵去不回，我屬粉侯粉昆裔，⁶登臨能勿更低徊。

3. 屯門附近地名，又新會崖門有行宮。

4. 宋末東莞李用字竹隱，使婿熊飛起義。自往日本乞師，不應。旋講經學於彼都，卒後喪樂一部送樞歸里。至今邑人送殯猶用之，蓋其中之一節，以李氏後裔秘其譜，也恐遂失傳矣。

5. 先代自明公尚郡主，高宗之姑也，所居即附近之錦田村。東莞、寶安兩邑鄧氏，並錦田所分支系也。

6. 駙馬稱粉侯，其兄弟稱粉昆，見宋史長編。

柳亞子：生於 1887 年，卒於 1958 年，江蘇吳江人。1906 年加入同盟會，開始革命活動，先後成立南社、扶餘詩社等文學組織，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

車過宋王臺未及登眺

匆匆未上宋王臺，憑吊豪情付劫灰。倘見殘碑埋姓氏，最憐故國委塵埃。
孤兒寡婦將誰咎，志士仁人總可哀。多少鐫功弘範輩，神州東望又蒿萊。

李景康：廣東南海人，於 1915 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從區大典、賴際熙學習中國文史，曾任香港官立漢文中學及官立漢文師範學校校長，著有《百壺山房詩存》。

香港亂後弔宋王臺遺址

壞空已證牟尼論，成住徒思輦路塵。
遺跡幾經滄海變，荒臺重歷劫灰新。
靡蕪尚厄蝦夷禍，片石難留帝子魂。
一度登臨一回首，翠華誰問水之濱。

黃佛頤：廣東香山人，南社社員，民國初年曾任廣州《七十二行商報》編輯。

宋皇臺

梅蔚移蹕來，海角此臺古。
岬嶠荒煙中，御榻迷處所。
欲乞思肖蘭，遍蒔數尺土。
日暮多悲風，蠻村號杜宇。

鮑少游：生於 1892 年，卒於 1985 年，廣東香山人，著名畫作藝術家，並致力美術教育 50 多年，著有《鮑少游詩詞集》、《錦繡山河詩集》等。

百字令 宋王臺秋曉

香江初霽，龍城外，圖寫荒臺亂石。那管幾番滄海變，為探南朝遺蹟，步上斜坡。臨流吊古，正值清秋節。遙憐帝子，輦路狼跟慘切。望斷崖門渺渺，荻花瑟瑟，滾滾驚濤雪。颯颯西風吹落葉。更聽寒潮悲咽。一代興亡，千秋成敗，試問誰能說。忠靈淘盡，天邊賸有殘月。

薛一鶚：生於 1899 年，卒於 1980 年，浙江紹興人，學習經濟，曾任南京市銀行副經理，抗戰後流寓香港，著有《小菴施閣詩稿》。

登九龍城

流人初上九龍城，莽莽蒼蒼百感生。
數畝荒畦栽白菜，一頭病豕臥涼棚。
問名猶是中華土，拱衛何須外國兵。
壘塊難銷辛丑恨，滿腔應貯海濤聲。

顧毓琇：生於 1902 年，卒於 2002 年，江蘇無錫人，電機工程學專業，歷任國內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曾任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政治大學等校校長，1950 年赴美國大學任教，著有《蕉舍吟草》。

九龍城

歐陸歸程香港行，三年重到九龍城；
欣逢鑽石山頭客，閒話唐人遇不平。

蔣彝：生於 1903 年，卒於 1977 年，江西九江人，筆名啞行者。化學系學士出身，其後潛修國畫，二戰之後移居英國牛津，畢生從事中國語文和書畫的研究創作，著有《重啞絕句百首》、《香港竹枝詞》、《蔣彝詩集》等。

香港竹枝詞五十首（選一）

依稀重認宋王臺，巨石題名小院開。
香林著史稱能手，民族學中可記來。

洪浩：福建廈門人，民國初年(1912 年為民國元年)生於香港，其後回廈門求學，至抗戰爆發再奔香港避禍，善詩文書法，著有《兩藏樓詩》。

香江訪勝雜詩
宋王臺

臺在香港九龍城，為一土丘，高不逾二百尺，相傳宋帝昺南奔，曾一度登臨其地，故名。

南渡衣冠沒草萊，獨留半島一荒臺。
趙家塊肉歸何處，抉眼愁看胡馬來。

饒宗頤：生於 1917 年，廣東潮安人，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新加坡大學首任中文系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退休後又歷任法國巴黎及日本京都等地大學的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及藝術系、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以及國內多間高等院校的名譽教授，著有《固庵文錄》、《選堂詩詞集》等，2000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

宋王臺賦

屬趙氏之舊墟兮，伊何王焉構始。紛遭世之屯遘兮，遑奔竄乎斯趾。招遺魄於沕寥兮，願傾南海而為醴。曰魂既化朱鳥兮，溘高翔而不歸。效西臺之哭涕兮，冀一返而何時。謫山頽而海沸兮，睇崖門於尺咫。繫人情同於懷土兮，寧曠千載而忘夫故里。率冤禽而填海兮，指翔龍之有無。剩冬青之歷歷兮，撫片石於劫餘。望零丁而惶恐兮，天作浪而反風。列江山無以閔華戎兮，曾百思而莫窮。雲晦靄而殊色兮，收恢貳而氣忽蕭瑟。驅草木使變衰兮，興馮夷與太息。攬九州之無垠兮，神眩沬以周流。霏薜荔其靡從兮，中無杭而即浮。叩九閭而不通兮，竭旋車而反側。陟高臺闐其無人兮，悲回風而向夕。哦海氣之昏昏兮，嗟惺惺而為客。留正氣於殘碣兮，非懷古而亦悲。瞻六合之博大兮，豈跼地而靡歸。

亂曰：登彼廣武，思猛士兮。俯此滄溟，想蟠踞兮。九州南盡，佳氣聚兮。臺空名在，垂萬古兮。

第二部份：碑銘文字

以下列入與九龍城區相關的碑銘刻文，主要源自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的《香港碑銘彙編》，書內亦分別說明了各種碑銘刻文的出處。

龍津石橋碑

九龍寨城

新安地瀕遐海，九龍山翠，屏峙南隅。環山居者，數十萬家。自香港埠開，肩相摩、踵相接。估船番舶，甲省東南。九龍趁集日夥；蜚人操舟，漁利橫流，而渡無虛期。地沮洳阻深，每落潮，篙師無所逞。同治歲癸酉，眾釀金易渡而梁。計長六十丈，廣六尺，為礫二十有一。糜金錢若干。光緒乙亥橋竣。夫除道成梁，古王遺軌。然工程全集，往往道潰於成。謀夫孔多，職此之咎。今都人士，一乃心力，以告厥成功。使舊時澱滓之區，成今日津梁之便。垂之綿遠，與世無窮。此豈關地之靈歟？抑亦由人傑也。銘曰：叱鼉橫漢，駕鵲凌霄。在天成象，在地成橋。擲杖虹飛，受書溪曲。仰桂攀丹，垂楊撲綠。斬蛟何處，騎虎誰人。高車駟馬，於彼前津。石昏神鞭，杵驚仙搗，乘鯉江皋，釣鯨島。帽簷插杏，詩思吟梅。風人眺覽，雪客。繫彼雌霓，臨江炫彩。矧此滄溟，樓船出海。乃邀郢匠，乃命僇工。牽怪石，斤運成風。投馬完隄，斷支柱。未雲何龍，屹立江滸。鹵潮碧暈，鹹汐珠圓。漁燈掩月，蟹火沉。黃竹肩箱，綠荷包飯。彼往經營，此來負販。蘭橈翦浪，桂棹凌波。震天水調，月夜漁歌。陵谷雖遷，滄桑不改。鞏於金湯，萬年斯在。

欽加道銜安徽廬州府知府，署鳳穎六泗兵備道，前掌京畿道、江南道、湖廣道監察御史、山西提督學政冼斌

補行己未壬戌恩科舉人南海何又雄書

倡建首事

廣東大鵬協鎮都督府彭

廣東大鵬協鎮中軍都閫府劉

署新安縣九龍分司巡政廳周

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孟冬吉日立

(原碑未見。今據《九龍樂善堂特刊》、《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香港街坊志」及黃佩佳《香港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互校載錄。)

刊刻會議

九龍寨城

嘗思足食 兵 宜節 不豫圖撙節之方，則差借糜費交加，餉項日形短絀，殊非體恤之道也。余於同治四年冬， 查悉左、右兩營各兵差幫一項，因循日久，不免相率浮冒，愀然傷之。正思籌 安 以為目前補救之計。詎視事未久，倏又調任廣海，致政令前議不果於行；然私心猶耿耿不忘也。今歲孟秋，重領斯任，深幸得遂初懷。爰集兩營備弁，酌議差幫章程二十款，稟奉調署本 憲 執，准如稟辦理； 將章程迅速刊刻勒石，垂諸永久。遵奉之餘，不獨余一人感慰權抃，還期兩營弁自恪遵勿替，歷久奉行。庶幾意美法良，不致有名無實。上以副 協憲慎重餉糈之心，下可 各兵仰事俯業之願。至於擴充而潤色之，是所望於後來者矣。是為引。 司徒 撰

一、議按季供餉銀兩，俟探聽 藩庫發給有期，該守備先行飭房核算。限十日內，將房將數

做好，親 呈核。俟請餉弁運餉到龍，隨時兌封給目包好，呈請 協都憲核驗。其在九龍當差者，按名給領。其在大鵬當差者，由該守備運帶各餉包，回營散給；以省差費，而免 虞。各兵月支餉銀有限；營中如遇恭祝 武帝聖誕，祇宜倩唱八音、或懸絲、或手托戲、不等，約需費銀三二拾 之間，藉表微忱。不准仍前大演雜劇，動費多金，甚至每兵扣銀三錢五分之多，以節糜費，而示體恤。 協轅稿公共出差，准隨帶跟兵壹名；傳號出差，准隨跟兵壹名。四行伺隨出差往虎、省，只准論天，不准論 。食：兩營差，每營每天銀四分。如恭祝恭輓，及往省請領練兵口糧銀 ，准多帶目兵壹名。其餘帶目兵，不准帶跟兵。

一、都守衙門掌標出差，准帶跟兵壹名，差銀折半，每天差銀四分。即四行人等，每名每天差銀捌分；亦論天，不論 。

一、都守衙稿書出差，仍查照向章借 ，不帶跟兵。

一、守備因公來龍，隨帶四行人等，每名每天准借差銀陸分；轎乘准隨帶雜式名。不准仍前式名、而侵借 名之 。只准到龍，不准帶省。即行李務宜輪派差供挑運，不准任從四行藉僱挑夫替差之名，侵借兵餉。如有此等領借，惟隊目蓋用圖記是問，經手妄借差銀是究；而杜扶同，以昭 戒。

一、千總奉差請領兵餉，及出洋緝盜，准隨帶跟兵肆名；尋常差事，准隨帶跟兵 名。把總領餉緝盜，准隨帶跟兵 名；尋常事，跟兵 名。外額赴領硝磺，准跟兵 名；其餘差事，准跟兵壹名。以昭公允。

一、千、把、外額所帶跟兵，遠近天數，每天准借差銀捌分。

一、千、把、外額如有汛守，隨帶跟兵不准借哨下差 。如在龍聽差之弁，則按照千、把總准借跟兵 名，外額准壹名，以資差用。其獨係專辦存城，准借跟兵 名； 辦准借壹名。因公務紛繁，藉資各差之用。

一、營中不論四行散兵，奉差往港，有船牌，不過宿，准借銀 分。如過宿，每天差銀陸分。

一、目兵有目兵之 。如公差往港，有火船牌，每天准借差銀肆分。

一、記委目兵、散兵、不論奉差何處，按天數之多少，每天准借差銀捌分。不准以 數計。如帶緊急公文附搭火船，費銀准照實數具借。公事妥畢，刻即回營，不准逗留，徒糜差費。如違查出重究。

一、如有不應借火船銀，該兵膽敢執拗尋論，准該隊目一秉至公，稟明核辦，以杜浮骨。

一、練兵每天口糧銀陸分。如奉差，不論出洋緝捕， 帶公文，准每天借差銀 分，以昭公允。

一、香港兩營公所，祇宜酌派妥兵壹名，在館看守，並料理各物，可矣。及投遞公文，每營每月准借差銀壹 捌錢，以供口食。不准仍前派兵 名，兩營徒費差帮。

一、協都守衙門，除緊急公文專差 帶外，其餘尋常公文，俱交存城經手包封，派目帶港，交兩營公館。由看館兵送承接來往書信館，給部附搭火船。帶省聽事黎吉履堂收下。分別投遞。以節差費。其書信館接月辛工銀另議。

一、守備差館、賬房理數人，所有接月薪工銀兩，應由該守備自行送給，與營中無涉；不准侵借兵餉差 。以各兵之銀，而利一人之事，難昭公允。即派掌標、支差亦同論。

一、隊目原為差證而設，不得扶同冒借、分肥等弊，壹經察覺，從重究治。

一、兩營百隊館常有往港公差，擬請發給火船仔牌，每營各壹張，以備聽候差遣。

一、各兵如有假冒赴領義 ，該隊目必須查明確據，方准蓋用圖記。不論祖父母等項人故。按照先後日期，挨次給領。倘有以銀資托爭先者，查明公議、不 。

一、議各衙門四行，伺接新任營憲，務以接到營之日，差銀照日借支，為止。

一、議各衙門四行送舊任營憲，借食差銀，遠處不論，來回至遲限以一個月為定。如有逗遛日久，不准借支差銀。近者以論日數計算，不得過月。

舊章程附列：

九龍各兵目出差：

一、往陽江銀三 六錢

一、往海口銀九

一、往電白銀四 伍錢

一、往崖州銀壹十四

一、往龍門銀壹十

大鵬各兵目出差：

一、往電白銀四 式錢

一、往龍門銀八兩八錢

一、往吳川銀四 六錢

一、往陽江銀四

一、往海口銀七 六錢

一、往廣海銀三 五錢

一、往海安銀七 四錢

一、往廉州銀七 九錢

一、往 州銀六 六錢

一、往崖州銀十

光緒拾 年八月十五日 勒

龍津石橋加長碑

九龍寨城

天下事有致力於此，而收效輒及於他事者。其機不數觀。要惟好行方便者，往往得之。九龍濱

海龍津石橋，創於同治癸酉，問津者咸便利之。顧地為巨浸所朝宗，潮汐往來，沙磧多停蓄。自成橋後，歲月積漸，滄桑改觀。邇來橋之不逮於水者，殆猶今之視昔焉。於是商於是地者，謀所以善其後也。乃仿招商局碼頭之制，續作橋廿四丈；又於其端，為丁字形，寬一丈二尺。其製精而其費較省。且易石而木，泊船時亦無兩堅激撞之患，其為用亦更適。計糜題捐洋銀一千七百有奇。至渡港小輪船以斯橋之利其載運也，每船願月輸碼頭租銀若干。會樂善堂施濟所需，捐款不恆，至僉碼頭租款宜屬之樂善堂，永之挹注。蓋藉斯地之財，即以濟斯地之用，實一舉而兩善具焉。昔莊子有言：以鹵莽耕者，天即以鹵莽應之。茲則以方便行者，天非以方便應之。人事所感，即天心所錄，斯可以識其大凡矣。是不可以不記。且為之銘曰：長虹飲川，渡源雲屬。余木為樑，用拷足。如雁齒之平，匪梟脰之續。資沾溉夫善堂，樂斯人之所欲。合藏市以出塗，慰成功以相告。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仲秋吉旦。

（原碑未見。引自《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香港街坊志」。部份內容亦見於《九龍樂善堂特刊》。）

敬惜字紙銘

九龍寨城惜字亭

文帝教人，敬惜字紙。陰騭文中，力闡厥美。自古名賢，識者凡幾？食報縈身，實膺福祉。桂籍一書，彰彰可。乃有愚夫，任其拋棄。或拭灰塵，或包餅餌；或糊窗櫺，或置床第；甚至穢污，殘踏踐履。疾病災殃，其應甚邇！余本書生，投筆而起，雖云荒經，時還讀史，從仕卅年，謬膺重寄。敬字築爐，隨處悉備。茲任九龍，倍深克己；地逼夷樓，如履虎尾。篤敬可行，聞諸夫子。單騎赴盟，艱險不避。六載從公，冰淵自矢。戎政餘閑，偶遊村里。見字多遺，行行欲止，拾歸焚之，願稍慰矣。惟是四方，街衢巷市，檢拾需人，必求專理。披閱輿圖，有地尺咫。築舖捐廉，義學比，龍泰為名，賃租積累；檢字雇工，費出於此。督造雙爐，在寨城裏。外建一亭，重廊迴倚，石柱雕簷，匠工豈侈？工人攜籃，往來迤邐，土掩沙藏，業殘破。檢拾勿遺，預惜寸晷。浣之香湯，晒之淨几，付之靈，歸之海矣。工如怠乎，吾則更爾。亭爐已成，私心竊喜，嵌壁大書，揮之以指。惜字有銘，莫嗤鄙俚。伏望公，體僕斯旨，久而行之，功德無已。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秋。署大鵬協副將張玉堂指書。

（引自《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七日「香港街坊志」）

九龍司新建龍津義學敘

九龍寨城龍津義學

有因時制宜者出，相機勢，備經營，即事求治，而招攜懷遠之意以寓。蓋經濟之才，如此其難也。粵東素稱樂土，人文與中州相，貨財之所萃會，瓷舶之所駢集，富庶又甲於他省。新安特濱海邊。邑縣有官富司，尤濱海邊司耳。然衣之裔曰邊，器之羨曰邊。器敝自羨始，衣敝自裔始。則凡官邊地者，請共厥職，宜什伯中土；而厭溥之，獨何心歟？道光二十三年，夷務靖後，大吏據情入告，改官富為九龍分司。由近量移於遠，築城建署，聚居民以實之。雖備內，不專為禦外，而此中稟承廟謨，計安海宇，誠大有濟時之識於其間，而非苟為勞民傷財也。今年余奉調視事，巡檢許君文深來言，有龍津義學之建。副將王君鵬年，通判顧君炳章，喬大令應庚及許君捐銀若干為經始，地租歲可得若干以資生徒，仿古家之制，擇其尤者居焉。人心胥奮。嗟乎。此真即事求治，能以無形之險，固有形者也。今國家文教覃敷，武功赫耀，無遠弗屆。九龍民夷交涉，人情重貨寶而薄詩書，有以鼓舞作興，則士氣既伸，而外夷亦得觀

感於絃誦聲明，以柔其獷之氣。所為漸被邊隅者，豈淺鮮哉？落成，司人以文請。既滋愧許君能助我不逮，而重為司人深無窮之望也。記之，俾勒於石。

道光丁未秋八月知新安縣事思唐王銘鼎譔 南海謝鐵摹刻
值事曾朝斌、吳穎才等嵌壁

（原碑未見，據許舒博士藏抄本編錄）

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 九龍城宋皇臺

宋皇臺遺址在九龍灣西岸，原有小阜名聖山者。巨石巍峨，矗峙其上，西面橫列元刻宋王臺榜，書旁綴清嘉慶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學教授賴際熙，籲請政府劃地數畝，永作斯臺遺址。港紳李瑞琴贊勸其事，捐建石垣繚焉。迨日軍陷港，擴築飛機場，爆石裂而為三。中一石摩崖諸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復後，有司仍本保存古蹟之旨，在機場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闢地建公園。削其石為長方形，移實園內，藉作標識，亦從眾意也。考臺址明清屬廣州府新安縣，宋時則屬廣州郡東莞縣，稱官富場。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門，以景炎二年春入廣州。治二月，舟次於梅蔚。四月進駐場地。嘗建行宮於此，世稱宋皇臺。或謂端宗每每憩於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蹕古塔。九月如淺灣，即今之荃灣也。十一月元兵來襲，乃復乘舟遷秀山。計駐於九龍者，凡十閱月焉。有宋一代，邊患迭興，西夏而外，抗遼、抗金、抗元，無日歲。泊夫末葉，顛沛蒙塵，暫止於海濱一隅，圖匡復興。後此山，君臣所踐履者，同為九州南盡之一寸宋土，供後人憑弔而已。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寔沿元修宋史之謬。於本紀附二王，致誤今名。是園曰宋皇臺公園。園前大道曰宋皇臺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流離播越也，宗室隨而南者甚眾。後乃散居各邑。趙氏譜牒，彰彰可稽。抑又聞聖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衛王昀同次其地得名。其此有金夫人墓，相傳為之楊太后女，晉國公主，先溺於水，至是鑄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廟，則東莞陳伯陶碑文疑為楊太后弟亮節道死葬此，土人立廟以祀昭忠也。至白鶴山之遊仙巖畔，有交椅石，據故老傳聞，端宗嘗設行朝以此為御座云。是皆有關斯臺史蹟，因並及之，以備考證。一九五七年歲次丁酉冬月，新會簡又文撰。文台山趙超書丹。而選材監刻，力助建碑，復刊行專業，以長留紀念者，則香港趙族宗親總會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廟道橋路碑記 九龍城

甲：

維新安縣治之南，有九龍焉。濱臨大海，香港蔽其前，深圳環其後，左有大鵬之嶺，右有大奚之山。一帶村落，迤邐而居，雖僻遠而往來九龍通道者，不知凡幾。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踏刀刃。盛夏水潦，窮冬雨雪，深坳積水，相輔為害。驚顧迂延，顛踣騰藉，行者苦之。目九龍以東，大坳、三坳、牛池灣、將軍澳、蠔涌圍等處，其路橋皆已次等收功；而惜於九龍之西，尚未經始也。於是茂才張君靜山，請於協戎陳君，少尹黎君；相方視位，傍侯王廟建牌門以壯觀；負陰抱陽，於風門坳築石牆以障缺。復集眾人力，從寨城門處轉風門坳而西，乃闢乃墾，乃宣乃理。剖巨石，撲大木。摧其堅剛，平其峻險。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其湍悍。跨石橋，斫石路，甲午夏舉事，迄乙未秋而功成。是役也，計用石工若干，土工若干，灰料若干，所費不多，而為利已溥。萬夫呼忭，莫不如意。孟子云：民未病

涉；詩云：周道如砥，其是之謂歟？此雖未足以畢利物濟人之思，而其用心可知也。自中外通商後，風俗日壞，而與戎居接境，耳濡目染，鮮有不移者。況九龍本華夷雜處，獨能講明正學，以教化斯土；又議建善堂，稍有裨補於世道人心者，不遺餘力。以期事之有濟，然後知國家之深，雖在遐邇且能樂善不倦也，豈特伐木通紹而已哉？吁！可謂克自樹立者矣。工既訖工，順勒諸金石以示來也，使役之興者，各竭其心力以醫所不逮也，而惡於是邦。乃屬記於余，余嘉其志之靡有是也，敢拜手而為之記云。甲午科舉人，三水梁之蕙綢甫拜撰，里人張壽仁靜山氏番丹。

(以下略去各捐助芳名)

值事：張壽仁 吳翼臣 吳溪泉 劉國祥 張雲軒 蘇冠爵 唐揚富 吳順和 鄧梅森 梁棟材 盧得恩
蔡守寅 曾綸和 丁維合 徐俊廷 鄧廣祥

大清光緒二十有一年歲次乙未仲冬月穀旦謹刊立

(按：此碑甲部在日治時期因拆卸城寨擴建機場被毀。今據九龍城一位鵝鴨店店主提供其先人抄錄之碑文，刊載於此。編者謹向該位店主致謝。乙部現存香港歷史博物館。)

土瓜灣天后廟廟誌

土瓜灣天后廟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本區客籍人士建廟奉祀天后。一九二八年歸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天后本福州林氏女，宋初人也。生有異稟，後屢顯神通，拯民於溺。本港漁民皆奉為海國慈航。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誕本廟香火甚盛。華人廟宇委員會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紅磡觀音廟廟誌

紅磡觀音廟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紅磡三約街坊，釀資建造本廟。一九二九歸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世傳觀音，本為王女，後得道成佛。女子之德性，如：美貌、溫文、慈藹、智慧、孝順等，無不備於其身。農曆二月、六月、九月、及十一月之十九日均為觀音誕，本廟香火甚盛。華人廟宇委員會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鐘

紅磡觀音廟

國泰民安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仲冬吉旦

紅磡觀音菩薩案前沐恩弟子曾發記敬奉

隆盛爐造

鶴園角北帝廟廟誌

紅磡北帝廟

舊北帝廟建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原址處於今日青州街之東，端後因市區發展而卸拆。紅磡坊眾遂於一九二九年建造本廟，使香火得傳，嗣後即歸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農曆三月三日北帝誕，參神者甚眾。 華人廟宇委員會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鐘

紅磡北帝廟

國泰民安

沐 恩弟子和興塘敬奉 天后元君 列聖案前，萬福攸同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孟冬吉旦立

風調雨順

隆盛爐造

考文獻

歷史檔案

英國政府歷史檔案（英國國家檔案局及香港大學圖書館館藏）

CO129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 Hong Kong, 1842-1951

CO537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 supplementary

FO17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and Other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efore 1906, China 1815-1905

FO228 Foreign Office: Consulates and Legation, Chin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I, 1834-1930

FO371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 – 1966

Despatch by Major-General C. W. Maltby on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from 8th to 25th December 1941, Supplement to *The London Gazette*, 27th January 1948.

Eastern No. 88,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Kowloon-Canton Railway. London: Colonial Office, 1907.

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檔案

HKRS163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iles (Confidential)

刊印文獻

文慶：《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毛鴻賓：《廣東圖說》，揚州：廣陵古籍，1993年。

史澄：《廣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上海：上海古籍書店複印，1980年。

阮元：《廣東通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屈大均：《廣東新語》，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乾隆官修：《清朝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郭棐：《粵大記》，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

陳步輝：《宋臺集》香港：繡絲樓，出版年缺。

陳鏞勳：《香港雜記》，香港：中華印務總局，1894年。

陳鏞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兩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舒懋官：《新安縣志（清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香港：黃承業重刊本，1992年。

黃淳：《崖山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年。
靳文謨：《新安縣志〔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 1688 年]〕》，出版地缺：出版者缺，1688 年。
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盧坤等修：《廣東海防彙覽》，出版地缺：出版者缺，出版年缺。
蘇澤東：《宋臺秋唱》，香港：刊本，1917 年。

香港政府刊物〔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藏書〕

《香港 1997》，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97 年。

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Noronha & Co., Government Printers, 1899.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s 1894-1940.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22-1927.

Hong Kong Blue Books 1871-1940.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900-1902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Hong Kong: Noronha & Co., Government Printers, 1932.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1954-1960.

Orme, G. N.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y for the Years 1899 to 1912.* Hong Kong: Noronha & Co., Government Printers, 1912.

Report on the New Territory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Noronha & Co., Government Printers, 1900.

英國國會文件〔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書〕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ol. 45, 1901.

香港立法議會文件〔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書〕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916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935

中文報紙、期刊〔香港大學圖書館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藏〕

大眾日報

宇宙風

英文報紙、期刊〔香港大學圖書館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藏〕

Benham, F.C., "The Growth of Manufacturing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tober, 1956.

"The Industrial Wealth of South China---The Future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Daily Press ed., Anniversary Supplement 1857-1917.*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1917.

口述歷史〔九龍城區議會藏品〕

尹才榜〔2005 年 5 月 20 日〕

林耀洪〔2005 年 1 月 20 日〕

陳偉波〔2005 年 4 月 2 日〕

陳盧堅〔2005 年 1 月 6 日〕

趙麗禎〔2005 年 1 月 11 日〕

劉建海〔2005 年 4 月 14 日〕

專著及論文

《香港工業》，無出版機構名字，出版地缺：出版者缺，1953 年。

《香港商務店名錄》，香港：合眾廣告公司，1930 年。

九龍樂善堂：《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香港：聯藝印刷有限公司，1981年。

方國榮、陳：《昨日的家園》，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香港 長沙作戰》，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

王紹坊：《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 1840-191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王楚瑩編：《香港工廠調查》，香港：南僑新聞企業公司，1947年。

王廣武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

白鶴鳴：《祈福習俗小錦囊》，香港：聚賢館，1996年。

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

余繩武，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年。

余繩武：《割佔香港島》，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

吳醒濂編：《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出版社，1937年。

宋軒麟：《香港航空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3年。

李宏：《香港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邢福增：《願 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年。

杭立武：《國民政府時代之中英關係 1927-195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林天蔚，蕭國健：《香港前代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詩詠香江》，香港：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1987年。

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年。

胡從經：《歷史的聲音：歷代詩人詠香港》，香港：朝花出版社，1997年。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香港工商業彙報編：《香港建造業百年史》，香港：出版者缺，出版年缺。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史研究所學會編：《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79年(1990)年。

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袁求實：《香港回歸大事記 1979-1997》，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

袁繼成：《近代中國租界史稿》，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

張安民等：《中國航空貨運：香港、上海、北京》，香港：匯智出版，2004年。

張曉輝：《香港近代經濟史(1840-1949)》，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

梁炳華：《城寨與中英外交》，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

梁美儀：《家：香港公屋四十五年》，香港：香港房屋委員會，1999年。

許晚城編：《香港工商通訊錄》，上海：龍文，1940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陳守仁：《神功戲在香港：劇，潮劇及福佬劇》，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

陳真等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北京：三聯書店，1957至1961年。

陳祖澤，梁培藻編：《九龍樂善堂特刊》重刊本，香港：九龍樂善堂，1986年。

陳瑞璋：《認識中國傳統節日和風俗》，香港：萬里書店，2001年。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年。

馮錦榮：關於陳寅恪先生對年代學的認識——兼論繆勒教授(Professor 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 1863-1930)年代學的研究——，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編：《21世紀世界與中國：當代中國發展熱點問題》，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黃光域：《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黃谷柳：《蝦球傳》，香港：三聯書店，1958年。

黃嫣梨：《香港浸會大學校史》，香港：香港浸會大學，1996年。

經濟導報社編：《香港商業手冊》，香港：香港經濟導報社，1960年。

葉靈鳳：《葉靈鳳文集第三卷：香港掌故》，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香港：三聯書店，2000年。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劉存寬：《租借新界》，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

劉粵聲：《香港基督教會史》(增訂版)，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6年。

劉蜀永：《割佔九龍》，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

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書店，2004年。

蔣英豪選注：《近代詩人詠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鄭紫燦編：《香港商務交通錄》，香港：香港華商會，1915年。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
 魯金：《香港廟趣》，香港：次文化堂，1992年。
 黎晉偉主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年。
 盧受采，盧冬 著：《香港經濟史》，香港：三聯書店，2002年。
 盧瑋鑾：《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至一九四一》，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
 蕭國健：《九龍城史論集》，香港：顯朝書室，1987年。
 蕭國健：《香港前代社會》，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
 蕭國健：《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壘》，香港：顯朝書室，1982年。
 蕭國健：《關城與炮台》，香港：香港市政局，1997年。
 蕭國健、沈思：《香港市區文化之旅》，香港：萬里書店，2001年。
 龍炳頤：《香港古今建築》，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
 簡又文：《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年。
 聶寶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 1840 至 189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羅香林：《1842 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國學社，1959年。
 麗的呼聲日報編：《香港工商業概覽》，香港：麗的呼聲日報，1959年。
 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年。

Cameron, Nigel. *Power: The Story of China Light*.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oa, G.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Davis, Mike. *Hong Kong Buses Vol. 2: The Kowloon Motor Bus Company (1933) Limited: From 1933*. Surrey: DTS Publishing, 1995.
 Dunnaway, Cliff (ed.). *Wings over Hong Kong: An Aviation History 1891-1998*. Hong Kong: Pacific Century Publishers, 1998.
 Eitel, E.J..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5, 1983.
 Empson, Hal.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1992.
 Endacott, G.B.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30 years in Hong Kong 1967-1997*. Hong Kong: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s, 1997.
 Faure, David, Lee, Pui-ta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Econom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Friedman, Irving S.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Hong Kong Dollar Direc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Dollar Directory Co., 1923-1925.
 Hayes, Jam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Archon Books, 1977.
 Hayes, James.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Hutcheon, Robin. *High-rise Society: The First 50 Years of th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llo, Dennis. *The Guns and Gunner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unners' Roll of Hong Kong, 1992.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mith, Carl.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5.
 Sweeting, Anthony Edward. *A Phoenix Transform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Post-War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weeting, Anthony Edwar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941-2001: Visions and Revi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Sweeting, Anthony Edwar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Szczepanik, Edwar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The Chinese Commercial Directory 1930. Hong Kong: The Chinese Commercial Directory Co., 1930.
The Directory and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etc.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1912-1930.

Ticozzi, Sergio.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Diocesan Archives, 1997.

Wesley-Smith, Peter. *Unequal Treaty 1898-1997*.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Wesley-Smith, Peter. *Unequal Treaty 1898-1997: China, Great Britain, and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互聯網頁

成報：《觀音廟開庫最高借 3.8 億：紅磡最熱鬧，料有兩萬人》，網址：
<http://www.singpao.com/20050306/local/683215.html>

英華書院：《英華歷史》，網址：<http://info.yingwa.edu.hk/history.php>

香港公開大學：《歷史背景》，網址：
http://www.ouhk.edu.hk/WCM/?FUELAP_TEMPLATENAME=tcSingPage&ITEMID=CCPAUCONTENT_84612&lang=chi

香港培正中學：《本校簡史》，網址：<http://www.puiching.edu.hk/>

香港培道中學：《學校歷史》，網址：http://www.pooito.edu.hk/index_1.htm

Diocesan Boys' School. *School Information: Origin.* Website:
<http://www.dbs.edu.hk/index.php?section=aboutdbs&sub=origin>

Heep Yunn School. *School History*. Website: <http://www.hys.edu.hk/>

La Salle College. *School History*. Website: <http://lasalle.school.net.hk/>

Maryknoll Convent School. *School History*. Website: http://www.mcs.edu.hk/mcs_homepage/aboutus/about2.htm

Munsang College. *History of Munsang College*. Website: <http://munsang.edu.hk/secondary/info/history/history.php>

鳴謝

九龍明愛社區中心
 九龍樂善堂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每日新聞
 政府新聞處
 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紅磡三約街坊會
 紅磡三約潮僑孟蘭友誼會
 紅磡街市觀音花炮會
 英國國家陸軍博物館
 英國國家檔案局
 香港大學圖書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
 華人廟宇委員會
 愛民賢毅社

尹才榜議員，MH
 吳韻怡小姐
 巫羽階先生
 林耀洪先生
 梁婉芬小姐
 陳仲海先生
 陳祖澤先生(已故)
 陳偉波先生
 陳健先生
 陳盧堅先生
 陳迹先生(已故)
 黃頌恩小姐

楊佐鏗先生，MH
葉志堅議員，MH
葉俊文先生
趙麗楨女士，MH
盧淑櫻小姐
謝雋文先生
Mr. Philippe Van Hoof